



目 录

战略预测

- 3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俄罗斯国防
与外交政策委员会 / 经由和谐发展走向地区
稳定：新世界格局中的俄罗斯与中国——“瓦
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用提纲
- 17 A·A·邓金 等 / 2030 年全球战略预测

俄国民族主义

- 48 季明举 / 民族主义话语及其表述实质——
19 世纪上半叶俄国文化运动及其历史
影响
- 62 徐凤林 / 民族情感与道德义务——俄国学
者 20 世纪初民族主义争论中的哲学问
题

经 济

- 75 于彬 曲文轶 / 中俄电力产业规制机构设
置及影响因素比较研究
- 92 李中海 / 卢布国际化战略评析——兼论中俄
贸易本币结算

冷战国际史

- 105 李丹慧 / 关于 1960 年代中国与东欧五国关
系的若干问题——来自中国档案文献
的新证据
- 130 梁 志 / 1968 年“普韦布洛”号危机初期
的美苏交涉
- 146 胡 彦 辑 / 俄罗斯大事记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李敏焘

杨 成

刘 军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2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2011 年 6 月 23 日

俄羅斯研究

Оглавление

Центр по изучению России Восточн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 Совет по внешней и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Через гармонич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к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новой мировой архитектуре. Тезисы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сек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3)

А.А. Дынкин и др.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глобальный прогноз 2030..... (17)

Цзи Минцзюй

Дискурс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и суть его выражения — Российское культур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19 века и его влияние на историю..... (48)

Сюй Фэнлинь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чувство и моральное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о —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дебатов о национализме среди российских ученых в начале 20 века (62)

Юй Бинь, Цюй Вэнь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регулирующих институтов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отрасли и влияющих на них факторов в Китае и России..... (75)

Ли Чжонхай

Анализ стратегии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и рубля — В частности о расчётах в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валютах в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й торговле (92)

Ли Даньхуэй

Ряд вопросов об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пятью странам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 60 гг. 20 в. Новые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из кита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105)

Лян Чжи

Американо-советски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начального этапа инцидента «Пуэбло» 1968 г. (130)

俄羅斯研究

2011 年第 4 期 (双月刊)

Contents

- Center for russian studies of ECNU & Council o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Regional Stability through Harmonious Development: Russia and China in the New
Global Architecture — Discussion Points for the Russian-Chinese Section of the Valdai
Discussion Club····· (3)
- Alexander A. Dynkin etc.*
Strategic Global Outlook : 2030 ····· (17)
- Ji Mingju*
Nationalistic Discourse and the Essence of Its Expression—Russian Cultural Movem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 th Century and Its Historical Influence ····· (48)
- Xu Fenglin*
National Feelings and Moral Obligation — Philosophical Problems of the Nationalist
Debate by the Russian Scholar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62)
- Yu Bin, Qu Wenyi*
Comparative Studies on Regulatory Organization Structuring of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75)
- Li Zhonghai*
Analysis on Ruble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and on China-Russia Trade in Domestic
Currency Settlement····· (92)
- Li Danhui*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Fiv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in 1960s — New Evidence of Chinese Archives ····· (105)
- Liang Zhi*
U.S.-Soviet Union Negotiations in the Initial Stages of the Pueblo Crisis of 1968 ··· (130)

战略预测

【编者按】2010年11月25至26日，由俄罗斯新闻通信社和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中俄分组会在上海西郊宾馆举行。会议主题为“经由和谐发展走向地区稳定：新世界格局中的中国与俄罗斯”。俄著名智囊机构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俄国立研究型大学高等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系主任卡拉加诺夫（С.А.Караганов）、后工业社会研究所所长伊诺泽姆采夫（В.Л.Иноземцев）、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卢贾宁（С.Г.Лузянин）等，以及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静杰、前驻俄陆海空三军武官王海运、中央外办综合局局长崔启明、中联部六局副局长钱乃成、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常务理事冯绍雷等30余位专家与会。会议以务实和工作性讨论为基本原则，就新时期中俄关系的战略背景、两国对策及亚太地区合作的新模式等问题进行了“中俄专家对话史上少见的”坦率而真诚的对话，增进了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形成了诸多战略共识。为促进国内俄苏研究学界及战略研究学界对新世界格局中的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俄关系的战略思考，本刊现刊发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独立准备的讨论提纲。

经由和谐发展走向地区稳定： 新世界格局中的俄罗斯与中国

——“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用提纲*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

【内容提要】国际格局未来10-20年的核心问题，俄方认为是美国和西方的整体性衰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目批准号：08BGJ003）的阶段性成果。

落和中国崛起之间的矛盾；中方倾向于认为，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大国之间合作维护全球和平与发展的趋势有可能超出其竞争与冲突的一面。中国将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提升学习与创新能力，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俄方断定，在西方衰落和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各方围绕俄罗斯的争夺似正日益明显，这既是基于俄的资源 and 欧亚大陆的重要战略地位，更是由于俄可能成为左右力量平衡的“最后一根稻草”。中方学者认为，俄罗斯重新崛起的基础已经奠定。与中国相比，俄在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中可能会处于一个相对较为有利的地位。关于中俄双边关系，俄方集中关注两国经济贸易合作，认为主要存在经济关系远远落后于政治关系以及贸易结构原料化等问题。中方学者认为，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的主要挑战不在于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不对称，而在于双方能否适应彼此关系的重新定位，能否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相互信任。俄方主张亚太地区必须建立新的地区安全和发展模式，以解决中美关系对抗性的潜在上升这一核心问题。中方主张，俄罗斯可以改变目前在政治和经济上参与亚太事务明显不足的局面。中俄两国有必要主动提出并推动亚太地区的国际议程设定，担负起“服务型大国”的责任，给地区发展和繁荣带来更多的公共产品。关于中亚地区局势和上海合作组织，两国学者都认为中亚地区不是俄中两国竞争的领域，或是俄中两国发生冲突的地区。

【关键词】 国际格局 中国 俄罗斯 认知和利益共同体 服务型大国 和谐发展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1)04-0003-(14)

“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用中方提纲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迄今为止在多个领域取得和积累了丰富的合作成果，是当今世界最具实质内容的大国关系之一。与俄美关系需要“重启”不同，中俄关系更需要的是“加至全速”和“提高质量”。中俄关系应着眼于两国未来中长期的战略需要，适应最新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化，以及双方国内的改革和发展进程，以新的思维、新的方法和新的路径推动其深入发展。

一、新时期中俄关系发展的战略背景：以今后 10-20 年的前瞻为基础

1.1 目前至今后 10—20 年时间内，大国关系将加快重组，国际体系将加速转型。美国将保持在科技创新、金融和军事领域的世界领袖地位；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较前上升，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望在本世纪中叶，人均指标达到

中等程度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

1.1.1 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成为世界经济主力军，尤其是中、印、俄、巴西等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加速了全球力量格局的变迁，多极化与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明显加快。作为一个过程，国际政治经济重心向新兴大国倾斜。但是，无论是金融、经济格局、制度构建与科技创新能力，以及总体安全保障水平，欧、美、日依然远远处于领先地位。

1.1.2 尽管国际关系中的无序性以及全球和地区层面上对政治和经济进程控制力的下降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巨大挑战，但后冷战时期全球范围内先后爆发的各类危机事件，尤其是最新一轮的全球金融危机，推动着如下共识的形成，即各国的发展只有通过协力解决所面临的全球性、地区性共同的新威胁、新挑战才可能实现；国际进程将朝着全球和地区层面的治理机制的协调作用增大的方向发展；但同时明显存在着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如果能够及时把握机遇，安全和发展问题的全球化有可能导致大国战略思维的良性变迁。大国之间合作维护全球和平与发展的趋势有可能超出其竞争与冲突的一面。

1.1.3 中国成为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转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是，只有当中国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提升学习与创新能力，协调好与周边以及大国间关系，积极参与各类双边与多边的、地区与全球的合作进程与机制，才有可能在推动区域与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同时，确保自身走向进步与繁荣。

1.1.4 未来 10—20 年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如何确保中国发展模式从过多依赖国际市场向内需主导型的稳妥转变；在提升中国城市化水平过程中如何实现社会结构的平稳变化；如何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改革，和提升社会公正的水平；如何调整产业结构，克服经济科技创新能力的不足，并形成确保质量和信誉的国际品牌产品；在维护本国与国际金融体系安全稳定发展的同时，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和新安全体系构建中担当“负责任的大国”；缓和乃至消除西方、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可能产生的顾忌。

1.1.5 中国无意建立全球和地区霸权。中国在借鉴既有国际善治经验、克服相关教训的基础上，努力参与合作构建新的区域与国际的长期进程。中国是全球化进程的受惠者和推动者，将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乐于与其他国家共享发展成果。

1.2 俄罗斯重新崛起的基础已经奠定。中长期内，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转型国家之一，复苏和发展中的俄罗斯综合国力将对区域和全球事务的几乎所有领域发挥重要影响。

1.2.1 俄正以未来 20 年全球发展的大趋势为基础，努力调整国内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使其能有效应对即将面临的新挑战。在普京 8 年“原始积累”的基础上，

梅德韦杰夫大力呼吁的“现代化”的推动，将给俄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1.2.2 在国际社会围绕非再生性资源的竞争加剧的情况下，自然资源丰饶和具备高水平人力资源优势的俄罗斯可能新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的地位。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内，新能源等资源领域的革命性变化还难以令现有资源供需状况产生根本性变化。多元化政策也使得俄可以利用资源获取更多的国际资本和先进技术。

1.2.3 随着国力的增强，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相对于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更多需要从“零起点”开始经营不同，俄在历史上积累的国际机制、双边关系乃至合作经验，都更有助于俄大国影响力的发挥。

1.2.4 与中国相比，俄在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中可能会处于一个相对较为有利的地位。西方担心中国成为其发展模式的可取代性的选择，这意味着俄在与中国及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时协调与周旋空间的增加。

1.3 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的主要挑战不在于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不对称，而在于双方能否适应彼此关系的重新定位，能否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相互信任。“现代化进程中的伙伴”的概念，对于克服地缘政治式的战略博弈有积极的意义。

1.3.1 中国的崛起与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几乎同步，这既有可能增添双方的共同利益，同时也可能导致两国的战略和利益的认知矛盾。理论上讲，未来10—20年的中俄关系可能存在以下场景：“全方位的现代化的伙伴关系”；现有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权宜轴心”；以及合作水平的降低和倒退等多种多样的选择。事态朝何种方向发展，首先取决于两国的相互认知和战略互判。

1.3.2 尽管俄国内目前倾向于开展对华合作的力量大于负面意见，但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反对进一步深化两国战略合作的声音也在增加。

1.3.3 除了传统的“中国威胁论”之外，新的不利于中俄关系的因素主要源自对中国崛起的顾虑和猜忌，以及中俄合作形式与内容的新变化。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并非所有俄罗斯精英和民众都能适应这一现实。在全球层面上，俄担心中国国际地位增强后，会更多强调本国的国家利益，而无视俄罗斯的利益和需求；顾虑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而使俄在国际体系中边缘化。在地区层面上，俄担忧中国与中亚关系的加强会逐渐将俄排挤出局；中日可能的接近会损及俄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在双边层面，俄惧怕中国采取“单边主义”，忽略俄改善中俄经济合作结构的需求，使俄沦为中国的“资源附庸”；中国可能觊觎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领土。在精英层面，俄担心中国精英的日益“西方化”会影响中国的外交战略取向。

1.3.4 中国若干人员中同样存在着对俄不了解、不放心的一面，尽管这远远不是主流。与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相对应，中国居民“对俄历史文化的认知不足”，

“对俄发展前景缺乏理解”，同样对两国关系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在中国部分民众中对沙俄和前苏联时期的不良记忆也未消失。

1.3.5 我们既要肯定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的战略合作的丰厚成就，同时也必须承认这一进步仍然与国家间的竞争关系在一些领域同时并存。在强调发展中俄共同利益的同时，对于如何赋予各自独立发展的空间，如何提供更多的策略灵活性，并非是所有层面、所有领域、所有精英与执行干部都做好了思想准备。从深度上看，中俄关系与美国同其主要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相比，仍有相当不足。

二、中国和俄罗斯的应对

2.1 在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俄罗斯重新崛起的背景下，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俄关系势将重新定位。其主要内容既包含了新兴经济体在未来国际秩序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也包含了中俄间相互关系的重新提升。

2.1.1 苏联解体以来的 20 年，俄罗斯根据实际变化，积极调整对华关系。中国在俄国外交序列中已经仅次于美国（欧盟不作为整体）。如何探索未来的中俄关系模式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2.1.2 中国经济模式是在中国逐步加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它是发达国家主导的贸易体系的伴生物，也是与俄罗斯全方位战略合作的产物。当前中国正在推动成长模式的转换。这种以增加中国内需为中心的产业结构调整将给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国带来比此前更多的发展机遇。

2.1.3 对于上述新的发展趋势最有效的双边和国际应对，是建立起中俄“利益和认知共同体”，使得中俄两国的发展内在地相互嵌入，并使其同时和谐地成为亚欧大陆史无前例的一体化进程的一部分。这就是说，中俄在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同时，主动推动从东亚、东南亚到大中亚到欧盟的“大欧亚”合作。

2.1.4 “利益与认知共同体”的建立，将推动中俄从根据议题和利益为导向的当前组合状况过渡到互为战略支撑的更高层次合作。这种“利益和认知共同体”除了两国熟知的在事关双方直接利益的领域合作外，还将在与各自利益上不显示直接利害关系的方面加强合作。“认知与利益共同体”将改变中俄关系过去更多受外部环境/压力驱动的格局，而更加注重“内生性”的要素。同时，着眼于未来全球大趋势和人类共同利益的需要，中俄也可以从“大欧亚”合作空间中获得更多的发展红利。这不仅是姿态的体现，也是中俄走向成熟大国的必要心理和知识准备。

2.1.5 在这一背景下，中俄关系应表现出双方共同解决全球和地区的中长期问题，以及开诚布公地讨论伴随着两国“双崛起”过程而可能产生的矛盾和分歧的政治意愿，即在更宏大的格局和视野中处理两国关系。

2.2 中俄关系的当务之急是增强两国从精英到大众的普遍的相互信任。

2.2.1 当前中俄之间的相互认知包含着明显的离散性因素：一方面，俄方的国家和地方精英以及学术精英对中国和中俄合作的认知有了积极正面的变化，而另一方面，俄公众在媒体影响下对中国、中国人、中俄合作的认知，经常处于无知和误解的状态，这无疑不利于构建中俄合作的良好氛围。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反之，也存在类似的状况。

2.2.2 如果不能在一定时期内认真扎实地推进中俄之间更深层次的相互交往和更深层次的相互认知，中俄关系有可能贻误时机，甚至因战略失当而陷入困顿。

2.2.3 有必要开拓广泛的沟通管道，推动俄罗斯涉华认知的正面转向，巩固俄罗斯人对中国认知的客观理解，从而为两国“认知与利益共同体”的构建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对于中国来说，存在同样的任务。中俄双方对于各自的理念取向可能不能完全认同，但是完全可以深化认知与理解。

2.3 在“利益和认知共同体”框架内，从双边层面上，中俄关系未来的优先发展方向和新的增长点应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 围绕未来世界的总体构想等问题加强体制间的交流与合作；
- 加强高科技领域的广泛合作；
- 推动中俄毗邻地区的发展战略对接，实现共同发展。

2.3.1 本着改革和创新的精神，中俄可就法制国家、政治改革与政治稳定、相互依赖、责任共担等议题进行对话。在本轮金融危机背景下，两国还可就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等问题联合设定国际议程，从而保障共同利益。

2.3.2 高科技合作可称为中俄关系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重要驱动力。俄方可以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以及中国在全球的销售网络要素，形成“俄罗斯技术+中国生产能力+中国市场+全球销售网络”的模式，从而实现共赢。

2.3.3 中俄毗邻地区合作将是审视中俄关系实现战略升级至“认知与利益共同体”的关键指标。而对俄罗斯东部地区的“新开发”以及建成为真正有效的“现代化伙伴关系”，可作为最核心的要素。这一合作首先应建立起互联互通的交通基础设施。要充分考虑俄的关切，在俄境内开展深加工合作和非战略性资源的广泛合作，加强农业、旅游、人文等领域的广泛合作。中俄边境地区的合作远不能只局限于边境地区，而需要集中双方各自的全国规模和层次上的资源与智力加以支持。

2.3.4 上述合作并不排除第三方的参与。相反，未来中长期时段内应努力将中俄双边关系实现“多边化”，尤其是在俄东部开发问题上。中国并不追求“自私”的发展，希望中俄双边的合作同样可以给本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国家带来同样的“红利”，进一步促进“大欧亚”地区的合作。事实上，中俄在毗邻地区的合作必然会带

来外溢效应，长远看可能成为东北亚地区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

三、亚太地区新的国际合作模式

3.1 亚太地区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复杂变化，机遇与挑战同步增加。亚太依然保留着冷战的残余结构，不稳定乃至危险因素甚多，需要中俄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共担责任。

3.2 中俄在亚太地区应具有双重角色定位：一方面，两国是亚太地区安全的维护者；另一方面，两国是亚太区域合作的推进者和服务者。

3.3 中国应加大对亚太地区事务治理的投入。俄罗斯可以改变目前在政治和经济上参与亚太事务明显不足的局面。中国不仅不会阻碍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会积极推动和支持一切俄罗斯旨在维护亚太地区繁荣、稳定和发展的努力。

3.4 中俄两国有必要主动提出并推动亚太地区的国际议程设定，担负起“服务型大国”的责任，给地区发展和繁荣带来更多的公共产品。因此，这种议程设定并非仅着眼于两国的国家利益，而是基于与本地区其他国家协调好的共同利益。

3.5 以 2012 年符拉迪沃斯托克 APEC 峰会为背景，以下议程值得纳入中俄联合倡导的视野：

- 亚太地区能源合作体系
- 亚太地区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进程
- 亚太地区的金融稳定与合作机制

3.6 进一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使其在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地区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3.6.1 按照宪章规定，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多功能的地区性国际组织。目前其经济合作明显滞后于政治和安全合作，这种不平衡已经影响了组织的发展前景。上海合作组织如果不能在经济合作上有所作为，在极端情况下，将有可能会在中亚事务中逐步虚无化和边缘化。

3.6.2 在安全局势逐渐改善并同时存在其他安全机制可解决中亚国家安全需求的情况下，需要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以中俄合作的方式强化其经济组成部分。从长远看，这是中亚乃至“大中亚”稳定与否的核心要素。

3.6.3 中俄作为大国，应充分考虑中亚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主体的现实，深入研究中亚国家的需求。

3.6.4 应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外设立单独的中俄中亚问题对话机制。中国尊重

俄在中亚地区的传统影响力。中俄双方在中亚的合作，一切以是否有利于中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和繁荣为目标。

“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用俄方提纲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为稳定、和睦的关系典范之一。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下所积累的经验以及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资源和影响是双方积极协作的前提和手段。这种相互协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包括研究制订共同应对全球和地区挑战、在亚太地区和全世界范围内团结其它国际关系参与者的方法，以及深化双边合作并将其提升至新水平。

一、面对当前挑战的俄罗斯和中国

1.1. 俄罗斯和中国在当前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国际—政治问题首先包括：国际关系中正在增长的无序性、全球和地区层面上对政治和经济进程控制力的下降。

1.1.1 加上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普遍的相对衰退，这一问题将加剧整个亚太地区的、尤其是中美关系的紧张程度。在此居中心位置的是中美之间为争夺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优势地位而业已开始的隐蔽的竞争。然而，潜在冲突的深层原因其实是——中国正成为西方发展道路有前途、有成就的替代者。

1.1.2 目前，中国避免陷入与美国的激烈竞争关系。北京通过客观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扩大自身的影响，目前这是成功的。然而，在西方整体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的发展可能会引起美国及其盟友实施针对中国的遏制战略，或者将中国引入冲突。甚至可以预测，将来，特别是当华盛顿政权急剧更迭时，美国将挑衅中国，使之与其进行对抗。中美关系的军事化和军备竞赛，首先是海上力量的竞赛，这对于中国的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提升和世界经济的稳定，都是危险的。

1.1.3 在地区层面，其他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对于中国的不信任感、甚至是顾忌感日益增强的问题愈发明显。这并非由本身特别热爱和平的中国的政策所招致，但客观上又源于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快速发展。这类情绪对中国非常不利。中国无意建立地区霸权，其目标是可持续发展及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指标。

1.2 俄罗斯在经济和政治上对亚太事务参与明显不足是一个单独的挑战。

1.2.1 俄罗斯唯一扮演关键角色的领域是军事—战略领域。实质上，俄美核均衡排除了在全世界、包括在亚洲范围内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俄

罗斯间接地“掩护”了、并正战略性地“掩护”着中国经济的跃进。然而，在亚太地区俄罗斯暂时无法充当中国和美国（西方）之间充分意义上的平衡器，二者单独直面，因而无法稳定地区安全局势。

1.2.2 此外，可以看到围绕俄罗斯的潜在地缘政治斗争的真实轮廓。“俄罗斯奖品”（优先获取俄罗斯规模空前的、运输安全的自然资源，以及进入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发程度较低地区的机会）的存在正成为引发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中国的走强不会威胁俄罗斯的利益。但其他国际关系参与者的不当反应可能在新世纪成为国际稳定最重要的挑战。俄罗斯和中国必须防范这一点。

1.2.3 最后，存在着政治上对俄罗斯的争夺——试图影响俄罗斯外交取向，以制衡中国。为避免这种争夺的消极后果，俄罗斯和中国应发展目前尚有不足的多层次战略对话。

1.2.4 必须承认，尽管对华关系友好，但对中国的顾忌情绪在俄罗斯开始滋长。这可能会推动俄罗斯探寻与西方结成具有反华倾向的战略同盟。事态朝这一方向发展，对中国、对俄罗斯本身、对亚太地区以及全世界都将极为不利。事态发展亟需新的解决方案，哪怕是在思想层面上的。

1.2.5 大中亚地区不断增长的不稳定性是俄罗斯和中国几乎无法逃避的挑战。在美国和北约撤离阿富汗以及阿富汗明显沦为地区不稳定的源头后，这种不稳定性可能会明显加剧。

1.3 在双边层面，中俄经济关系的质量落后于政治关系，而后者在诸多方面的发展仍不够深入。

1.3.1 两国贸易额尚不高，且明显向原料领域倾斜。2000—2008 年间，自俄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例平均为 2.14%，对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例平均为 2.19%。

1.3.2 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商品种类以矿物产品（主要是原油和石油产品）、原木、较少量的化工产品、金属和金属制品为主。自中国进口的商品种类主要是：机器、设备和交通工具；纺织品、鞋类；金属和金属制品；化工产品。俄罗斯在中国工业产品进口中所占份额的变化非常明显：1997 年时约为 30%，2007 年不足 3%。相当部分贸易是“灰色”性质的。

1.3.3 然而，很大程度上决定合作伙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相互投资水平低下，正引起更大的担忧。专家估计，中俄相互投资规模仅相当于中美间的 1/1400，按各类形式评估均不到 30 亿美元，这甚至远低于俄罗斯与一些欧盟小国间的投资水平。

1.3.4 中俄经贸关系已国家行为化。私有企业，特别是中等企业的参与规模较小。除零星个案外，中俄企业都未在对方交易市场上发行有价证券。中俄边境地区

的合作潜力，双方实施共同的交通和生产项目的潜力都没有得到利用。

1.3.5 专家层认为，经济关系的滞后已经制约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政治伙伴关系。必须承认，对俄罗斯而言，中国既是未获利用的机遇，也是潜在的挑战。不过这种挑战主要源于俄罗斯国内的原因，与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发展不足密切相关。

1.4 解决这些问题应立足的背景是：不断增长的一系列综合性新挑战——全球气候变化、世界各国总体上不断加剧的粮食、淡水和资源短缺。

二、俄罗斯和中国的应对

2.1 对于这些挑战最为明显的双边和更广泛的国际应对将是引入一揽子措施，旨在改变中俄经贸关系局面以及将俄罗斯和谐地纳入亚太地区的劳动分工。对俄罗斯东部地区的“新开发”以及建成真正有效的“现代化伙伴关系”可成为这一战略的核心要素。

2.2 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发展战略框架下，投资开放应占据中心地位。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建立亚太地区的现代资源基地、建立资金密集型深加工生产企业，建立高产农业。这需要两种关键资源：投资和技术，可由中国、美国、日本、东盟国家和一些西方国家提供。中国以及其它亚洲国家将获准取得非初级加工的俄罗斯资源，以及亚洲日益短缺的农产品。中亚国家、中国、印度，以及长远来看朝鲜也包括在内，这些国家将提供西伯利亚和远东所匮乏的劳动力。

2.3 在中俄“现代化伙伴关系”框架下，区域层面——中俄边境地区共同和谐发展战略合作基础上的合作，应占据重要地位。与此相关，在俄罗斯建设大型物流中心，而非仅计划在中国境内建设；在俄罗斯境内发展港口中心，首先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纳霍德卡以及远东其它港口，应成为优先的投资方向之一。必须加快建设一些连接中俄的公路干线。

2.4 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俄罗斯进口中国的“绿色能源”技术、吸引中国投资对俄罗斯能源产业进行现代化改造以及降低俄罗斯能源中的煤炭利用量可发挥重要作用。对俄而言，这意味着可以“紧拴”在中国和亚洲“绿色技术”的引擎上，完成真正的技术飞跃。

2.5 为了提高中俄贸易关系的质量，必须制定西伯利亚和远东林业和木材加工综合体的投资新战略。继续半合法化的俄罗斯木材出口对于俄罗斯和中国都不利，因为在中国境内加工原木，会伴随额外风险和水资源的浪费。中国和西方对俄罗斯林业综合体（从砍伐到成品生产以及森林复建）投资，以换取中国对俄罗斯林木加工品和纸浆一纸张产品的优惠使用权，是具有前景的。

2.6 在农业领域，俄罗斯增加向中国出口耗水量大的农产品（谷物和肉类）富有前景。这可使中国节省本就短缺的水资源，由俄罗斯来填补这个需求不断增长的市场。必须积极吸引中国和西方向该领域投资。

2.7 从粮食贸易（农产品展销会、农业企业代表联席研讨会、大规模投放产品广告）视角看，增强中俄相互间的吸引力有前景且有必要。中国从 2003 年起成为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是俄罗斯出口商的巨大市场。尽管中国有意扩大俄罗斯农产品在进口中的份额，但中国自俄罗斯进口粮食占其进口总量的份额暂时不大。

2.8 发展俄中农业领域的科技合作意义重大。中国农业领域的科技密集程度接近世界领先水平，而俄罗斯的工程师们受世界许多国家所青睐。俄中科技合作首先应在农工综合体中发展。

2.9 应有其他国家积极参与提高中俄经济关系质量的实际措施和项目，以消除对其潜在的反西方性质的顾虑。“美、中、日和其他国家投资面向亚洲市场的俄罗斯产品和资源”，这一原则能为整个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做出显著贡献。在俄罗斯提议的建立欧洲大联盟^①、通过签署《集体安全条约》最终结束欧洲分裂的框架下，俄罗斯和欧盟的接近将促进上述任务的实现。

三、亚太地区新的国际合作模式

3.1 在更广泛的国际范围中，将美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引入中俄合作，应建立在共同解决地区稳定和国际化挑战的基础上。为避免在资源保障等领域世界各国关系走向军事化，现在就必须在缓和气候变化、粮食及水资源短缺造成的负面影响方面制定共同的立场和应对措施，建立共同的战略并制定有助于实现共同利益的具体方案。

3.2 很显然，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实力制约着其进入现有相互关系体系和国际—法律领域的可能性。必须建立新的地区模式，以解决主要的问题——中美关系中对抗性的潜在上升。完成这一任务没有俄罗斯的全面参与是不可能的。

3.2 鉴于此，在筹备 2012 年符拉迪沃斯托克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背景下，考虑建立“亚洲赫尔辛基进程”型的国际磋商机制，以及在更小范围内的“中国—俄罗斯—美国”机制是适宜的。这将提高决策中相互间的信息透明水平，其中包括在军事—政治领域。长远看，可能朝建立特殊的国际模式——“太平洋安全和发展公约”发展。

3.3 必须为东盟国家和亚太地区其它中小国家建立安全和主权保障体系。其条

^① 参见《К Союзу Европы》.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групп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М.: РИА «Новости», 2010.

件是必须安排好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稳定的对话，制定确保所有亚太国家平等安全的国际—法律协定。缓和朝鲜半岛局势、缓和俄日、中日、日韩（朝）和中越矛盾是需要共同研究的地区性问题。

3.4 必须与美国、印度、其它地区大国保持紧密协作，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建立起围绕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大中亚”局势的稳定的中俄协作关系。可能要有印度的积极介入。

3.5 目前，需要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迅速强化其安全组成部分。显然，上海合作组织的潜力利用不足，滞后于当前与未来的需求与挑战。

3.6 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必须努力就某些问题建立中俄对话和“俄罗斯—中国—美国”对话，这些问题包括“后京都时代”保持对于中国有利的“清洁发展机制”^①，以及于2012年后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转移未使用的排放份额^②。此外，中国可以支持俄罗斯争取在新协议中把俄罗斯森林视为二氧化碳的吸收者。另一个对俄罗斯和中国都重要、且必须与美国对话的方面，是可能引入碳保护关税措施的问题（对于生产过程中有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产品征收特殊的税种）。

3.6 在俄中关系中，在“中国—俄罗斯—美国”“三驾马车”框架下和有其他亚太国家广泛参与的合作中，信息政策和提高相互认识水平应当占据一个中心的位置。鉴于此，必须发展一些项目，以提高有关经济、文化和社会知识的水平和质量，迅速扩大高校间的合作。必须建立大规模的中俄大学生和大学教师互换项目，并吸引美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参与其中。可考虑研究由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顶尖高校共同实施“三方文凭”项目问题。

【Abstract】 The main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structures for the next 10-20 years considered by the Russian side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declin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 in general and the rise of China, the Chinese side is inclined to believe that in the long term, trend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major powers to maintain global peace and development are likely to exceed the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m. China will continue to maintain a modest and cautious attitude to everything, will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develop innovations and assume mor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The Russian side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and China's growth, the rivalry of the parties around Russia will

① 《京都议定书》针对发展中国家引入的特殊投资机制，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中国利用外资已经实现了大约1000个减排项目，总额达数百亿美元。

② 俄罗斯未用完其份额，获得了在今后使用排放剩余份额的机会。

become more apparent as it is related to the natural resources of Russia and its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in Eurasia, and to a greater extent is related to the fact that Russia may be the “last straw” in the balance of power. Chinese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basis of a resurgent Russia has been laid. Compared to China, Russia may be in a relatively 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ystem. As far as Sino-Russian bilateral relations are concerned, the Russian side primarily pays attention to bilater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saying that the main problem lies in the fact that economic relations are far behind the political as well as raw material trade patterns etc. Chinese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main challenge for the long-term Sino-Russian relations is not the asymmetr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but the ability of both parties to adapt to the new position, and present an opportunity to establish mutual trust. The Russian side believ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new model of reg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o eliminate the main issue of potential growth of confrontation in the Sino-US relations. China believes that Russia may change its current apparent lack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articipation in Asia-Pacific region. China and Russia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promote and advance international agenda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e liable as “service-oriented great powers” to bring more social benefit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Concerning the situa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the scientists of both countries believe that Central Asia is not a competitive field for Russia and China as well as not a region where the conflict between Russian and China may appear.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China, Russian, Community of awareness and interest, service oriented great power, harmonious developmen

【 Аннотация 】 Основными вопросам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на ближайшие 10-20 лет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считает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между упадком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и Запада в целом, а также подъёмом Китая; кита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склонна считать, что в длитель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тенден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круп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по поддержанию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мира и развития, вероятно, превысит конкуренцию и конфликты между ними. Китай будет и впредь сохранять скромное и осторож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о всему, будет повышать качество обучения и развивать сферу инноваций и брать на себя всё больш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пришла к выводу, что в условиях упадка Запада и роста Китая,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сторон вокруг России будет становиться все

более очевидным, это связано как с природными ресурсами России и её важны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положением в Евразии, так и в большей степени с тем, что Россия может быть «последней каплей» в балансе сил. Китайские ученые считают, что основа возрождающейся России уже заложена.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Китаем, Россия в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ы может находиться в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выгод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в основном придаёт значение двустороннему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гла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заключаются в том, чт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ходятся далеко позад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а также сырьевой структуры торговли и т.д. Китайские ученые полагают, что главным вызовом для долгосрочных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является не асимметр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а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приспособиться к новому положению, и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установить настоящее взаимное доверие.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необходимо установить новую модель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развития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чтобы разрешить основной вопрос потенциального увеличения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в кита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Кита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Россия может изменить своё нынешнее явно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участие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должны взять на себя инициативу по выдвижению и продвижению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вестки дня, нест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как «сервис-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ые державы», приносить больш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благ для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процветан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ситуа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учёные обеих стран считают, что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не является конкурентным полем для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или регионом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обстановка, Китай, Россия, сообщество понимания и интересов, сервис-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ая держава, гармоничное развитие

(责任编辑 常喆)

2030年全球战略预测*

А·А·邓金 等**

【内容提要】未来20年世界发展演进中将不会出现过往20年间较为典型的剧变和震荡。美国将在创新、金融和军事领域保持全球领导者的地位。中国地位的加强将最大程度地影响到全球权力均衡。以市场经济和民主为基础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将维

* 本文系俄罗斯重要智囊机构——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РАН，缩写为ИМЭМО）发表的《2030年全球战略报告》的简要版。此报告为该所一批从事国际关系、地区事务和国别研究的专家采用该所独家开发的长期预测方法，在相关GDP、劳动生产率、直接投资等科学数据基础上集体创作的跨学科研究成果。该报告旨在提供全球经济和国际秩序未来的长期发展趋势，尤其是为俄罗斯面临的风险、挑战和机遇作出预判，其俄文版已于2010年底呈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Д. А. Медведев）等政要，并获得好评。2011年4月20日付印的英文版本在结构体例和文字表达上对早前的俄文版本作了适当调整。今年6月，报告主要参与者曾赴美进行学术交流，其间受到对2010、2015、2020、2025全球战略大势作出预测的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高度肯定。

经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ИМЭМО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荣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В·В·米赫耶夫（В. В. Михеев）引荐，由ИМЭМО授权，《俄罗斯研究》独家中文发表。本杂志社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

需要说明的是，译文是简要报告的全文翻译，未作任何删节，仅在格式上作了更符合中文阅读习惯的调整。

** А·А·邓金（А. А. Дынкин），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2030年全球战略报告》详本的各章负责人分别为：А·Г·阿尔巴托夫（А. А. Арбагов，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В·Г·巴拉诺夫斯基（В. Г. Барановский，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Е·Ш·贡特马赫尔（Е. Ш. Гонтмахер，经济学博士），Н·И·伊万诺娃（Н. И. Иванова，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И·С·科罗列夫（И. С. Королев，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Г·И·马恰瓦里阿尼（Г. И. Мачавариани），В·В·米赫耶夫，В·И·特鲁布尼科夫（В. И. Трубников）。详本编辑委员会负责人为：И·С·科罗列夫，В·В·米赫耶夫；成员分别为：В·Б·阿米罗夫（В. Б. Амиров），Ф·Г·沃伊托洛夫斯基（Ф. Г. Войтоловский，政治学副博士），Е·А·克柳耶娃（Е. А. Ключева），Н·А·科索拉波夫（Н. А. Косолапов，历史学副博士），А·В·库兹涅佐夫（А. В. Кузнецов，经济学博士），С·А·卢科宁（С. А. Луконин，经济学副博士），Е·Н·特萝什金娜（Е. Н. Трошкина），Е·С·赫辛（Е. С. Хесин，经济学博士），В·Г·什维德克（В. Г. Швыдко，经济学副博士），А·С·尤西波夫（А. С. Юсипов，经济学副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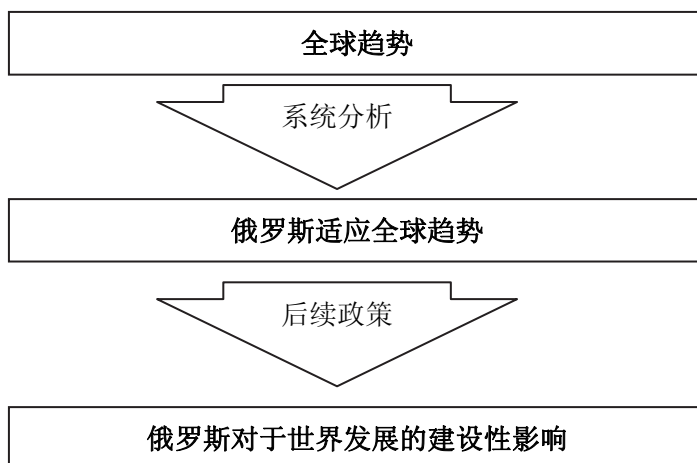
持其世界主导思想体系的地位。意识形态将更频繁地与全球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趋势相关联。这将成为未来全球治理意识形态的基础。在 2030 年前，世界文化体系以及各种文化内核发生大规模变化的可能性极小，同时很难形成创新文化和生产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全球文化。全球治理的机制和原则将继续形成。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为创新和全球化。全球化在未来 20 年将继续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但在预测期的前半段，将始终可以感觉到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限制增长的主要因素来自于新的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以及保护主义的抬头。2011-2030 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将达到 4.0%到 4.5%。中国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拥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是 2030 年前的主要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划分将发生改变。增长质量和竞争力标准将决定一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中国在 GDP 规模上至少会接近美国的水平，但 GDP 中的创新成分及其他质量型的成分方面仍将落后于美国。中国将转变为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并将成为维系全球内需的主要因素。世界将不再遭受能源短缺的困扰。中国和其他一些亚太国家、印度以及拉美的主要国家在国际资本流通中的比重将会增加。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性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时间。“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的作用将发生改变。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的活动和影响领域将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不仅会侵蚀一些国家的社会体系，还会招致一系列国际社会问题（移民、人口、种族冲突等）。全球安全方面，世界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相互协作的趋势将压倒相互对抗的趋势。未来 20 年，为避免自身不被边缘化、能应对未来的风险，以及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新机遇，俄罗斯必须使自己的内外战略有效地适应全球发展的主要趋势。

【关键词】 国际格局 全球治理 世界经济 国际货币体系 中国 美国 俄罗斯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1)04-0017-(31)

一、导 言

解决长期预测的复杂任务，要求对全球趋势进行系统分析，进而提出具体的评估和建议。在此基础上才能合理地制定俄罗斯发展和加强俄罗斯安全的战略——目的是通过强化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增强俄罗斯对世界进程和全球治理的影响，以提高俄罗斯人民的生活质量。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学者们所积累的经验 and 原创的预测方法，使我们可以揭示出具有战略影响的重大的长期趋势的本质特点。同时，作者们也把国际范围内的预测实践考虑在内了。



图一 本报告的总体理论框架

对于政治—经济长期预测的政治需求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之交。

“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的预测享有最高的知名度，该俱乐部的预测重心在于现实的和假设的全球问题：发展不均衡、人口增长、资源匮乏、贫穷、军备竞赛、宇宙空间和世界海洋的开发等问题。

1970—1980 年，全球预测开始呈现繁荣的景象。“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勃兰特委员会”（The Brandt Commission）、“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等机构的预测以可能性评估为基础，并引起了最大的国际反响。必须指出的是，其中有许多预测提出了影响社会思想的任务。

1980—1990 年，全球长期预测的兴趣逐步有所下降。比起全方位的预测，对于小范围专题的研究需求更大。

21 世纪初，世界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相互依赖的加强激发了对于战略预测的新一轮兴趣。

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出现了大量专题性的中期预测，这些专题包括经济、能源、生态、技术发展、人口、教育等。

全方位长期预测的复兴正成为当前的主要趋势。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美国、欧盟和中国对此十分重视。

代表性预测作品

（一）国际组织的预测

《全球环境展望》(Global Environment Outlook)	联合国环境项目规划署
《全球经济展望》(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全球金融发展》(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世界能源展望》(World Energy Outlook)	世界银行
定期发布的预测研究(结合大量的统计数据)	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
地区性预测。如《亚洲发展展望》(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亚洲发展银行
《多重未来项目: 2030》(Multiple Futures Project- Navigating towards 2030: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北约

(二) 各国预测

1、美国

《年度威胁评估》(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美国情报部门为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制订
《全球趋势》(Global Trends) 《勾勒全球未来与全球治理》(Mapping Future and Global Governance)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大西洋理事会
《全球预测: 2008 年头号挑战》(Global Security Forecast: the Top Security Challenges)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2007 年发布
就安全和防务问题、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医疗卫生和教育、生态所作的专题性和区全球趋势预测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兰德公司

2、欧盟

《2025 年的世界: 崛起的亚洲和社会生态转型》(The World in 2025: Rising Asia and Socio-Ecological Transition)	欧盟委员会资助于 2008—2009 年制定
《2025 年的世界: 欧盟该如何应对》(The World in 2025: How the European Union Will Need to Respond)	智库网络于 2007 年为欧洲中右翼政党所作的预测
《2030 预测报告》(Forecast 2030)	由欧盟第七研发框架计划(2007—2013)资助的多国“预兆”项目

3、中国

已完成数份年限截止到 2020、2030 和 2050 的长期预测, 其重点在于对中国经济、科学、技术和创新的长期发展预测。

战略预测

一方面, 全球战略预测研究尚未取得特别的发展。目前全球战略预测中较为知名的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和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系列预测报告——2010 年前和 2015 年前的《全球趋势》。2010 年, 在此系列报告的框架下, 发布了预测报告《2025 年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2025)。此报告预测了国际机制、全球治理和规制进程, 以及主要大国在安全、能源和社会问题等领域相互协作的发展走势。

另一方面, 世界上对于长期预测的兴趣正在持续增长。

对于对长期预测的兴趣正在增长中的俄罗斯而言, 分析未来 20 年的世界发展,

对于自身的现代化任务尤为重要：对于这一时期俄罗斯面前呈现出怎样的世界前景必须有清晰的认识。

历经 20 年（1992—2010）转型，俄罗斯发现自身处于一个世界主要大国再也无法向俄提供明晰引领指标的境地。这种局面不仅可归因于俄罗斯政治及行业精英习得的成熟的转型政策经验，同时也因 2008—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而产生。后者已在促使主要全球角色寻求经济、金融、安全、技术和气候变暖领域的“新规范”。俄罗斯不得不为这些全球趋势作出自己的贡献。

俄罗斯面临的任务是完全参与并适应政治、军事、经济、社会领域的全球发展趋势。显然，违背全球主流发展趋势，国家转型是不可能成功实现的。

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展望

2030 年前世界发展的战略评估延续着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长期预测传统。

与研究所以往的预测（2001 年的《世纪之交的世界》和 2007 年的《2020 年前世界经济预测》）相比，《2030 年全球战略预测》的关键区别在于，它第一次给出了世界全方位的发展图景，不仅包括经济，还有意识形态、社会、国际政治和军事领域。

《2030 年全球战略预测》是跨学科研究。此报告的基础是大批长期研究不同国际问题、不同地区和国别的专家对于未来预测的最可能的图景。依据 GDP、劳动生产率、研发投入，以及在本研究所独创方法帮助下获得的其他指标所进行的预测评估，是本项预测工作的统计基础。

全面考虑完全不同的进程间（经济、金融、社会人口、科技、组织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心理和文化进程）的相互关联，使我们可以形成未来 20 年间全球根本变化的完整画面。

这样的方法使研究者有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到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秩序，以及国际体系的单元、结构、机制和主要行为者的变与不变的趋势上来。

其主要任务是指出，对俄罗斯而言，关键的世界政治经济趋势将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和发展可能。

我们希望，这项工作对于国家当局、商界、专家界和一般的公众都是有益的。

二、总 论

世界上正在出现这样一种认识，即只有各国在解决全球问题上共同努力，各国

才有可能成功发展，尽管某些边缘化的制度、某些社会政治和宗教种族集团的激进主义正在增长。

论点：未来 20 年世界发展演进中将不会出现过往 20 年间较为典型的剧变和震荡。

主要的全球变化及趋势

1991—2010 年	2011—2030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冷战结束 ●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瓦解 ● 苏联解体 ● 欧盟和北约的扩大 ● 中国的市场改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世界治理机制将进行根本性改革； ● 全球和地区大国在维护国际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将扩大 ● 在欧洲、亚太、拉美，以及较小程度上在非洲、中东和南亚，现有的地区性一体化机制将得到巩固并建立新的地区性一体化机制 ● 中国逐步推进民主改革 ● 民主分布区的扩大与民族主义的加强将得以结合

国际进程的方向将是：在金融稳定、社会发展、创新活动和安全等领域加强协作，并扩大全球和地区治理机构的权力。

大国关系最重要的特点

1991-2010 年	2011-2030 年
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失败	安全问题上的全球合作。“负责任的大国”
保持安全领域传统目标的优先方向：军事力量的增长和在海外使用武力	安全领域新的优先方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个体安全 ● 产权，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 ● 确保信息安全 ● 居住环境的安全
“冷战”时期形成的国际安全体系根据新形势开始转型	俄罗斯和美国摆脱“冷战”时期的相互核遏制，向相互核安全发展并在反导系统上展开合作
在消除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恐怖主义、海盗、流行病、灾难等）意识到国际军事和其他力量组织开展合作的可能性	在国际军事政治合作中，将非传统安全威胁置于首要地位
出现新的事实上的核国家（印度、巴基斯坦等）	在欧洲大西洋空间，以美国—欧盟—俄罗斯的合作为基础建立新的安全机构
西方在“遏制”和“吸入”中国之间寻找平衡	在跨太平洋空间，俄罗斯、中国与美国的新型关系将取代传统的军事政治同盟 中国加入全球领袖俱乐部

论点：安全与发展问题的全球化，将使主要大国的政治精英的战略思维发生变化。强化本国作为“力量中心”之一的任务将会转变为另一个，即行使“负责任大国”之能力，以应对共同的安全与发展挑战。

大国关系的特点将是：在解决全球安全问题上进行合作，在选择解决方案时开

展竞争：在此进程中既考虑其自身利益，又与其他大国利益相协调。

美国将在创新、金融和军事领域保持全球领导者的地位。中国地位的加强将最大程度地影响到全球权力均衡。

世界在面临着全新变化的同时，各国新一代领导人开始执政。他们成长于全球化和信息公开的背景之下，脱离了“旧思维”。这些人出生于 1970 到 1980 年，在 1990 到 2000 年接受教育，在 2000 年到 2010 年开始政治生涯。

反因素

与全球责任意识相关的反因素：

- 世界主要大国无法实现未来世界发展和国际安全的协作景象。这将导致大国关系中的竞争大于合作。
- 主要大国及其政治精英阶层不准备停止损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机构能力各异的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
- 面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毒品贸易等威胁的全球蔓延，无法成功地形成有效的国际机制进行应对。
- 有影响力的国家和跨国利益集团在金融、能源和军事工业等领域的利己行为。

与全球化相关的反因素：

- 一些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全球化的国家中新民族主义（neo-nationalism）的勃兴；
- 无意为解决全球问题而放弃自己取得的发展成果；
- 跨国公司的影响范围扩大到其利益与主权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直接抵触；
- 超级富豪（super-rich）的切身政治利益之内容与国家利益迥异。当亿万富翁基本集中在美国时，这只是一个国家之问题。当下，亿万富豪所在国家的数量已大大增加，这一问题正在成为国际问题；
- 新的国际“百万富翁阶层”人数增加到其利益与传统认识上的国家中产阶级利益发生公开冲突；
- 对移民潮失去控制——同族均一社会面临被稀释的威胁已经发展到临界水平。

三、意识形态

论点：在未来 20 年，以市场经济和民主为基础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将维持其世界

主导思想体系的地位。

个人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价值观将更具全球吸引力，尽管有关资本主义模式稳定程度的讨论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刺激而日益活跃。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将进一步调整其国家（历史的和文化的）价值观，使之适应世界意识形态“主流”。它不会推出另外一套全球性的意识形态模式，但会尝试向世界提出一系列具有中国文明特点的新的普世概念，比如“和谐世界”。在对抗具有侵略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问题上，中国是西方谨慎的盟友。

反全球化主义、左倾激进主义、共产主义、种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家例外论、法西斯主义等思想仍将被边缘化。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这些思想都只涉及特定的社群。社会主义思想将保持其吸引力，但前提是在市场—民主制度之下，而不是在共产主义或是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支持全球化的社会民主主义”（globalist social democracy）及其新分支——重视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将成为社会主义思想最常见的形式。

“绿党”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日益增大。

论点：意识形态将更频繁地与全球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趋势相关联，而非仅仅集中于不同国家的内部政治生活。这将成为未来全球治理意识形态的基础。

全球化意识形态与此前一样，仍将面临攻击性、排外和孤立主义思潮的对立。

这种对抗的结果取决于某一团体在不同层面上建设性地组织其社会与政治力量的能力。一种认识正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即大部分的国家发展和安全问题需要全球或地区层面的参与。

在未来 20 年，平等思想和与此相关的对于社会公平的新解读将流行起来并颇具影响。

“非动荡的不平等”（non-destablizing inequality）思想将取代各种平等思想（共产主义、平均主义、家长制式的平等和机会均等理念等）。

这一思想的实质是，承认人的完全平等和绝对公平基本上是不可能达到的。但社会和政治结构支持这种无法避免、但可以调节的不平等，支持将对公平的需求维持在饱和水平，且这种需求不会导致社会政治的动荡。

宗教

宗教影响将发生参差不齐的变化。世界将面临如下情况：

- 伊斯兰教的分布区域在欧洲和美国将不断扩大，且穆斯林人数增加；
- 基督教世界中，非洲、拉美、亚洲的分量将增加；
- 印度教、佛教和犹太教的传播将陷入停滞；

- 对所有宗教都采取冷漠态度的人数将增加；

宗教对于新现实的适应将导致出现一些“混合”意识形态现象，比如拉美的“天主教社会主义”或者中东的“伊斯兰保守主义”等。

主导世界的精英将强调自身世俗思想和制度的普世性，并企图将其向其他意识形态空间推广。这将遇到未进入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一部分伊斯兰世界精英的抵制，这些精英力求保持自身的绝对权力。因此，发生宗教间冲突的可能性较大。

文化互动

全球化使文化互动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

- 所有的生活领域和全球所有区域；
- 在日常基础上；
- 大规模地；
- 在最广泛的地区——从合作地区到冲突地区和武装暴力爆发区域。

文化因素多样化的重要性，特别是跨文化协作的重要性，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通过各领域的活动和社会互动，将在未来得到提升。

由于文化的稳定性和惯性，在 2030 年前，世界文化体系以及各种文化内核发生大规模变化的可能性极小。

- 全球化不会导致各种文化间发生类似于国家间的战争和冲突的对撞，但会推动各种文化在共同的地域和空间内进行融合，以建立新型的全球社会生态。
- 全球文化的形成将影响到全球治理领域。
- 首要任务是，在全球社会生态和全球文化框架下，确保那些保持并发展人类创新潜力的机制和组织的领导地位。
- 这些机制和组织将越来越少地与特定国家联系在一起，而越来越多地与全球公民社会和全球精英的具体部门相关联。

论点：在 2030 年前，存在这样的威胁，即不可能或无力完成形成创新文化和生产文化（而非暴力文化和重新分配的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全球文化的任务。这将导致长时段内的全球发展和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巨大的根本性转变放慢脚步。

四、全球治理

论点：全球治理的机制和原则将继续形成。

超国家经济政治治理的综合性机构 2030 年前将不会明确定型。但以正式的和非

正式的、传统的和新兴的国际机制为基础，将初步形成建立全球治理体系某些要素的稳定趋势。

向全球制度化进程开放的领域有：知识产权、金融、国际贸易、能源及大宗商品、海空运输管理、世界劳动力市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维和和解决冲突、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及贩毒、保障海运安全与打击海盗、与贫困和流行病作斗争、消除自然灾害后果以及气候变化。

建立旨在保护文化遗产、生物多样性和某些生态系统的全球监控机构的计划将得以推进。

在 2010—2020 年，对于利用全球意义的空间（世界海洋、北极、南极和外太空），将继续形成超国家规制的政策法律和机构基础。

每个类似的倡议都可能成为国际政治激烈竞争的对象，并引发国内政治冲突。

这一趋势将使国际社会就集体开发地球资源和近地空间的原则、方向和速度在世界范围内寻求一致的意见。

国际法

2030 年前，国际范围内法律规制的领域将会扩大。而跨境法律的演变则不会取得突破性进展。

打击非法移民和人口贩卖、以及版权和信息网络的保护等，将由于各国法律体系的差异而继续步履维艰。

很有可能会发生：

- 可关闭公开反人类、种族主义、极端主义及类似主张的互联网站的国际规制之通过。
- 承担起保护版权以及合作打击黑客和网络恐怖活动责任的国家增多。
- 国际信息法出台并成立相关法庭。
- 海洋法及海上安全法律基础的进一步发展。

五、经济

主要趋势

论点：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为创新和全球化。

在预测期的前半段，将始终可以感觉到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危机的长期影响将体现在证券市场的波状震荡以及由发展中和发达经济体双速发展（two-speed growth）导致的宏观经济不平衡的风险持续存在。

除了负面影响外，这一危机还具有积极的效应，因为反危机措施中包括了经济结构现代化、建立新的技术平台、人力资源投资等。

在未来 20 年，世界经济增长整体上不会受到资源保障（原料、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方面的制约，但个别地区将饱受此类问题的困扰。

发展进程图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

1991—2010 年	2010—2030 年
全球 GDP 年均增速为 3.5%	全球 GDP 年均增速为 4.0%到 4.5%
创新突破：英特网、移动通讯、电信等	新材料、生物工程、与人类健康相关（药剂学和医疗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生产和服务领域。节能技术（环保型能源）。新的人文和社会技术。非传统碳氢化合物来源。NBIC 会聚技术（NBIC-convergence）——纳米、生物、信息和认知技术的会聚
一体化进程：欧盟东扩；一体化思想在亚太地区的扩散；南亚、拉美和非洲的一体化发展较弱	保持欧盟的一体化发展进程。亚太地区金融和创新领域的一体化迈上新台阶：在“东盟加中日韩”机制框架下形成自贸区
开始形成真正的全球经济	超越金融行业后，所有的经济部门走向全球化，形成高技能劳动力、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智力服务、艺术创作的全球市场
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并复杂化	致力于增强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使实体经济对其依赖性降低
利用传统的全球金融治理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七国集团”等）	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机构。寻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的合法性，“G20”机制的作用
美国和欧盟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主要贡献	中国、美国、一组中等国家、欧盟、印度将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主要贡献
中国是消费品生产的“世界工厂”：发展中经济体	中国成长为全球主要的消费品市场：半发达经济体

创新

全球创新发展的主要方向为：

- 继续应用服务于采矿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信息通信领域的新技术；
- 继续开发新材料，以保证许多产业（电子、航空制造和汽车制造、建筑业）出现突破性技术；
- 开始在与人类健康相关的方面出现突破——生物工程、疾病诊断、治疗方法、新的医药制剂、病人看护等；
- NBIC 会聚技术（NBIC-convergence）基础上，出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全新技术；出现急剧扩大人的生物潜能的技术潜力；
- 为能源领域未来的突破做好准备。新能源在世界能源需求中的份额将扩大，但传统能源（石油、天然气、煤炭）和核能仍将处于主导地位。

那些在最广泛的科学学科开展基础研究、同时建立起最好的国家创新体系以保障创新成果源源不断的国家，将保持其创新经济领域的全球地位，也就是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

在未来 20 年：

- 美国将保持自己全球领袖的地位，最大范围地发展基础研究与研发。
- 欧盟将完全保持在某些方向基础研究中的地位。
- 许多中小发达国家，由于在渐进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中的快速进步，而为自身在“狭小的范围内”开辟新的机会。
- 中国急剧加快发展基础科学，但其整体水平仍将远远落后于欧盟和美国。
- 日本仍将在有限的知识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并将重点放在工程技术发展和创新产品以及将服务投放于市场。

论点：创新型经济（Innovation-based economy）将促使中产阶级巩固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同时，全球中产阶级成为创新产品的主要需求者和制造者。

全球化

论点：全球化在未来 20 年将继续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

和之前一样，世界经济的国际部分将高速发展：

- 世界贸易增长快于 GDP 增长；
- 国际投资的发展超过贸易发展；
- 世界成为一个公共的金融空间。

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将获得最大的发展。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继续在自由贸易区机制下发挥作用。

论点：亚太地区面向一体化的协同行动将获得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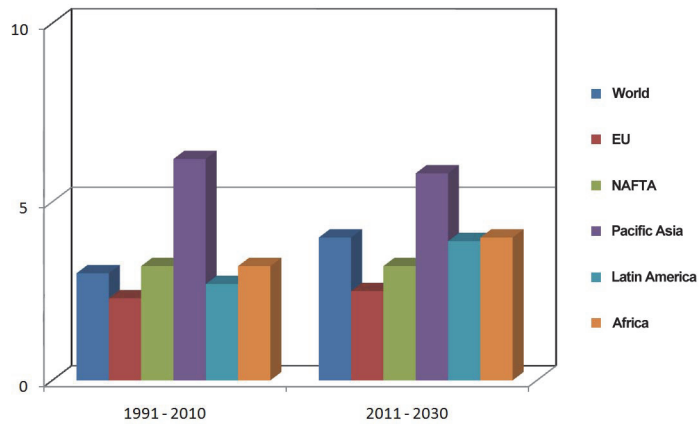
“中日韩加东盟”模式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促进区域内的需求，其结果是，有可能为每一个参与国带来 1%到 3%的 GDP 增量。

在世界其他地区，各种一体化模式的机制形成将会缓慢而较低效地进行。

在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将使两国无法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

在拉美和非洲（除了一些地域规模有限的方案之外），各国间难以相容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以及地区基础设施不发达等因素，将阻碍一体化进程。

波斯湾国家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将上升。



图二 各地区 GDP 年均增长率 (%)

限制增长的因素

论点：限制增长的主要因素来自于新的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以及保护主义的抬头。

第一个限制因素——金融危机。过去 20 年，世界发生了两次金融危机：

1997—1998 年的东亚的结构性及金融危机，

2008—2009 年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

如果世界金融大国无法做到下列两点：

- 建立新的世界金融安全体系；
- 制订全球统一的金融行业规则，例如，比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更广泛、更好的东西，

那么，2008—2009 的危机可能会卷土重来：

全球金融危机再次从金融市场开始，接着影响到证券市场和银行业，并且扩展到实体经济和社会领域。

中国的证券市场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中规模最大的证券市场，可能也是最脆弱的。

第二个限制因素是——最大型的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间的矛盾。跨国公司有自己的经济战略。这样的战略要求各国、地区以及国际社会的利益具有协调性。但确保这种一致性的机制尚未被创建。

第三个限制因素是——世界经济的官僚主义化和形式主义化。

官僚主义化出现在国际金融和经济组织的运作中，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组织通常根据表面数据（统计之类）评估局势，而对特定国家的制度性差异关注甚

少。

官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将成为跨国腐败的根源。

形式主义化出现在一些私立评级机构的运作中。这些机构对于某些集团和国家的评估，左右着投资者和国际机构的方向。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将出现评级机构，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将被打破。

评级机构的商业诉求及工作标准的缺失，而后者需要与世界经济所有主要角色协作，将降低其评估的可靠性并增加发生错误的可能。

增长速度和结构转换

论点：2011—2030 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将达到 4.0%到 4.5%。

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仍将保持过去 10 年的趋势：

- 服务业比重增加；
- 采掘业和农业比重降低；
- 传统产业和综合体中，创新和知识密集型产品生产、技术和服务生产的份额将扩大；
- 出现新行业、新技术、新产品；
- 主要发达经济体（美国、德国、英国及其他国家）将在新技术基础上贯彻落实“再工业化”的战略；
- 服务业将取得重要进展——与人类健康、教育需求、信息获取、通信手段、旅游等相关的服务份额将扩大。

论点：中国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拥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是 2030 年前的主要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划分将发生改变。

除了发达国家，我们在世界版图中将看到两个对立的国家群体：

- 一些成功进入了世界经济主要趋势的“中等”国家（巴西、墨西哥、东盟创始成员国和越南）；
- 找不到现代化所需资源的国家（一些非洲、拉美、南亚和东南亚国家）。

增长质量

论点：增长质量和竞争力标准将决定一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

传统的 GDP 规模指标再也无法展现世界经济的真实图景。这意味着传统经济结构占有优势的国家可能在表面上展现出更高的增长速度，但并不能成为真正的主导力量。

GDP 总量和人均 GDP 将不再在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中具有统治性地位。科技和创

新发展水平、个人质量、“绿色 GDP”水平等指标的重要性将得到增强。新的指数将不仅涵盖物质供应的消费，还包括人们对生活的个人切身感知和对知识商品及服务的消费。

论点：2030年前，中国在 GDP 规模上（按购买力平价计）至少会接近美国的水平，但在按现行价格计算的 GDP、人均 GDP，最主要的是 GDP 中的创新成分及其他质量型的成分方面，仍将落后于美国。

需求

以内需增长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将比纯粹的外向型更有意义。

到 2030 年，肇始于 1960 年代的以出口廉价消费品为基础的增长模式，即使是对最不发达的国家而言，也将无法提供增长的动力。经济增长特点转向质量型，技术密集型产品在世界出口中的比重将日益增加。

在欧盟和亚太，以及拉美（在较小的程度上）的一体化空间内，内需的因素将更加令人瞩目。

区域内商品流通的作用将得到加强。

世界经济不会受到消费需求的限制。

美国和欧盟消费需求的实际增长率将维持在适度水平——年均均在 2%到 4%之间。日本每年约为 1%。

另一方面，世界“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加，以及持续的城市化将在世界其他地区增加内需。

论点：到 2030 年，中国将转变为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并将成为维系全球内需的主要因素。

中国、印度、巴西以及其他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和进行中的城市化进程，将在相当长时间内扩大内需。

能源

到 2030 年，世界将不再遭受能源短缺的困扰。

能源价格将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争取能源效率将促进节能领域的技术突破。

新能源的开发工作将继续进行。但无论是生物能源还是其他的替代能源，都无法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一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的主要是发达国家，且在 2030 年之后才能感受到。

同时，技术进步将促进更高效地利用传统能源，特别是页岩气和矿井甲烷。

劳动力

创新经济对劳动力质量、劳动力积极性，以及创新产品的消费者的文化和教育程度提出了新要求。具有最发达、跟上时代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的国家，将拥有实质的竞争优势。

发达国家劳动力流向创新部门，将为来自中等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训练有素的移民提供新的机遇。这将对社会稳定和劳动关系平衡的全球体系形成挑战。

资本因素

世界经济不会遇到资本短缺的情况。

最不发达和增长前景黯淡的国家、以及发达经济体的传统产业，将会感到资本短缺。

发达市场投机资本过剩，将导致新的危机并增加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

对新的金融和银行业规制手段的需求将增加。

寻找有效的管理机制将在下列主要方向上展开：

- 对金融机构的投资、投机、抵押、商业功能将进行制度化划分。
- 对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引入新的税收和行政限制。
- 为非金融产业建立新的保险机制和“安全气囊”。
- 建立强大的国家（美国、日本、中国）和地区（欧盟、亚太）“救济基金”，以在危机状态下帮助大型金融机构和实体公司。

论点：中国和其他一些亚太国家、印度以及拉美的主要国家在国际资本流通中的比重将会增加。

在发展水平各异的国家经济体中，储蓄和投资发展的全球性不平衡将继续保持，并将带来新的金融危机威胁。

在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需求正在超过生产，投资正在超过储蓄。在新兴市场经济体，首先是中国，情况则恰恰相反。这些国家的储蓄过剩正在部分地弥补发达国家的储蓄不足。

然而，未来 20 年，中国的内需增长将改变这一局面。从绝对数值看，中国资本流向美国的量将不断增加。同时，中国本身的投资市场对本国储蓄的需求将以更高的速度增长。

这可能会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出现资本相对不足的新危险。

- 国家债务的增长将导致额外的市场风险。然而，发达国家能够建立某种国债管理体系，以预防或弱化对于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
- 中等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将发现自身陷入深度危机的境地。这要求设计出新

机制去拯救破产国家。

针对企业和破产国家的“救济基金”的形成，将在提供金融援助的问题上使“道义协商一致”的问题尖锐化：如何提供援助？给谁？在什么情况下以怎样的条件提供援助？这将涉及到大体上较为重要但已破产的公司、银行以及经济上的失败国家。

如果这些协商一致的共识不能形成，用损害广大人民利益去拯救大资本的方式摆脱危机，将使整个世界面临全球性震荡的挑战。

论点：政府和企业金融问题上的责任问题将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问题之一。

国际货币体系

论点：美元将保持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元和欧元在国际结算和贸易中总体的市场份额不会减弱。

在多边货币—金融管理和借贷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仍将保持其地位。但快速发展的“中等”国家在这些国际机制活动中的影响将日益增加。

与此同时，地区性“储备机制”将会形成，其作用将不断加强。

论点：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性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时间。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会加速，只有在中国外汇体系完全自由化之后才会开始。

中国正在认真权衡加快外汇兑换和金融交易自由化对其国内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的风险。

“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的作用将发生改变。

“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绝不会成为“G20”：这样庞大的多边机制实际上并不适合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作出决策，而“G20”中欠发达的成员国绝不会同意任何其他方式。

然而，主要问题是，那些拥有国际性货币的国家的利益以及其他成员国的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

在多边外交框架下，“G20”的想法是把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布局置换到金融领域。金融协作的任务在于，借助于最有影响力的行为体，确保全球金融的稳定。

“七国集团”将逐步转变为国际主要货币发行的“俱乐部”。国际货币包括两种主导货币（美元以及德国和法国拥有决定性地位的欧元）以及“第二梯队”货币（英镑、日元，还有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后的人民币）。

新金融模式的制度化，将提高全球治理的合法性。

世界公司地图

论点：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的活动和影响领域将被补充进传统的（以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经济地图。

跨国公司的传统结构将发生变化。美国、加拿大、日本、欧盟的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地位将因受到中国、印度、巴西和其它一些中等国家的竞争压力而退缩。

在跨国公司共同体中的权力均衡变化将为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创造新的机遇。公司层面的一体化将促使：

- 主要大国资本利用效率的提高；
- 主要全球角色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的增加；
- 采取折中方法解决全球安全问题的基础得以巩固。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地位的本质变化将引起新的挑战：其一是跨国公司相互间的关系，其二是它们与各国政府之间的互动问题。

可以推断，跨国公司的利益与主权国家的利益以及（或）国际社会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将会上升。

气候变化

论点：有关气候变化是由人类活动所引致的推测尚未得到充分证明，因为得出这一结论的观察期太短。

但注意以下因素是十分重要的：

- 威胁人类的自然现象的发生日益频繁，包括由火山喷发引起的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和温室效应、海洋蒸发、地震、海啸等。
- 大城市和工业集中区环境恶化（污染致使）。

在实际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主要关注点应该是把灾害对于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程度降到最低，并改善人类居住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气候问题的解决不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制约。相反，它会给其中发展最快的创新领域带去新的动力。可以预见的是，二氧化碳排放额度的交易将会增加。

六、社会领域

危机后的发展问题要求深刻重新审视社会政策的原则和方向。

这种修正的必要性在于：

- 世界范围内中产阶级的壮大将决定社会标准和社会需求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 新的超级富豪群体和成长中的“庞大的百万富翁群体”正在形成自身利益，这些利益要求建立起与公共利益相调和的新机制；
- 创新经济的发展将造成发达国家自身内部的社会“分层”。很多职业将是非必要的或是由低技能、低报酬的移民完成。
- 世界上的社会分层将不仅按照“富国—穷国”的线路扩展。贫穷国家的富人应当像富裕国家那样为“世界穷人”的命运负起责任；
- “跨国公司的国籍”问题将尖锐化，其实质在于跨国公司员工享受的优惠不能扩展到主要人群。

论点：社会矛盾不仅会侵蚀一些国家的社会体系，还会招致一系列国际社会问题（移民、人口、种族冲突等）。

引起全球社会爆炸的不是“世界穷人”，而是那部分对其内部社会分层不断扩大感到最不快的中产阶级。

直观的例子将是中国。在中国，从现代化中得利的人和局外人之间的社会差距问题将被另一种矛盾所替代，即从经济快速增长中获利较多和较少的人之间的矛盾。

关键的社会变化

1991—2010 年	2011—2030 年
全球中产阶级人数增加，并向非发达国家扩展	在中产阶级人数增长的情况下，全球中产阶级分层加剧
穷人占世界人口的 30%，其中 15% 处于生存边缘	穷人的比例和生存边缘的比例分别降至 20% 和 10%
新的百万富翁阶级逐步发展，主要集中于美国、欧盟和日本	百万富翁数量将迅速增加，首先在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
世界超级富豪大部分是美国公民	超级富豪人数将由于中国和其他发展迅速的经济体而加速增长

未来 20 年的新趋势是社会发展的全球化。到 2030 年，对社会发展进行治理以及在教育、卫生和国际化领域加强均质性的全球诉求将形成。

然而，现实的全球社会发展治理机制在 20 年内不会建立起来。

世界教育空间

劳动力市场全球化正促使不同国家从业人员教育标准和职业培训的要求逐步趋于统一：发达国家的教育标准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劳动力市场的输出国所接受。

论点：在本预测期内不应期望形成全球统一的教育空间。

发达国家将进一步开展教育体系的现代化，调整并使之满足全球信息社会的需求，其中以落实“终生教育”的理念为主。

在只有个别领域存在信息技术的国家，主要问题是在传统教学法占优势的情况

下，确保有质量的普及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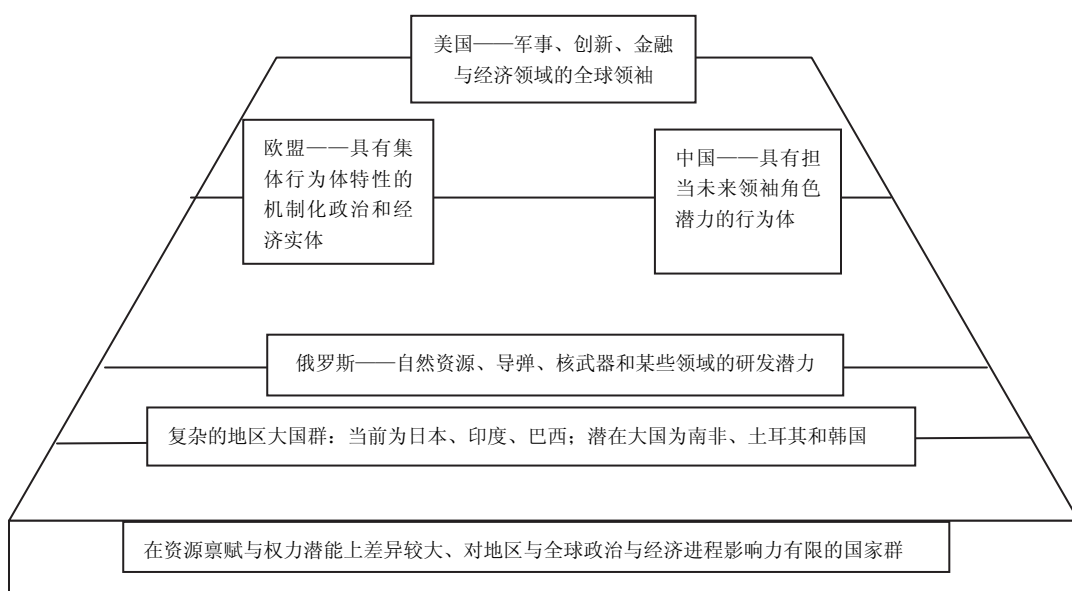
世界公共卫生体系

到 2030 年，将在克服大规模流行病的后果、饥饿及其他紧急状况方面取得一定进展。

发达国家在老年医学、基因技术、纳米芯片和微感应控制设备、器官移植、神经细胞、视网膜等方面的长足进步，将大幅提高人类的平均寿命。退休年龄将会提高。

由于生活水平和病人医疗费用的上升，以及国家卫生健康支出的增加，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国家医疗技术、公共卫生服务和药品的“新市场”将不断扩大。

七、国际安全体系



图三 多中心世界的等级秩序

论点：世界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相互协作的趋势将压倒相互对抗的趋势。

军事建设和军备发展将会继续。但与此相关的相互猜疑，至少部分地，将被创建新的全球安全维护机制、采取信任措施和共同发展武器系统予以平衡。

主要趋势是在对外政策中借助于下列工具，扩大“软实力”和“巧实力”的运用：

- 金融和经济优势；

- 科技进步；
- 文化与教育；
- 扩大意识形态的影响。

传统军事力量的大量使用仅可能发生在有限的局部冲突中。

反趋势是其他的权力工具的重要性也在同步增长：

- 金融、经济和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
- 由全球相互依赖引起的措施；
- 应用信息通信技术影响公众民意。

机制

冷战时期世界军事政治大国所建立的维护军备控制和裁军条约的作用将会减弱。

但很难期待在未来 20 年建立起全新的国际机制。

这种制度真空可能会导致主要大国间的关系紧张，尽管尚不至于超出外交框架。

联合国改革将仍在国际社会的议事日程之内。

但暂时不会作出最终选择，到底是保守方案——增加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数量，还是长远的方案——发展跨国法律和超国家治理机制。

不扩散

- 美俄核均势将维持在较低水平上。将有合作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空间。这种合作或可以共同的早期预警雷达系统为基础。
- 英国、法国和中国加入核裁军进程的可能性将会增加。
- 在核不扩散领域开展国际力量的协作，将能防止核武器落入国际恐怖分子之手。
- 伊朗政治体制的嬗变或将有助于解决“伊朗核问题”。
- 在朝鲜现存政治体制崩溃的情况下，朝鲜核问题获得解决的可能性更大。

地区冲突

- 世界主要大国以某种方式卷入并秉持不同立场的地区冲突（巴尔干、高加索）不会变成大国间的军事冲突。
-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 2030 年前不太会实现真正的和解。
- 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可能导致新的地区风险。

- 由于北京持续对台北实施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动耦合”（engage）^①政策，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的紧张程度将大大下降。
- 伊斯兰恐怖主义不会被彻底消灭，但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将遭到堵截并限于局部地区。
- 非洲、中东和中亚最有可能成为世界冲突高发区。

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安全

- 北约仍将是跨大西洋安全的基石。
- 北约的活动将维持其全球向度。北约颇有可能与俄罗斯和中国在一些特别重要的地区开展合作，包括中亚和阿富汗。
- 亚太地区在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以及地区内其他国家发展军事政治合作的基础上将形成跨太平洋安全的新模式。

国际政治稳定的发展趋势可能会被一些负面的发展情境所破坏：

- 主要核大国在相互关系中或许拿对抗和霸权来冒险。核裁军进程暂停。开始太空军备竞赛。
- 中国继续增强自身的核导弹实力并建立太空和计算机部队。
- 中国作为经济和金融实力不断增强的世界“政治新手”，其行为有时或不可预测。
- 东北亚和北太平洋可能会被中国的军工综合体视为天然的势力范围。
- 一些地区冲突（如印巴、中东）可能会出现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另一些（如中亚）也可能会失控。
- 伊朗和朝鲜的政局或将按照权力集中于当前领导人之手的路径发展。这或将导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 国际社会可能无法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

论点：这类国际政治和军事局势的负面预期不太可能会发生。

八、国家和地区之主要挑战

^① Engage，一般译为接触，如克林顿时期曾经风行“全面接触”（Comprehensive Engagement）的对华政策。本词表层意思是主动开始谈话或者行动，延伸意义则是两个互相咬住的齿轮——双方保持一种紧密相接的关系，但一方却如主动轮一般决定着被动轮的速度，始终占据主动，引导对方的行为。我们认为，俄罗斯学者选择这一词语旨在突出中国大陆对台政策上的主动性，隐隐有“大陆唱台湾随，大陆主台湾从”的含义，故此处译为“主动耦合”。——译者注

美国

- 在更多考虑伙伴利益的多边主义基础上，以新形式（“一超多强”）保持其全球领袖地位。
- 在金融、社会、教育、医疗领域完成改革。保证这些改革具有全球性的稳定和示范效应。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首先取决于美国金融业改革的成功。
- 在推动全球科技进步的基础研究和创新领域，美国领导地位的现有模式将得到巩固。创新是美国未来优势地位的结果，同时也是其条件。
- 跨大西洋（美国+欧盟）、泛美（中美洲和拉美）和跨太平洋共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将并行不悖。

欧盟

- 巩固并发展共同体，克服危机时期不断加剧的离心情绪和倾向。
- 在人口老龄化和移民比例增加的条件下，保持有效的社会体系和社会稳定。
- 鼓励主要成员国转向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
- 继续开展促进一体化深化并巩固欧盟作为跨国领导中心和影响中心的地位的制度性改革，包括对外政策、防务政策、财政政策和社会政策。

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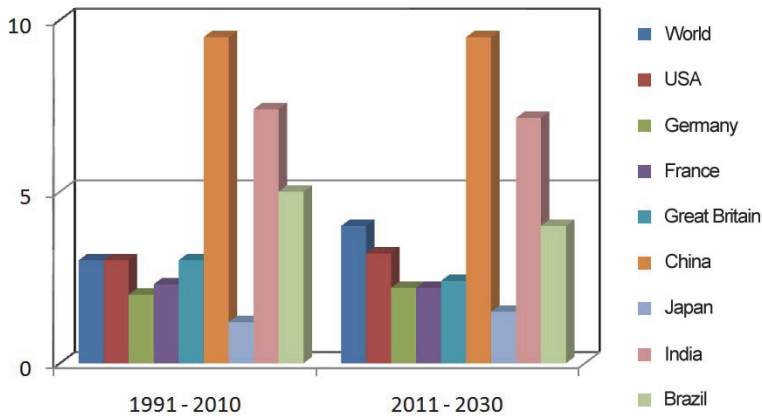
- 逐步实现民主化改革并改变西方对于中国作为政治“异类”的认知。
- 在社会分层加剧的条件下，维持社会政治稳定。
- 在国内金融市场国际化的条件下，保持金融稳定。
- 在发展太平洋经济一体化和建立跨太平洋安全空间时，展现“负责任的大国”的风范。

日本

- 保持工业和建筑基础行业设备全球出口国的地位。但其在亚太地区经济影响力在中国等竞争者的压力下将相对减弱。
- 内需萧条将继续阻碍日本经济的发展。
- 寻求后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从“绿色增长”到“感官”经济（economy of impressions），并将作出更多努力，以满足老年群体的需求。
- 转向更有效的出口模式将成为日本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
- 对外政策将继续受制于“尚未准备就绪担当领导国家”的问题。

南亚、拉美与非洲

- 印度将进入世界最大经济体群体之列。但它将因国内社会发展问题而在经济发展上面临诸多困难。
- 印度、巴西、土耳其和南非（作为地区大国）将提高自身的政治分量，但其影响力无法达到与发达国家和中国相当的水平。



图三 各国年均 GDP 增长率 (%)

九、对俄罗斯而言的结论：风险和机遇

论点：未来 20 年，为避免自身不被边缘化、能应对未来的风险，以及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新机遇，俄罗斯必须使自己的内外战略有效地适应全球发展的主要趋势。

意识形态

风险	机遇
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民族例外论、冲突性的自我认同蔓延	俄罗斯自我认同为欧洲—太平洋国家，是以欧洲价值观为基础的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左倾激进主义“公平”和“公正”的思想复苏	就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问题与世界大国及其他相关国家开展广泛的多边对话
社会意识的教权化，宗教间冲突	与美国、欧盟、中国、印度开展协作反对侵略性的伊斯兰主义

主要挑战为：必须改革政治、社会、法律和教育制度，使其与全球化和非动荡的不平等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

经济

风险	机遇
保持以出口原材料为基础的经济模式	在与世界创新中心实现技术一体化的基础上，制订旨在实现现代化和再次工业化的战略
由于替代能源的突破性进展，俄罗斯主要出口原料的需求和市场价格将下降	利用能源的天然优势资助经济的创新型结构改革
由于在欧洲一体化和亚太一体化中参与有限，金融和经济利益受损并被边缘化	制订旨在与欧盟和亚太进行一体化合作的双向度的经济战略。在财政和税率政策中考虑到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和太平洋沿岸部分的特点
在多边经济论坛和全球治理体系中参与不足	参与地区性（欧盟和亚太）和全球性的“金融救济基金”组织
俄罗斯转型成为地区和世界金融中心的政策失败或是为此转型成功的投入不足	在出口构成发生创新型改变以及建立有效的国家金融体系的基础上，俄罗斯卢布逐步成为地区性的贸易和金融结算货币

主要挑战为：

- 首先，俄罗斯保守主义精英在客观上阻挠能源和原料产业领域的收入朝有利于“知识经济”的方向重新配置。创新战略直接有损俄罗斯能源和原料寡头的现有利益。确立这些利益与整个经济体的长远利益间的平衡是一项政治任务。
- 第二，实施双向度经济战略的思想（欧洲部分——欧盟，太平洋沿岸——亚太）可能引起国家分裂的危险以及相应的对立。有根有据地消除这些危险是一项政治任务。可能的手段之一是，在东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的发展问题上，吸引日本、韩国和美国与中国开展竞争。

社会领域

风险	机遇
在中产阶级发展中，俄罗斯不可逆地落后。在贫困人数、贫困者生活质量和贫困扩散指标上滑向发展中国家水平。 人才外流 世界超级富豪群体利益与国家政府和社会利益间的矛盾加深对于俄罗斯产生负面后果	加快形成中产阶级，生活质量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其依托如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实施创新和发展战略， ● 扩大中小企业活动领域、 ● 摒弃官僚主导作用，实现去官僚化
不参与全球新社会体系的建立进程。在教育、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发展上落后于世界趋势	借鉴世界经验提高教育、医疗、社会服务水平，并与俄罗斯的欧洲和亚太邻国协调社会政策
	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

主要挑战是：如何改革现行的社会制度，并在改革中避免由于功能削弱而自身受损的官僚机构与需要有效的官僚机构的社会之间的冲突。这不仅需要政治意志，还需要实实在在地扩大公民社会的活动领域。

对外政策

风险	机遇
除人权、民主和基本价值观外，与美国在核力量平衡、全球、欧洲、中亚和亚太安全事务上关系日益紧张	与主要大国的关系提升至在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上共同行动的水平，在此过程中，大国互相视作全球性和/或地区性的重要伙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与欧盟因地区问题、能源安全、北约扩员，以及建立新的欧洲安全体系问题； ● 与中国因中亚问题和边境问题上的紧张局势； ● 与日本因领土问题而关系恶化 	在欧洲逐步形成安全和合作新架构； 俄美关系的战略本质从相互核遏制朝相互核安全和在弹道导弹防御问题上开展合作方向发展
放弃参与新的太平洋安全体系的形成过程	积极参与跨太平洋安全体系的建立，以与中国、日本、美国的双边及多边外交为基础开展合作
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和日本在中东与中亚地区维护和平、削弱恐怖主义基地、打击贩毒的共同行动遭到失败	考虑到地区的文化、历史、社会、经济 and 意识形态特性，形成解决中东（后动乱时期）和中亚问题的综合性方法
在开发世界海洋、北极、南极和宇宙空间的问题上发生冲突	在开发世界海洋、北极、南极和宇宙空间的问题上决定开展生态平衡的多边合作

主要挑战是：在表达俄罗斯对外政策利益和制订对外政策战略时，如何克服或限制传统上把美国和中国作为潜在对手的认识。

在下列渠道开展广泛的对话十分合理：

- 当局——专家共同体（community of experts）；
- 当局——政治精英——专家共同体；
- 当局——社会、政治和经济精英——专家共同体。

单独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积极利用大众传媒在世界上构建有关俄罗斯的新认知。

与主要大国和地区的相互协作

美国

风险	机遇
<p>在双方共同关心的对俄美关系造成不良影响的问题上，首先是全球和地区安全、核不扩散和经济联系方面，存在持久的互不信任并缺乏全方位的对话。</p> <p>由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政府更迭，两国关系发生由“正”到“负”的跌宕起伏</p> <p>美国失去将俄罗斯视为必须合作的重要伙伴国家的兴趣</p> <p>俄罗斯的反应，使其自身与美国隔离开来，在巩固俄美关系的双边经济基础中缺乏进展</p>	<p>在 2009—2010 年两国关系的基础上长期并逐步发展俄美关系</p> <p>在俄美两国已取得重要成果的科技方向上开展互利的技术合作</p> <p>将创新和能源合作转化为政治关系的坚实基础</p> <p>就基本价值观开展政府、专家和公民社会层面的全面对话；协调世界发展路径；将本国特有立场纳入到双边和多边努力中去，以构建一个更好的国际秩序</p>

主要挑战是：在俄罗斯和美国都存在强大的力量和利益集团，他们对于发展全

新的双边关系没有准备或者不感兴趣。

必需投入政治意志和资本、持久努力及时间去营造相互信任的气氛。这也要求两国的公民社会、专家界和商界在设置对外政策的议程时发挥更大的作用。

欧盟

风险	机遇
在建立双方都能接受的欧洲安全新架构问题上缺乏进展	俄罗斯在国际安全领域成为欧盟的关键伙伴 共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在能源安全、未被承认的国家、北约东扩、非法移民和人权问题领域双边关系恶化 在后苏联空间俄罗斯和欧盟频繁发生利益冲突，在世界其他地区双方在对抗中竞争和角逐 不顾俄罗斯利益形成新的欧盟—中国、中国—北约关系的有效形式	俄罗斯与欧盟签署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双方在经济、内部安全与司法、外部安全及科教文化等四个共同空间内逐步实现一体化： 理解并界定能源安全领域的相互利益 推进能源领域以外的经济合作。扩大欧洲制造业和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存在，使其帮助俄罗斯以创新型模式为方向重组经济 扩大俄罗斯企业在欧盟的投资，并达到建立跨国附加值产业链的规模；取消相互间的签证制度

主要挑战是：欧盟内部的金融和内政不稳定可能放缓未来与俄罗斯相互协作的进程。为了深化俄欧一体化，俄罗斯需要通过坚持不懈和开放作出战术性妥协。

亚太

风险	发展可能
俄罗斯未参与跨太平洋安全和经济合作空间形成的进程	俄罗斯主动加入亚太安全和发展的共同空间。除APEC外，参与到“俄—日—美国”、“俄—中—美”等新的多边机制。倡议举行类似于俄罗斯—北约对话机制的“俄罗斯—美日同盟”的对话
中美经济和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将比俄罗斯与两国在太平洋问题上的对话快得多	将跨太平洋安全问题纳入俄美全球安全对话之中
与日本的领土问题无法解决阻碍着双边关系的突破	建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以俄罗斯资源为基础的亚太能源市场 东北亚三国（中、日、韩）多边油气储备 通过俄罗斯国土的欧盟和亚太间的物流桥梁 在俄罗斯太平洋沿岸地区，形成与东北亚三国经济合作的特别海关和税收制度 在下列条件下，将俄罗斯太平洋沿岸用作与东北亚三国一体化的平台：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创新经济工作人员（专家、学者等）在东北亚三国领土上自由移动 建立多边的产业孵化园区

关键任务是：使俄罗斯社会认知到俄罗斯既是欧洲国家，也是太平洋沿岸国家。

南亚、非洲、中东、南美

风险	机遇
主要大国为开发这些地区的资源和市场而进行的竞争加剧	以主要大国及跨国公司为一方，以这些地区的政府和大型企业为另一方，在自然资源开发方面协调行动。风险分担和利益共享取代无效的竞争
影响力的竞争成为解决地区冲突的协调行动以及消除核武器扩散、恐怖主义、贩毒领域威胁的障碍	联合应对种种地区安全与挑战问题
俄罗斯被挤出地区经济与政治对话	不仅要通过与地区大国的双边关系，还要通过俄罗斯—地区安全和合作机构间的多边外交渠道加强俄罗斯的地位

挑战在于：新的合作理念和方法，将受到巩固地区影响力的传统手段的巨大阻力，后者通常使用反制措施针对竞争者。

20 年时间，对改变地区对外政策的陈旧哲学而言，可能是不够的。

《2030 年全球战略预测》的作者们认为，为了提高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俄罗斯拥有足够的资源去有效地影响世界发展趋势以及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

(杨成 施海杰 译)

【Abstract】 In the next two decades, the world will face less radical changes and shocks that were typical for previous twenty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aintain its leadership in science and innovations, finance and military force. The strengthening of China will make the greatest impact on changes of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Ideology of globalization based on market and democratic principles will remain to be the leading system of ideas in the world. Ideologies will be increasingly interconnected with global political,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trends. This would become a basis for ideology of global governance. Large-scale and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worldwide “set of culture” and in the inner nature of each culture are highly unlikely in the horizon of 2030, the same is unlikely to form a global culture that will be predominantly innovative and productive. The formation of mechanisms and principles of global governance will be accelerated. Major driving forces of the worldwide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innovations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next twenty years, globalization will continue speeding up a growth

of the world economy. But the impact of the world financial economic crisis will still exist in the first half period of the forecasts. A new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and possible rise of protectionism may become the key limit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In 2011-2030, the average rates of growth of the world economy will be 4.0-4.5%. China's approach to the group of middle-income countries with high rat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represent the main shift by 2030. The very traditional division of countries into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one will change. Quality of growth and criteria of competitive power will determine the place of a country on the world economic map. China will at least approach the GDP level of the USA in terms of scale, but will still lag behind in terms of innovation and other qualitative components of GDP. China will turn into the biggest domestic market in the world and will become the main factor supporting global demand. The world will not suffer from the shortage of energy resources. China and some other states in Pacific Asia, India and leading countries of Latin America will increase their share in the international flows of capital. Substantial changes in the world monetary system largely depend on the time when the Chinese renminbi would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 The role of G-7/G-8 will change. The activity and influence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banks will be expanded. Social contradictions can undermine not only national social systems, but will cause international social problems (migration, demographics, ethnic conflicts, etc). Tendencies towards coordinated actions of global powers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will prevail over inclination to conflict. During next twenty years, Russia should efficiently adapt its domestic and foreign strategy to main trends in glob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avoid finding itself in a marginal position, to cope with future risks and to exploit new opportunities coming from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configuration, global governance, world economy, world monetary system, China, United States, Russia

【Аннотация】 В предстоящие двадцать лет мир будет развиваться эволюционно без радикаль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и потрясений, характерных для предыдущих двух десятилетий.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сохраняет роль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лидера в области инновации, финансов и военной силы. А наибольшее влияние на изменение соотношения «сил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в мире окажет усиление позиций Кит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на рыноч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основе сохраняет позиции ведущего мирового идейного течения. Идеологии все чаще будут связаны с глобальным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и и культурными

тенденциями, а не только с внутривосточной жизнью отдель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Это будет основой будущего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К 2030 г. будут крайне маловероятны масштабные и значим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в мировом наборе культуры и во внутренней природе каждой из них.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трудно решить задачу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как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й и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ой. Продолжитс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механизмов и принципов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Главные движущие силы миров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нновация и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в предстоящие 20 лет может обеспечить рост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Н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мирового финанс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будут ощущаться в течение всей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периода. Главным ограничителем роста может стать новый мировой финанс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 и усиление протекционизма. В период 2011-2030 гг. среднегодовые темпы прироста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составят 4,0%-4,5%. Главное изменение к 2030 г.: Китай приблизится к странам среднего уровня развития с высокой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динамикой. Изменится традиционное деление стран на развитые и развивающиеся. Качество роста и критерии конкурент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выйдут на первый план и определят место страны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карте мира. Китай выйдет на уровень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но будет отставать по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й и другим качественным составляющим каждого процента ВВП. Китай превратится в наиболее емкий внутренний рынок и станет главным фактором, поддерживающим общемировой внутренний спрос. Мир не будет испытывать дефицита энергоресурсов. Китай и ряд дру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Азии, ведущие страны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и Индия увеличат свою долю в мировом импорте и экспорте капитала. Существенные перемены в мировой валютной системе во многом зависят от времени превращ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юаня в мировую валюту. Изменится роль «Большой финансовой Семерки» или «Большой финансовой Восьмерки». Увеличатся сферы действия и влияния 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корпораций. Социальны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могут взорвать не тольк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системы, но и глобальную ситуацию (эмиграция, население и этниче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В отноше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тенденци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ировых лидеров в поддержании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мира будут преобладать над тенденциями к конфликтности между ними. России необходимо эффективно адаптировать свою внутреннюю и внешнюю стратегию к основным

тенденциям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предстоящем двадцатилетии, чтобы не оказаться в маргиналь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справиться с будущими рисками 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нов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которые дает глобализацию.

【 关键词 】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обстановка, глоба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валютная система, Китай, США, Россия

(责任编辑 常喆)

* * * *

(上接封3)

- 俄石油公司 (Rosneft) 总裁胡代纳托夫 (Eduard Khudainatov) 称, 该公司并没有考虑将英国石油公司作为在北冰洋合作的对象, 因为该公司“尚未提交新提议”。
- 12 日 俄对美国反导巡洋舰蒙特雷进入“敏感”的黑海水域参加乌克兰美国海风 2011 演习表示关注。
- 13 日 俄石油公司总裁胡代纳托夫表示, 该公司已彻底解决与中方在供油问题上存在的分歧。
- 14 日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伏米切夫 (Oleg Fomichev) 称, 俄小型腐败总额已从 2005 年的 1290 亿卢布 (46 亿美元) 上升到了 2010 年的 1640 亿卢布 (59 亿美元)。
- 15 日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到访俄罗斯, 庆祝《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10 周年。
- 16 日 俄总统助理德沃尔科维奇 (Arkadi Dvorkovich) 称, 副部长仍可继续留在大公司的董事会, 但不可担任董事会主席。
- 17 日 俄罗斯与法国签署了法向俄交付两艘直升机攻击舰的协议。
俄罗斯与中国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签订了供气协议, 但仍未在气价问题上达成一致, 俄希望与对欧洲供气的定价公式挂钩。
- 19 日 俄罗斯总统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马尔格洛夫 (Mikhail Margelov) 称, 俄能够在调停利比亚冲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21 日 俄总理普京在访问巴黎时重申, 俄仍将致力于发展核能。
- 23 日 俄总理普京称, 在加入世贸组织后, 俄将会保留农业补贴的权利。
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 (Transneft) 收到保加利亚将布尔加斯—亚历山德鲁 (Burgas-Alexandroupolis) 石油管道项目推迟两个月建设的通知。
- 24 日 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三国领导人在喀山 (Kazan) 举行峰会。纳戈尔诺—卡拉巴 (Nagorno Karabakh) 争端的解决有微小进展, 但并未达成协议。
- 25 日 俄富豪普罗霍罗夫 (Mikhail Prokhorov) 当选为正确使命党 (Right Cause party) 领导人。
上海合作组织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 (Astana) 举行峰会, 纪念该组织成立 10 周年, 并讨论地区安全合作等重大问题。
- 26 日 俄罗斯外交部代表古谢尔盖·古巴尔那 (Sergei Gubarev) 称, 俄罗斯没有从德涅斯特河区域撤出武器装备的计划。
- 27 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法令, 批准扩大俄在亚美尼亚的军事基地。
- 28 日 在一系列失败和延迟试射后, 俄成功发射了布拉瓦洲际弹道导弹 (Bulava ICBM)。
- 29 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了预算咨文, 称该文件阐述了俄未来三年的预算政策。
由于白俄罗斯拖欠电费, 俄“国际统一电力”公司完全停止了向该国供应电力。

(胡彦 辑)

俄国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话语及其表述实质

——19世纪上半叶俄国文化运动及其历史影响*

季明举**

【内容提要】19世纪上半叶是俄国社会思潮和文化运动发生多元剧烈变动的关键历史时期。自1836年恰达耶夫发表著名的《哲学书简》并引起俄国思想界的震惊时起，就在精英知识分子中展开了针对俄罗斯命运与前途的民族主义双重话语表述。这种表述的大方向，是在短时期内充分学习西方的前提下，确立俄国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独立文化身份和精神优势。其间，俄罗斯传统文化意识在俄国和欧洲两种文化交流与激烈碰撞背景下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成为知识界普遍关注的共同话题。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化运动紧紧围绕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话语表述而展开。

【关键词】文化思潮 民族主义话语及表述 知识分子 思想论争

【中图分类号】K512.34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4-0048-(14)

导言

按照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的观点，民族主义为包含民族、种族与国家三种认同在内的话语形态，主张以民族为人类群体生活之基本单位，以作为形塑特定文化与政治主张之理念基础^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称民族主义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②。但对俄国文化运动而言，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俄国斯拉夫主义文艺思想研究”（项目号批准号：10YJY752011）的阶段性成果。

** 季明举，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

① Anthony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

② [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叻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民族主义话语更多的是一种来自精英知识分子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情感，包括对俄罗斯民族历史命运和未来前途的关注、忧患、乃至忘我的忠诚。换言之，俄国民族主义的话语主体不是开明的统治者，也不是普罗民众，而是有教养的知识阶层。在俄国，文化转向、社会变革和民族解放运动，向来不是由西方意义上的专业人士或职业革命家来推动的，而是由民族精英知识分子，一个具有宗教团体和僧侣派别特征的思想群体来完成的。他们这些人未必有精细的专业知识和学者、教授的学术头衔，也未必仅仅热衷于高雅学院派风格或沙龙小资趣味的室内精神写作。“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词在俄罗斯民族主义文化语境里有着特殊的精神和宗教内涵。俄国知识分子几乎全部是悲天悯人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自我牺牲精神、忧患意识，偏执而又严厉的道德约束，浪漫而又热烈地思考着俄国的前途命运或事关俄罗斯民族精神进步方面的严肃课题。不管是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还是历史学家、文化活动家抑或革命家，他们都被普通俄国人敬重地冠以“作家”（писатель）的称号。形容俄国知识分子是广袤俄罗斯大地上的精神漂泊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语）恰如其分。换句话说，俄国知识分子自诞生之日起，始终是以民族主义话语表述者、践行者的文化面孔出现的：自古罗斯时代的古编年史家涅斯托尔^①到17世纪“分裂教派”的领袖阿瓦库姆大司祭^②，自18世纪俄国“第一个革命家”拉季谢夫到19世纪的别尔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托尔斯泰到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普列汉诺夫、列宁等，无不以民族兴亡为己任，探索拯救和复兴俄罗斯之路。千年俄罗斯文化史，特别是在近二百年来俄罗斯追求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历程中，民族主义话语表述一直是不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最强音，其中又以19世纪上半期“黄金时代”的多元思想景观最为绚丽，对“俄罗斯思想”的文化阐释也最为充分。这一阶段是俄国近代民族主义精神运动从模仿构拟（自彼得大帝的改革开始）走向全面自觉的时期，期间的各种文化思潮对19世纪下半期、之后的“白银时代”、乃至20世纪的俄罗斯，都具有重大的历史影响。本文紧紧围绕俄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话语，力图从断代史角度，对19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文化运动及其演变轨迹进行历时性描述。

“投入平静湖水的一块巨石”

① 涅斯托尔（Нестор），11—12世纪古罗斯编年史家，基辅洞窟修道院住持，著有《往年故事》（Повести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使徒行传《鲍里斯和格列布的传说》（Слово о Борисе и Глебе）等。

② 阿瓦库姆（П. К. Аввакум, 1621—1682），大司祭，作家，17世纪尼康（Патриарх Никон）宗教改革后引起东正教的分裂，拒绝改革的保守教会人士形成“分裂教派”（Раскольники），又称“旧礼仪派”（Старообрядцы），阿瓦库姆是“分裂教派”领袖，曾被多次流放并施以火刑，著有自传性的《使徒行传》（Житие）。

1836年9月30日，由莫斯科大学教授纳杰日津^①主办的《望远镜》杂志刊发了一封由一个名叫恰达耶夫^②的“作家”所写、献给一位神秘贵妇人的特殊信件，名为《一封哲学书简》（Философическое письмо），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犹如投入平静湖水的一块巨石，震撼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后沉寂多年的俄国文化思想界。这封信件不仅彻底冒犯了读者，还惹怒了沙皇当局。帝国书刊检查局连夜开会，连皇上也出面干预：沙皇专门颁布谕旨，宣布这是一个疯子大胆的胡言乱语，特地要皇宫派医生为写信人恰达耶夫治病。《望远镜》很快就被查封，主编受到了严厉申斥。

这位参加过1812年反拿破仑卫国战争、与诗人普希金交情颇深的帝国军官写的不是什么情书，而是一封充满着叛逆意识、反思俄国民族文化身份的箴言书。恰达耶夫事实上早在1830年就写好了给那位神秘贵夫人的8封信，《望远镜》6年后所发表的仅仅是其中的一封。他在这封信中痛心疾首地宣称，与在文明进步道路上高歌猛进的西方（欧洲）相比，俄国在文明程度上迄今尚处于“野蛮、不开化”的状态，当权者仅仅是继承了“愚蠢的蒙昧，残暴的、凌辱的异族统治”的传统（指蒙古统治——笔者），“我们青春可悲的历史”，是“精神世界的空白”，就像“没有学会独立思考的孩子”。“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一觉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置身于欧洲大家庭之外”。“我们走着一条永远也到不了终点的路”^③。

人们在《望远镜》杂志上读到这封信，一定认为恰达耶夫这位“作家”已然神经错乱，在恶语中伤自己的祖国；而随后在《一个疯子的辩护》（Апология сумашедшего）一文中，恰达耶夫却自我辩解说他这是试图为俄国的命运和前途开出一副有效的“苦口良药”，他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即“否定的爱国主义”（негативный патриотизм）热爱着俄罗斯。恰达耶夫还呼吁自己的同胞，以“对真理的爱”“献身于真理的祖国”^④。值得注意的是，“真理”（правда）一词是一个古老地道的俄语词汇，并不单指古希腊以降西方哲学所说的“真理”（истина），而是指俄罗斯建立在正教伦理之上的古老法典（русская правда），即“绝对真理”：那

① 纳杰日津（Н. И. Надеждин，1804—1856），俄国文艺批评家、美学家，1831—1836年间创办并主持《望远镜》（Телескоп）杂志，最早阐述了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及小说理论，对别林斯基有良好的影响。

② 恰达耶夫（П. Я. Чадаев，1794—1856），俄国作家，1821年以前任近卫军军官。1836年发表《哲学书简》，被沙皇当局送进精神病院，是俄国19世纪初具有西方主义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的代表之一。

③ [俄]恰达耶夫：《哲学书简》，刘文飞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35-37页。

④ [俄]恰达耶夫：《哲学书简》，第194页。

种类来自上帝的与人的神圣立约（新、旧约）。恰达耶夫进而断言，基督神圣的“天启”赋予了俄罗斯以弥赛亚主义使命：俄罗斯注定要以对全人类的“博爱和兄弟般的团结”承担其拯救世界的责任。“俄罗斯民族表现出一种崇高的智慧，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命运的至高无上规律”。“万物之自然赋予我们以使命，我们将成为真正的、有良心的法官，判决人类精神和人类社会的伟大法庭所面临的诸多诉讼”^①。

事实上，恰达耶夫发表这封信件的内在动机，是出自一种对复活古老大俄罗斯弥赛亚主义的渴望。在恰达耶夫看来，要承担起这一神圣使命，俄国现在还不够资格。她当下需要的是在不丧失自己本民族文化身份的前提下，积极融入欧洲大家庭，最大限度地吸取、借鉴来自欧洲的精神营养，以尽快地壮大自己。一个“夹在中国和德国之间”^②的俄罗斯是特殊的，她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她是西方的东方，又是东方的西方，命中注定首先必须以谦卑、学习的心态摘取西方优秀的精神成果，然后一举超越“被理性主义败坏了的”的西方，以最终担负起拯救全人类的神圣使命和道义责任。

在《哲学书简》里，读者既看到“第一个西方派”对俄国落后文明现状的严厉责备，又看到一个赤诚的爱国者对祖国美好未来的热烈憧憬。恰达耶夫以神秘书信的方式表述的，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双重话语，即对俄罗斯祖国的爱恨交织。他对基督教的推崇、对农奴制的批判、对俄国发展道路的哲学思考以及“否定式的爱国主义”（негативный патриатизм），都是试图通过严峻而清醒的国民性思考和民族自我批判来确立深刻、博大的民族主义文化意识，从而有理由被认为是俄国独立、创新思想的萌芽和“俄国思想分野的开端”，因此他被诗人维亚泽姆斯基称作“流动讲坛上的教师”（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с подвижной кафедры）^③。恰达耶夫单枪匹马在《哲学书简》中立足民族主义话语而提出的“东、西方”问题及其良苦用心虽然不为他的广大爱国同胞所理解（甚至受到普希金的批评），却成为此后历代俄国知识精英们所能听到的“旷野呼告”：即以俄罗斯的方式，向世界表达古老“俄罗斯真理”的现代性话语及其拯救世界的道义和使命。《哲学书简》的公开发表以及围绕《哲学书简》所引起的歧义和激烈论争，拉开了俄国知识界就俄罗斯的命运和前途进行民族主义话语表述的历史帷幕。

思想小组遍地开花的30—40年代

① [俄]恰达耶夫：《哲学书简》，第209页。

② [俄]恰达耶夫：《哲学书简》，第41页。

③ [俄]恰达耶夫：《哲学书简》，第7-8页。

按照“白银时代”新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说法，“在19世纪初，俄罗斯经历了一次文化复兴”^①。这一时期最显要的历史事件是抗击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1812—1815）和“十二月党人”起义（1825）。卫国战争的胜利使俄罗斯民族意识、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涨。与此同时，那些随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远征巴黎的年轻贵族军官们为西方的富裕、文明成就及思想自由而震惊。他们回国后开始酝酿推翻沙皇专制，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共和，这导致了1825年彼得堡参议院广场上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的迅速失败成为俄国思想界的一大转折：贵族精英们认识到，推翻外在制度的“法国大革命”方式不适合俄罗斯，俄国当下真正需要的是思想和心灵的进步，是立足民族传统文化、面向西方的开放性变革。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就是向西方开放诉求的最佳脚注。

在沙皇当局政治收紧、思想相对宽松的情况下，俄罗斯内部散发出勃勃的生命力，对各种西方思想和精神文化运动都异常兴奋和敏感。积极探索“俄罗斯真理”的精英们纷纷以沙龙、客厅聚会、联谊小组、秘密“共济会”、“爱智协会”等形式展开活动。其中“共济会”^②是最早（18世纪末）由西方传入俄国的秘密团体。它宣扬友爱平等的兄弟情分、先验有灵论、基督教博爱思想，最易为俄罗斯直觉式思维方式所接受。“共济会”与18世纪末期开始在俄国风行的伏尔泰启蒙主义相对立，它不寻求唯理主义“我思故我在”式的经验论和认识论，而是诉诸神秘主义的“天启”和神灵附体。“共济会”作用在当时非同寻常，叶夫多基莫夫说“俄罗斯军队踏遍欧洲，使共济会的神秘学说在俄罗斯生根，并促进了圣经协会的活动和德国哲学的传播，浪漫主义深入人心，它形成了一种由德国和英国著作培养的、奇特的俄罗斯虔敬主义和对世界的终极期待”^③。别尔嘉耶夫认为，在共济会里“产生了俄罗斯文化的灵魂样式”^④，培养了民族主义、理想主义的精神期待，并且为接下来俄国文化领域里的思想结社和小组活动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不过鉴于“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尼古拉一世时期）那种紧张、压抑的思想氛围，精英知识分子的沙龙聚会以及民族主义话语的表述尚处于不公开的私密状态。

30—40年代在俄罗斯文化史上被称作“俄国的大学时代”，地处帝国两京的彼得堡大学和莫斯科大学俨然成了新的思想文化中心。在恰达耶夫哲学思想的启发和

①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24页。

② 俄国共济会（Русское Массонство）最早于1731年传入俄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风靡上流贵族社会。

③ [俄]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杨德友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43页。

④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18页。

“共济会”精神的影响下，大学校园内各种哲学问题小组、文艺小组、美学小组、文学社、知识协会等自治性学生社团，几乎在一夜间遍地开花。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斯坦凯维奇^①小组、赫尔岑—奥加廖夫小组、别林斯基小组以及彼特拉谢夫斯基^②小组等。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人醉心于谢林的“绝对同一”哲学、康德的道德批判主义、费希特的“唯灵论”、康德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斯宾诺莎的“实在泛神论”、托马斯·莫尔、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等等，其中对他们影响最大的还是谢林和黑格尔。不过这些思想小组与西方沙龙性质的社会思想团体有所不同，它们是具有某种兄弟般教派凝聚力和强烈使命感的思想小集团。小组成员们专注于那些借自西方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观念和理论，但并不把它们当作一种学术问题来研究，寻求精密的准确性和学院式的理论阐释，而是一种典型的“拿来主义”，即把它们当作火热的信仰和生动的真理，以此来解决俄罗斯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他们就哲学、美学或艺术展开秘密的热烈争论，经常慷慨激昂，彻夜不眠，似乎要在一夜之间将欧洲几百年来所积累的精神成果全部吸收过来。这些莘莘学子后来几乎个个成就非凡，很快就成为19世纪俄国文化界的风云人物。

30—40年代是俄国思想、文化史上阔步向前迈进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时代。其鲜明特点是精英知识分子身上民族主义主体意识的勃发，这与被动地模仿西方、对西方（特别是法国）外来思想亦步亦趋的18世纪古典主义时期形成鲜明对照。面对“尼古拉时代”专制、黑暗的外在社会现实，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们纷纷逃向西方玄妙梦幻的思想镜像中。由大学小组联谊中产生的俄国西方主义者相信，傅立叶的“法朗吉”就是地上天国。年轻人喜好用谢林有机主义哲学术语来解释俄国的现实。恰达耶夫、赫尔岑、别林斯基等人最初几乎全都是谢林、黑格尔的热烈信徒。一时间伯麦^③的神秘有机主义思想，英国共济会理念、乔治·桑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德国的浪漫哲学和日尔曼精神文化，法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等，都已被热烈地以俄罗斯民族主义“生命的方式”信仰、讨论过了。这大大开阔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视野并激发了俄罗斯创造性的文化思维。“在这样的时代里形成了19世纪俄罗斯的灵魂，形成了俄罗斯易于激动的生命”^④。各类哲学、美学、文学思想小组的

① 斯坦凯维奇（Н. В. Станкевич，1813-1840），哲学家，思想家，1831年创建了俄国第一个哲学思想小组。

② 彼特拉谢夫斯基（М. В. Пётрашевский，1821-1866），俄国革命家，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在彼得堡组建了著名的秘密思想小组，后被判终生服苦役。

③ 伯麦（Jacob Boehme，1575—1624），德国16世纪神学家，持一种神秘有机主义世界观，著有《神圣本质三原理》等著作，主张人与神的生命合体。19世纪初作品被译成俄文并受到俄国知识界的推崇。

④ [俄]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思想自传》，雷永生译，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1年，第149页。

聚集，在大学校园里几乎是以半公开的方式进行着。它们的民族主义话语表述呈现出热烈而又绚丽多元的景观。

另一方面，俄罗斯本土的各种神秘思潮也变得日渐浓厚起来。官方和东正教会更加卖力地宣扬以所谓三位一体的“正教、专制、人民性”作为民众道德责任的思想基础，实施对民众的教化。要求人们忍耐、顺从并融入教会充满博爱的生命统一体中。自17世纪尼康宗教改革以来就一直遭受当局迫害的“分裂教派”依然隐藏在洞窟的小修室里念念有词。在民间，农夫、农妇们一如既往地相信自基督教之前多神教时期流传下来的所谓林神、家神、水妖等荒诞不经的事物。甚至精英知识分子中间也弥漫着对俄国传统文化中“圣愚”^①的异常偏爱，相信“为基督的圣愚”的“胡言乱语”中充满着来自天启的至理箴言。许多人在内心里派生出“俄罗斯的哀愁”（русская хандрия），渴望回归到彼得大帝改革以前的圣贤古道中去。

受过贵族教育的精英与愚昧民众间的巨大鸿沟在西方思想冲击面前有进一步扩大之势。整个俄国社会因进一步对外开放，其内部似乎隐藏着更加激烈的民族主义躁动。接纳西方外来理念与守护本土文化精神这两种思想情绪，在30—40年代生发出了同样对现实不满、同样追寻古老的“俄罗斯真理”，却在立场上迥然对立和冲突的双重民族主义文化意识：“我们业已丧失了自己的精神独特性”和“我们远远落在文明开化的西方之后”^②。一方面感慨、抱怨对神圣罗斯母亲显得不够敬重，另一方面又赞叹、折服于西欧社会发达的文明，为俄国文化形态的落后而怨恨。前者催生出了以守护民族文化精神传统为显著特征的斯拉夫主义（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后者则导致了以彻底融入欧洲文明为主要诉求的西方主义（Западничество）的出现。民族主义话语表述透过综合性文艺杂志等论坛开始表现为公开的思想论战。随着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俄国文化思想界第一次出现了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公开对垒的格局。不过无论是西方主义还是斯拉夫主义，均不乏强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主体文化思维，即“俄罗斯易于激动的生命”，都认同寻求一套完整的民族主义话语表述，即在俄国本土文化观念与西方意识形态激烈交锋、碰撞的时代大背景下，跨越彼得大帝以来那种对形形色色的西方理念欣喜迷狂的时期，转向建构以确立俄罗斯民族文化身份并进而以拯救“西方堕落”为己任的巨大思想工程。这样一来，深耕俄罗斯本土并走向民族主义文化认知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① “圣愚”又称“为基督的圣愚”（Юродивые ради Христа），是俄国民间基督教文化中的独特现象，“圣愚”常常赤身裸体，四处游荡，以铁链裹身，具有献身基督的自虐心理，沙俄时代广泛存在。具体参见艾娃·汤普森（E. M. Thompson）的《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杨德友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② [俄]索洛维约夫等著：《俄罗斯思想》，贾泽林、李树柏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4页。

走向斯拉夫主义的40—50年代

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在民族主义话语表述上的公开对峙，构成了40年代独特的人文景观。这是20年代狂飙突进的“文化复兴”时期即“普希金年代”所不曾有过的现象，也是30年代沙龙聚会和思想小组时代不可想象的事情。

斯拉夫主义作为一个文化派别事实上早在30年代就已经出现。理论界一般公认，紧跟1836年恰达耶夫《哲学书简》发表后完成的（只在文学沙龙里朗读过）、具有明显论战倾向的霍米亚科夫^①的论文《论旧与新》（О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是斯拉夫主义诞生的宣言书。与霍米亚科夫一样，活跃在莫斯科文学沙龙里的阿克萨科夫^②、基列耶夫斯基^③、萨马林^④等人是该派别的灵魂人物。

斯拉夫主义的基本理念是对俄国东正教哲学“在教会爱的躯体中统一”的“聚合性”^⑤（соборность）有机论原则的精彩阐释。他们自东正教生命有机论立场出发，有机地理解俄罗斯生活，有机地理解沙皇和人民的“和谐”关系，认为俄罗斯的一切都应当是“东方式”生命的、有机的和整体的，而非“西方式”理论的、机械的和切分的。就民族生命的鲜活性而言，俄罗斯比西方有着更大的精神优势。对霍米亚科夫这样的斯拉夫主义分子而言，皈依东正教的“天然纯洁性”，意味着摒弃自彼得大帝改革开始的全盘西化，重新回归生活的有机完整性。这一有机完整性即“村社主义原则”（прицип общины），曾是俄国长期的思想支柱，却为彼得大帝改革以来“分裂的西方”所破坏殆尽。俄罗斯在彼得大帝的西化运动中丧失了独特性，迷失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身份。因此俄国迫切需要回复到彼得改革前“处子般”纯洁的、温顺虔敬的质朴状态。

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方主义者一样受到过良好的西方式贵族教育，深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谢林、黑格尔）和耶拿浪漫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但具有强烈的宗教般

① 霍米亚科夫（А. С. Хомяков, 1804—1860），俄国宗教哲学家，斯拉夫派领袖，斯拉夫主义思想奠基人，曾根据东方教父学创立了描述俄国国民性的“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学说。

② 阿克萨科夫（И. С. Аксаков, 1823—1886），社会活动家，文学批评家，斯拉夫主义主要理论家之一，主办过多种杂志宣扬斯拉夫主义思想。

③ 基列耶夫斯基（П. В. Киреевский, 1806—1856），俄国宗教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斯拉夫主义主要理论家之一，认为欧洲启蒙主义和抽象思维带来了精神完整性的丧失，主张建立独立的俄罗斯宗教哲学。

④ 萨马林（Ю. Ф. Самарин, 1819—1876），哲学家、历史学家，斯拉夫主义主要理论家之一，负责起草了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农奴自由法令》。

⑤ 我国学者一般将 Соборность 一词译作“聚合性”或“聚义性”，也有人译作“团契”。参见张百春：《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494页；彭文钊：“俄罗斯团契概念的语言文化学分析”，《中国俄语教学》，2005年第3期。

的民族使命意识，一直致力于建构东正教历史哲学和俄罗斯本土化史观，即建构关照自身命运与世界未来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视角。西方主义的出现比斯拉夫主义还要早。一般认为恰达耶夫早在1830年就已经完成的《哲学书简》，标志着西方主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西方主义多半来自莫斯科大学以及彼得堡大学的思想小组，是法国大革命、法国乌托邦主义和黑格尔哲学的忠实信徒。富有公民激情的“十二月党人”（Декабристы）和对俄国现实持激烈否定态度的恰达耶夫，是西方主义者们行动和思想上的偶像。西方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别林斯基、赫尔岑、巴枯宁、斯坦凯维奇、格兰诺夫斯基、安年科夫、卡维林以及60年代以后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直到40年代末期，西方主义才真正从沙龙、客厅、小组思想联谊走向以综合性文艺杂志为媒介的公开讲坛。他们认为西欧的文明就是俄国及整个人类的未来。文明的典范在西方，俄罗斯应当首先掌握科学和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成果，坚定地走彼得大帝所开辟的西方化之路，经历与西方同样的文明发展阶段，然后才能在一举超越西方的情况下抗起俄国民族主义的弥赛亚大旗。如果说斯拉夫主义派别充满着神圣的宗教救世主义情怀，主张以内在信仰和爱的生命完整性实现对上帝和天国的追求；西方主义派别则充满着激进自由主义和革命造反理念，更注重外在的社会秩序的变革和物质文明的进步，试图直接把威严的上帝拉到地上，建立起幸福的人间天国、俄罗斯大地上的“水晶宫”。西方主义者们清楚意识到，残酷野蛮的沙皇专制制度和缺少知识教化的普通民众当下已成为实现俄罗斯民族主义文化复兴的最大障碍。唯一的出路是对前者实行外在制度上的革命，至少是革命性的变革，对后者则实行民主思想的启蒙，以开启民智。为此，赫尔岑、奥加廖夫在莫斯科有以推翻沙皇统治为坚定目标的著名的“麻雀山誓言”^①；批评家别林斯基要拯救“埋在专制污泥中的人类尊严”，并且扬言如果还有一个同胞在受难，他就会“从梯子上一头栽下来”^②。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方主义者就这样在有关俄罗斯民族前途和发展道路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他们以各种文艺杂志为论坛，展开激烈的思想辩论。西方主义刊物多集中在彼得堡，以《现代人》为核心；斯拉夫主义刊物集则集中在莫斯科，以《莫斯科人》为论坛。一时间俄罗斯帝国两京之间终日里唇枪舌剑，硝烟弥漫，呈现出激情洋溢的论战景观。就在这种激烈、公开的民族主义双重话语论辩中，俄罗斯社会领域第一次出现了在西方社会早已习以为常的公众舆论和公共知识分子群体。

① 1830年年仅17岁的赫尔岑，与比他小一岁的好友奥加廖夫一起来到了莫斯科大学对面的麻雀山（Воробьёвы горы，1924—1991年称 Ленинские горы），并肩发誓要把一生献给推翻沙皇专制的斗争，史称“麻雀山誓言”（Клятва на Воробьевых горах）。

② Белинский В. Г.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 в 9 томах, том 2. М.: Художеств.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6—1982, Стр.332.

别尔嘉耶夫曾说，“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方主义者的争论是关于俄罗斯的命运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使命的争论”^①。狂热的民族主义双重话语论争事实上是彼得大帝打开“通往欧洲的窗口”（окно в Европу）以来俄罗斯与西方两种文化热烈交流、尖锐碰撞的突出表现。它提供了俄罗斯与欧洲、东方与西方、信仰与理智、自由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的俄罗斯基本悖论性民族文化学话题。无论是西方主义者别林斯基、赫尔岑，巴枯宁，还是斯拉夫主义者霍米亚科夫、阿克萨科夫、基列耶夫斯基，他们事实上共同关心的是俄罗斯民族文化中的“人民性”问题。

“人民性”（народность）是一个地道的俄国词汇，最先由感伤主义诗人、历史学家卡拉姆辛提出，由浪漫主义诗人维亚则姆斯基最先予以阐释^②，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那儿成了纲领性民族文化学概念。西方主义派别倾向于把“人民性”作社会阶层性理解，认为“人民”指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阶层；斯拉夫主义派别则站在东正教生命有机论立场上，将文化的“人民性”理解为有机的“民族性”或“全民性”。鉴于俄国知识分子几乎都具有“民众崇拜”的造神情绪，相信在民间存在着俄罗斯“真理”、俄罗斯传统文化精神，因而东、西两派的“人民性”概念在范畴上有相当大的思想重叠性，即都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话语意识。

其实在今天看来，当年俄国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理论鸿沟。斯拉夫主义者受到过被他们所摒弃的“腐朽西方”哲学的大力教化与塑形，不过是把德国浪漫哲学里的“日尔曼精神”转换成了民族主义的“斯拉夫精神”；西方主义者事实上也并不主张对西方亦步亦趋，而是把“西化”作为一种强身固本的民族主义策略和手段。他们的一个思想共性恰恰在于：他们身上没有沾染西方那种分析式的学理主义、腐朽的物质主义和对人的技术和物化态度。在他们身上仍然保存着俄罗斯传统文化特有的宗教性和精神性，鲜活生命意识和虔诚的直觉主义信仰。“斯拉夫主义者最终走向了宗教，走向信仰；西方主义者则最终走向了革命，走向社会主义。不过，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力图得到整体性的、终极性的世界观，力图取得哲学与生活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③。用赫尔岑的话说，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是俄罗斯这个“雅努斯的两副面孔”^④。其中对俄罗斯民族的热烈

① [俄]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 37 页。

② 转引自胡日佳：《俄国文学与西方：审美叙事模式比较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年，第 84 页。

③ [俄]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 54 页。

④ 雅努斯(Janus)是罗马人的门神，也是罗马人的保护神。传说中，雅努斯有两副面孔：一个在前，一个在脑后；一副看着过去，一副看着未来。赫尔岑第一次在俄国使用“雅努斯的两副面孔”（двуликий Янус）来形容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之争。此处转引自刘祖熙：《改革与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357 页。

信仰与爱是高度一致的，对以俄罗斯的方式拯救全世界，实现全人类兄弟般的团结是坚信不疑的。这种思维重叠性显示俄国精英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话语表述上的某种“聚合性”特质，即建立在民族文化精神根基之上的、具有全人类价值的生命共同体原则。俄罗斯的优势在于以民族的方式表达全人类的东西。只不过斯拉夫主义者乐于把这一生命共同体原则表述为“村社主义”；西方主义者则一般倾向于表述为“普世主义”。

40年代末—50年代初，因别林斯基去世和巴枯宁、赫尔岑流亡欧洲，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的激烈论争沉寂下来。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和1855年西方列强对俄国发动克里米亚战争并导致俄国遭受屈辱的失败，这两大政治事件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他们开始离弃一直被奉为精神偶像的西方，在对俄罗斯的关照上回归民族主义传统，于是一场新的以“斯拉夫精神”为指归的民族主义文化转向开始了：欧洲大革命失败使西方丧失了理想主义和精神追求，使自彼得大帝开始就对西方亦步亦趋的俄国知识精英看清了资产阶级的恐怖、商业掠夺本质、物质主义和小市民可怕的平庸；克里米亚战争除了使他们蒙受巨大的民族耻辱外，也使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在文化精神上存在着的巨大的分野。恰达耶夫早就指出的“堕落的西方”观念，在冷酷的现实中似乎得到了有力的印证。欧洲如今是堕落、分裂、掠夺和罪恶的大本营。“即使俄罗斯灭亡，也比按小市民的方式，像极端令人生厌的旧欧洲那样去建设好”^①。于是西方主义者纷纷开始转变思想轨道：从乌托邦式的社会变革吁求走向本土民族主义话语表述。斯坦凯维奇说，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无情铁律“冷酷得使我时时感到不寒而栗”。“生命是爱。理性和意志是其永恒的规律和其永恒的实现。生命在时空中是无限，因为它是爱。爱一开始，生命就跟着开始；只要有爱，生命就不可能被消灭，只要有爱，生命就不会受到局限”^②。作为一个激进的西方主义者，赫尔岑的话语更具有指标性的意义：“欧洲资产阶级以滑头的、狡诈的、像香槟酒一样起泡沫的理发师和宫廷执事人为代表，……我们现在知道了法兰西共和自由和德意志立宪自由的价值是什么”^③。他甚至还公开宣布：“别了，过去的世界，别了，欧洲！”^④。赫尔岑青年时期与奥加廖夫曾经立下“麻雀山誓言”，宣誓终生致力于推翻沙皇专制，建立使俄罗斯与西欧彻底融合的文明共同体。他现在感到失望了，不再相信从前信仰的革命道路，转而相信俄罗斯

① 转引自安启念：《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3页。

② [俄] 洛斯基：《俄国哲学史》，贾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1页。

③ Герцен А.И.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в 8 томах. Т. 5. Петербург., 1915—1917, Стр.132.

④ Герцен А.И.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 Том 6. Москва. 1956—1961. Стр.113.

村社主义和民粹主义。另外，批评家别林斯基的精神道路也似乎走了一个循环式的民族主义的圆：在所谓“与现实妥协”时期，他因说过沙皇政权“总是以隐秘的方式与上帝的自由意志，与合理的现实融为一体”^①，受到同为革命民主阵营里的战友们的猛烈抨击。后来别林斯基与“黑格尔哲学的尖顶帽子告别”，在《给果戈里的信》（Письмо Гоголю）中以激烈的唯物主义方式宣传无神论思想，声言“否定，这是我的上帝！”，“在上帝的话语中我看到的是黑暗、锁链和皮鞭”^②，但就在发出《给果戈里的信》6个月之后（逝世前），在《1847年俄国文学之我见》一文中，别林斯基认真地说：“人类的救主是为拯救所有的人而来到人世……他是上帝之子，他以人类的方式爱着人们，……爱和手足情份这些上帝的词语并没有白白地向世界弘扬”^③。别林斯基那一颗“狂热的”（他被同时代人称作“неистовый Виссарион”）心灵在东正教会司祭的慈爱与祝福中得以最终平息。闻名西方的巴枯宁这个不可救药的俄国虚无主义者，1842年在《德国的反动》一文中还坚称“破坏的欲望就是创造的欲望”^④，但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他在《告全体斯拉夫人书》中却极力鼓吹斯拉夫主义思想，并向沙皇尼古拉二世写下了《悔过书》。甚至革命民主主义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开始敬重起斯拉夫主义来了，他大力为斯拉夫主义者进行辩护，称他们为“当下俄国最有教养、最高贵、最有才华的人”^⑤。这些走向斯拉夫精神的民族主义话语转向，绝非仅用知识分子集体陷入思想迷雾或遭遇精神危机所能解释的，它实际上反映出一种新的、回归俄罗斯本土文化根基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50年代随着西方主义的解体，斯拉夫主义变得一枝独秀。40年代早期被理论界弃之如敝履的神圣罗斯理念、村社主义、启示录意识、“第三罗马”和弥赛亚主义等传统俄罗斯民族文化意识开始走向了全面复兴，俄罗斯比西欧更具精神优越性的民族主义话语成为时代最响亮的声音。民族主义话语表述呈现出向斯拉夫本土文化精神一边倒的趋势。

结语：未完结的民族主义话语

概言之，19世纪上半叶俄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话语表述（传播）经历了一个

① [俄] 洛斯基：《俄国哲学史》，第70页。

② Белинский В. Г.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 в 9 томах, том 2. М.: Художеств.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6–1982, Стр.172.

③ Белинский В. Г.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М.: Д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2. Стр. 223.

④ Бакунин М.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1828-1876, т. 3. М., 1934, Стр.148.

⑤ [俄] 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卷），辛未艾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第136—137页。

由单枪匹马（恰达耶夫）到不公开或半公开（30年代），再到公开（40年代）直至回归斯拉夫本土文化精神（50年代）的运动过程和演进态势，其根本思想诉求是寻求俄罗斯作为民族“生命共同体”的自我标识方式，即确立俄罗斯作为独特民族文化类型与欧洲相比所具有的精神优势和普世价值。俄罗斯传统文化精神在“俄国和欧洲”（Россия-Европа）两种文化范式交流与碰撞下如何借鉴、生存、发展直至如何履行拯救全人类的神圣历史使命问题，成为知识界普遍关注的共同话题。尽管如此，霍米亚科夫、阿科萨克夫、基列耶夫斯基等老派斯拉夫主义者们那种“散发着香炉和法衣气息”（赫尔岑语）的卖力复古表演，总给人一种恍如隔世的错觉。西方主义者赫尔岑、别林斯基和巴枯宁看上去同样有些言不由衷。何况俄罗斯已今非昔比：中世纪式野蛮、反人性的农奴制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复古不能代表俄罗斯进步的大方向。

自19世纪中叶开始，处于喧哗与骚动中的俄罗斯文化运动在时代的跨越中再次出现了两种新的有机整合趋向：其中第一种文化思想整合的显著标志是50—60年代的“青年斯拉夫主义”（Молодое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思潮和“根基派”（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理论的诞生；第二种整合的标志是平民民主主义思想的出现。前者以50年代格里高里耶夫《莫斯科人》“青年编辑部”和60年代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所创办的《时间》、《时代》月刊为喉舌，宣传“彼得改革的追随者与人民根基之间的和解”^①，鼓吹在新的现实条件下俄罗斯传统文化精神的复兴及其全人类意义，实际上是旧斯拉夫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话语变体；后者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主持的《现代人》刊物为理论讲坛，宣扬平民民主主义革命和唯物主义思想，主张俄国跨越西方渐进式社会发展道路，通过大规模“走向民间”的运动和农民暴力革命的剧烈形式实现“村社社会主义”的理想，构成30—40年代的西方主义在“激进60年代”的异化（左翼）。这样一来，新一轮围绕俄国现代化问题的思想论战在19世纪中叶的俄国又拉开了序幕，而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俨然成了这一轮新论战的分水岭，知识分子未完结的民族主义话语表述注定要继续进行下去。

【Abstract】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is an important Russian historical period with dramatic-multiple changes in social ideas and cultural movement. Since Chadaev delivered his famous “Philosophical Letter” and shocked the elites, the Russia’s intellectuals started a passionate discourse about Russian consciousness, future

①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М.: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87, Стр.50.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ulture. This general direction of discourse is to establish a unique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fully understanding and learning the West in the shortest period of time, during which the spirit of Russian traditional culture, it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collision has become the central nationalism topic of Russian intelligentsia.

【Key Words】 cultural trends, national identity, intelligentsia, nationalism, debate

【Аннотация】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19 века - критичес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ериод радикальных, плюр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изменений 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идейных течениях и культурном движении. С момента публикации знаменитых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писем" П. Чаадаева, вызвавших шок у мыслящих людей, в кругу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элиты началось выражение двойного дискурса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судьбе и будущему России. Главный аспект данного выражения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в Европе и даже во всем мире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и ее духовных преимуществ при условии полного изучения Запада за короткий срок. Проблема, связанная с выживанием и развитием сознания русской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на фоне обмена и бешенных столкновений культур России и Европы, стала темой, представляющей общий интерес для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ов. Российское культур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данного периода разворачивалось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вокруг выраж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искурса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ультурные идейные течения, дискурс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и его выражение,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дейная полемика

(责任编辑 封帅)

民族情感与道德义务

——俄国学者 20 世纪初民族主义争论中的哲学问题

徐凤林*

【内容提要】民族主义问题是俄国思想界长期讨论的主题。俄国学者 1916 年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中提出和讨论的哲学问题可以归纳为四种观点：（1）民族主义的本质是爱欲，本身无善恶；（2）民族情感不应是盲目情感，而应服从道德规范；（3）民族情感既是爱欲也是道德义务；（4）民族情感高于伦理道德，具有审美属性。对民族性的认识不仅是客观的科学研究，而且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形而上学的前提——从唯名论立场来看，民族性是一个集体概念或逻辑抽象物；从实在论立场来看，民族性是一种实在的精神有机体。

【关键词】民族主义 民族情感 民族爱欲 民族实在论

【中图分类号】K512.4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4-0062-(13)

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争论，是 19 世纪以来俄罗斯思想界反复出现的主题。19 世纪 80 年代有索洛维约夫对新斯拉夫派民族利己主义的批判；1909 年有关于知识分子与“民族面孔”的争论；1916—1917 年有关于民族主义与道德关系的争论；2006—2007 年有关于俄罗斯当代处境下的民族主义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论包括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民族关系、爱国主义与普世伦理、国家民族政策、种族冲突、民族分立与同化、民族主义与当代民主社会等诸多问题，涉及社会政治层面和哲学层面。本文着重考察 1916 年关于民族主义争论中所提出和讨论的哲学问题：民族主义的情感基础问题，民族情感与道德义务的关系问题。

俄国学者 1916 年的民族主义争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展开的。为了争

* 徐凤林，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取战争的胜利，俄国知识分子也在进行积极的思考，试图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提供理论证明。在这一背景下，有人提出“构成民族主义本质的偏爱既不是美德也不是缺陷”的观点，引起俄国学者的广泛争议和对民族主义本质的深刻反思。

争论主要参加者有法学家Д·穆列托夫(Д.Д.Муретову)和Н·乌斯特里亚洛夫(Н.В.Устрянов)，哲学家Е·特鲁别茨科伊(Е.Н.Трубецкой)和Н·别尔嘉耶夫(Н.А.Бердяев)，政治家П·司徒卢威(П.Б.Струве)。穆列托夫发表了《关于民族主义的探讨》(1916年1月)、《为爱欲而斗争》(1916年4月)^①；特鲁别茨科伊发表了《民族主义的丧失尊严》(1916年4月)、《新多神教及其“火的语言”》(1916年6月)、《国家神秘主义与未来奴役的诱惑》(《俄罗斯思想》1916年第1卷)^②；司徒卢威发表了《自我守洁：真正民族主义的道德基础》(1916年1月)、《民族爱欲与国家思想》(《俄罗斯思想》1916年第1卷)^③；乌斯特里亚洛夫发表了《论“民族主义”的本质问题》(1916年12月)^④；别尔嘉耶夫发表了《关于特鲁别茨科伊与穆列托夫的争论》(《俄罗斯思想》1916年第8卷)^⑤。

这些争论文章围绕民族情感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提出四种主要观点：(1)民族主义的本质是爱欲，本身并无善恶(穆列托夫)；(2)民族情感不应是盲目情感，而应服从道德规范(特鲁别茨科伊)；(3)民族情感是一种爱欲，也是一种道德义务(司徒卢威)；(4)民族情感高于伦理道德，具有审美属性(乌斯特里亚洛夫，别尔嘉耶夫)。

一、民族主义中的爱欲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俄国思想界，对民族主义的批评和反驳成为时事政论的经常话题。针对某些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史学家(米留科夫)和文学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对民族主义的批评，青年学者穆列托夫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在这些有力的批评下，民族主义为什么依然存在，仍有许多支持者？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批评没有切中民族主义的本质：民族主义具有情感基础，它与民族自豪感、

① Дмитрий Муретов. Этюды о национализме; его же. Борьба за Эрос//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Полемика 1909–1917. Сост. М.А.Колеров. М.,2000. С.143-151;165-173.

② Евгений Трубецкой. Развенчание национализме; его же. новое язычество и его «огненные слова»; его ж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мистика и соблазн грядущего рабства// Там же, С.155-164; 174-179; 196-222.

③ Петр Струве. Блюдение себя: нравственная основа истин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его ж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эрос и иде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Там же, С.152-154; 223-229.

④ Устрянов Н. К вопросу о сущности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Там же, С.198-195

⑤ Николай Бердяев. К вопросу между кн. Е.Н.Трубецким и Д. Д. Муретовым// Там же, С.183-188.

民族优越感和爱国主义有密切联系。这种对自己民族之爱的情感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民族情感是个体性的爱欲。

穆列托夫借用柏拉图关于“爱欲”（eros）与“爱德”的区分，把民族情感比作“政治的爱欲”。按照柏拉图的观点，爱欲是对个体的热爱，它区别于达到了一般的善、达到了善的理念的美德。民族情感不是普遍的爱德。普遍的爱是道德义务，是道德命令的要求，按照康德的定义，就是那种对“一切理性存在物”都必须怀有的爱。民族情感是个体性的爱欲，是一个个性对另一个个性的情爱。对个体的爱只能是盲目的热爱。热爱——就意味着盲目的爱，超越理性的爱，超越概念界限的爱。它是对唯一者的关系，比如对某个女人的爱，对某个幼儿或朋友的爱。这样的爱是不能被命令的，不能说：你要爱安娜，而不要爱玛利亚，因为这样的爱不是指向她们两人的共同之处，而是指向她们的具体个性。

第二、民族情感是等差之爱。

由于民族情感是个体性的，因此这种爱不同于“泛爱”或“兼爱”，而是有差别的“偏爱”。“我不能像爱自己民族一样爱其他民族，这种爱是不平等的。民族主义是偏爱，是不容忍平等的关系类型”^①。

穆列托夫在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中区分了两种爱，一种是应有的爱，作为道德义务的爱。在这个意义上，索洛维约夫的公式（“要爱其他民族”等）是正确的。也可以指出对自己民族的道德上必须持有的关系（爱国主义）。但这种关系不是唯一的（自己独有的）关系，因为法国人也应有自己的爱国主义，德国人也应有自己的爱国主义。因此在民族情感中还有另一种爱，这就是“民族爱欲”，也就是对自己民族、对自己民族性、对自己民族的一切具体个性的爱。这样的爱本身既非善也非恶，因为它既可以成为善也可以成为恶。这是一个自然事实，是嗜好，有时是好的（当它不违背道德法则的时候），有时是坏的（当它违背道德法则的时候），这不依赖于某个批评者的愿望和态度，而是自己存在的，具有自我价值的。这种爱在人的意识中是高于公正意识的，这不是说爱的理念高于公正的理念，而是说，对于一个有性情的具体个人来说，爱的意识比公正意识的作用更加有力。因此，爱在一定意义上也高于良心。

第三、民族情感不是道德要求的结果。

穆列托夫只是把从道德律中产生的、被道德律所命令的关系叫作道德关系。不是从道德律中产生的、不为道德律所命令的关系，本身不算是道德关系，不是美德。因此他认为，普遍的爱，与所爱对象个人特点无关的道德之爱，是可以通过道德命

①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Полемика 1909–1917. Сост. М.А.Колеров. М.,2000. С.145.

令达到的，属于道德关系；而个性的爱，内心的爱，则是无法由道德命令来促生的，不是道德关系。我必须怀有的爱是道德的，而那种我可以怀有、也可以不怀有的爱，不属于道德范畴。民族主义不仅仅是自觉的、理性的道德义务或道德命令要求的结果。“把民族主义所说的对自己民族的爱理解为对自己民族的一种道德关系，这是对民族主义的歪曲，就像在对一个女人说‘我爱你’的时候，如果所指的是对她的道德关系，那么这是对她内心的侮辱一样”^①。

当然，这完全不意味着爱欲不能从道德观点加以评价，不能把善恶范畴运用于它。穆列托夫也确认，承认爱的自发性并不排除对爱的道德评判。认为爱本身包含着辩护和能够消除过错，这是极大的错误和卑鄙。为爱而作出的功绩是好的，为爱而犯下的罪过是坏的。接受爱不意味着为罪孽辩护，但接受爱只能接受它本身，既有它的功绩，也有它的罪孽。正是因为爱欲可能是善的也可能是恶的，因此它本身非善非恶。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关于爱欲本身的问题，不是对民族爱欲的道德评价，而是它的心理存在本身。

承认民族爱欲本身的非道德性不意味着作者站在非道德立场上。穆列托夫针对批评者的话回答说：“我没有站在任何低级的道德立场上，因为在我的文章中完全没有道德立场。因此我这里没有任何非道德主义。非道德主义从形式方面也是道德学说，因为它包含着对关于绝对应有问题的回答（即便是否定的回答）”^②。

第四、民族情感是非理性的。

民族爱欲的非理性具有两种含义。一方面，虽然在爱中有某种东西是可以解释的，但爱欲是对具体个性的爱。而个性是不能被理性所彻底认识的。因此爱欲永远是“高于理性”的爱。民族爱欲是个人对自己民族的自然情感，是在千百年历史中形成的、溶解于个性人格中的民族认同感，这样的认同感可以从外部认识，但永远也无法从内部进行清晰的理性解释。

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不依赖于理性的证明。逻辑上证明自己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这样的证明是没有意义的。反过来说，推翻了这些证据并不能推翻对自己民族的爱的情感。斯拉夫主义者可以放弃自己的关于俄罗斯民族优越性的证据，但不会放弃自己的结论和自己对俄罗斯人民的信仰。与穆列托夫的观点一致，另一位作者乌斯特里亚洛夫也指出，不能否认，你不是因为某种理由、不是出于某种深思熟虑才希望自己祖国强大和荣耀的，而是由于某种直接的、先于一切判断和理由的“内在感觉”。我们的敌人未必比我们差。然而我们为什么还是热烈地渴望、梦想和祈祷我们自己的胜利？为什么每个胜利喜讯都让我们兴高采烈，欢欣鼓舞，而每一个失

^①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Полемика 1909–1917. С.145.

^② Там же.С.168.

败的消息则让我们如此悲伤和痛苦？显然，俄国学者可以提出俄国必胜的许多有力证据，但德国学者也能够提出同样数量的证据证明德国必胜。双方永远不能用证据说服对方。“合理的”证据在这里是没有说服力的。^①

穆列托夫揭示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学说，而是具有深层的民族情感基础，这一基础本身不具有道德属性。但另一方面，当以民族情感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进入社会生活和民族—国家关系的时候，就应当服从理性指导和道德规范。针对穆列托夫对民族主义的情感论所作的辩护，宗教哲学家叶甫根尼·特鲁别茨科伊从普遍道德律的观点进行了批评。

二、民族情感应当服从道德规范

特鲁别茨科伊对民族主义有另外的理解：“我所说的民族主义，是民族的绝对自我确立，即这样一种流派，它把为民族服务提高到最高的和绝对的原则，这个原则不服从任何道德规范”^②。这种理解接近于索洛维约夫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即民族利己主义，它的公式是：“我们民族是所有民族中最优秀的民族，因此它负有这样的使命：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征服所有其他民族，或至少要在它们之中占据首位”^③。在这样一种理解的基础上，特鲁别茨科伊尖锐地批评穆列托夫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非道德主义。他把穆列托夫的观点归结为：“民族主义丝毫不表明道德关系，民族主义的本质在道德与无道德的彼岸”。特鲁别茨科伊的批评可以归结为四点：

第一，民族爱欲论违背绝对道德律和社会正义。道德律在本质上是绝对的和普遍的。容许超出其作用范围的某种例外，就意味着完全推翻道德律；容许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脱离道德律——意味着违背道德律。为自己民族的例外所进行的全部辩护正是这样做的。

特鲁别茨科伊责问道：如果民族主义在本质上不是道德关系，如果它只是排除了正义的偏爱，那么，恶劣的民族主义和好的民族主义又有什么区别？如果民族主义不能用正义的观点来评价，我们又有什么权利谴责侵略和暴行的民族主义？难道侵略者不同样有权用穆列托夫的话来回答对他们的谴责吗：对自己民族的爱不服从伦理标准，因为这是盲目的爱，是“高于理性、高于正义的”。

第二，民族主义问题上的道德相对主义会成为民族利己主义的借口。特鲁别茨科伊举了一则很有代表性的笑话：一个著名的法国民族主义者与托尔斯泰伯爵说建

①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Полемика 1909–1917. С.191.

② Там же. С.156.

③ 索洛维约夫：《俄罗斯与欧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2页。

立俄法同盟的必要性，托尔斯泰只用一个理由来反驳：一切战争和以战争为目的而建立的同盟都是不容许的。这个理由并没有让法国民族主义者难堪，他回答说：“伯爵，我也是绝对反对战争的，但说到祖国，就是另一回事了”。

有人一方面承认战争或任何其他行为从道德观点看是绝对不容许的，另一方面在谈到祖国的时候又认为这些行为是容许的；在谈论自己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具有双重标准。这样，为祖国而容许例外往往成为一些民族主义者的借口，他们实际上是在为自私自利的丑恶行为作辩护。

第三，对祖国的爱也应当持有批判的态度。对祖国的爱应当表现为盎惑的奉承，表现为对自己民族一切缺陷的称赞，就因为这些缺陷是自己民族的；还是应当相反，表现为严格地揭露这些缺陷，积极地唤醒民族良知，带着神圣的仇恨来反对我们自身的丑陋之处，反对一切有损于我们民族精神面貌的东西？特鲁别茨科伊认为，穆列托夫的民族主义，对自己民族和其他民族来说，都不是道德关系的民族主义。确立这样的民族主义，是对民族良知的根本否定。在这样的民族主义中找不到任何理由来反对恶意的盎惑，相反，却可以找到一切借口来为这种盎惑作辩护。

第四，对祖国的爱是一种客观价值。假如我的民族对我来说只是我的情感的主观价值，那么，在我对民族的关系上就没有任何客观应有的东西来要求我做，就不应当要求我为民族牺牲。一切都依赖于我的情感，确切地说，依赖于我的个人情绪的任性。我想要为祖国牺牲就牺牲，如果我不想，也可以不去牺牲，甚至可以为我自己的利益牺牲祖国。显然，真正的爱国主义的实质不是这样的。它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评价的时候，或者完全不顾个人情感的力量，或者至少是不仅仅关注个人情感的力量。

因此，特鲁别茨科伊认为，“政治的爱欲”准确地表达了民族主义的本质，这显然是错误的。假如这是对的，那么，对任何人都不能要求他为祖国做出某种行为，而且不能要求他对祖国有情感，因为爱欲是完全不能要求的。要求人爱某个民族和国家是无意义的，就如要求某人爱一个女人是无意义的一样。但是，既然不爱国的人被我们认为是有道德缺陷的人，那么这就意味着，爱国情感——完全是不同于“爱欲”的另一类东西。祖国对我们来说是母亲，而完全不是心爱的情人，因为不是我们选择了她，而是她生养了我们；我们对她的关系，如果没有病态的话，是孝子，而不是情人；在世界所有语言里都把祖国叫作母亲，这不是偶然的。这里表达了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意识，即对祖国的爱不同于爱欲，爱欲不能成为义务；对祖国的爱是某种客观上的应有之物，并且是绝对应有之物。

特鲁别茨科伊看到了穆列托夫在关于民族爱欲的论述中包含着可能被曲解和恶意利用的巨大危险，他的批评体现出俄国哲学家对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意

识形态的清晰认识。当然，在其批评中也有某些误解。穆列托夫比喻说：“把民族主义所说的对自己民族的爱理解为对自己民族的一种道德关系，这是对民族主义的歪曲，就像在对一个女人说‘我爱你’的时候，如果所指的是对她的道德关系，那么这是对她内心的侮辱一样”。特鲁别茨科伊反驳说：“我认为恰恰相反，对一个女人说对她的爱不是道德关系，这是对所爱的女人的最大侮辱；因为这样就把所爱的女人放在与妓女一样的地位了”^①。特鲁别茨科伊在这里混淆了两个“不是道德关系”的概念：当穆列托夫说民族爱欲像对一个女人的爱一样而非道德关系的时候，所指的是这种爱不是从普遍道德律中产生的，是个体的、独一的、特定的、不适合于他人的爱；而特鲁别茨科伊所说的“不是道德关系”的爱，所指的是不服从道德规范和不接受道德评价的爱。

三、民族情感既是爱欲也是道德义务

司徒卢威在原则上赞同穆列托夫的基本观点：“穆列托夫把对自己民族的忠诚或爱所具有的非理性，说成是政治的爱欲，把对这种偏爱的理解或辩护看作是作为一种哲学学说的民族主义的本质。这是对民族主义心态的鲜明描述”^②。在穆列托夫关于民族主义的探讨中，把民族主义看作是政治的爱欲，指出和强调了对自己民族及其国家组织的爱的一个特点或方面。这种爱不需要任何理性证明和核准，像任何一种真正的爱一样自我存在。

同时，司徒卢威又对这一观点提出两点补充：首先，民族爱欲不仅是自发的欲望，也是道德义务。他指出，实际上，爱欲是与“道义”（ethos）相联系的。任何一种真正的爱，任何一种真正的爱欲，同时总是一种最伟大的道德任务：对受爱欲控制的人来说，没有比感到无力完成爱中所包含的巨大道德任务更加痛苦和恐怖的了。对各种爱欲来说都是这样。如果民族主义是政治爱欲的表现，那么，它不能不同时也是道德任务。

其次，民族情感不是反理性的任性，而是要服从道德标准，要求自我节制。对祖国和人民的爱意味着希望它们不仅具有物质的、外部的力量，而且具有精神力量。这要求进行不断的精神创造工作。包含着道德任务的真正民族主义，要求不断的道德创造。这种创造既包括个人生活，也包括社会关系和国家任务，要求我们在解决战争问题的关键时刻说出“自我守节”^③。司徒卢威也看到了在穆列托夫所说的民族

①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Полемика 1909-1917. С.157.

② Там же. С.180.

③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Полемика 1909-1917. С.154.

爱欲中潜藏着民族主义的危险性。他指出，这些危险性是存在的，不应忘记或掩盖。但民族主义所固有的危险性不是某种学说或宣传的危险性，而是与人的生命的强大要素——民族性和国家性相联系的危险性。这里就产生了“自我守节”的道德要求，也就是要把“道义”贯彻于爱欲。当然，这里完全不是说使爱欲从属于道义，因为这种从属是不可能的（假如是可能的，那就意味着摧残和装模作样），而是说两种平等的自发力量的相互渗透。

司徒卢威通过对母亲的崇敬和爱来说明，民族爱欲与道德义务并不是相互矛盾的。把与祖国的关系理解为对母亲的关系，从这种理解中完全不能得出，这种关系不可以建立在独特的爱欲基础上，也就是完全是一种内在的和个人的关系。相反，正是这种类比（这种类比不是偶然的，而是与民族和国家原则相联系的，民族和国家原则在起源上是母子关系或亲属关系的扩展）说明了对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具有爱欲的特点。被我们当作“绝对义务”的对母亲的崇敬，当它作为无个性的伦理义务的时候，它只是完全个人的内在关系在意识中的反映，而这种内在关系是不能成为命令的，它被我们感知为不是义务，而是爱或喜好。这里的区别完全不在于，一种命令是绝对律令，具有客观性质，而另一种命令来自爱和欲望，具有主观性质。因为任何真正的爱欲，甚至真正的性爱，总是上升到某种客观力量，具有客观意义。这里的区别在于，道德性质的义务（或绝对律令）是无个性的，是针对任何一个作为人的主体的；而爱欲，也就是爱或喜好，是个人或个人化的关系，是活的，生动的。这样的关系不可能完全理性化，具有最高力量，发出诱惑的呼唤，这呼唤有时违背道德诫命和理性的指示。这种呼唤有时会在我们内心产生比道德义务的通常冲突更深刻更痛苦的冲突和斗争^①。

四、民族情感的审美属性

乌斯特里亚洛夫也强调民族情感的积极作用。他把对祖国的爱比作火焰，认为它创造着文化，给世界带来新的价值。道德本身将被这种伟大的爱所充实，甚至逻辑本身都被这种爱所完善，并因之而富有成效。

既然民族情感高于逻辑公式和伦理价值，那么，在怎样的价值体系中能够对它有合理的认识和评价呢？乌斯特里亚洛夫提出：“祖国”是审美范畴。对祖国的爱这一事实，既不能从自然体系的观点来解释，也不能从伦理体系的观点来解释，但可以借助审美认识范畴得出。在理解民族问题时，爱国主义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成为更

^① Там же. С.225-226.

普通的哲学问题——审美法令与伦理法令的关系问题。研究结果可能得出如下信念：作为人的认识领域里最高体系的审美体系，既包含着伦理体系的原则，又克服（“扬弃”）了伦理体系的原则；正如伦理体系既吸收自然体系原则，同时又消除自然体系原则一样。美具现着抽象的善的规范，同时又创造性地补充和修正这些规范。这样的相互关系有时可能产生普遍道德律与具体审美命令之间的某种纷争。但此时，审美命令永远应该是优先的，因为美的原则比善的原则更高，更“终极”^①。

别尔嘉耶夫从人格主义立场评价民族情感问题，进而提出爱的超道德性和审美性。他指出，爱的领域本身毕竟是在道德评价之外的，适合于评价这一领域的主要是审美标准，而不是道德标准。投入爱中的人可能做出犯罪行为，但爱本身不可能是道德的，也不可能是非道德的；爱本身是自律的和有自我价值的，它不能容忍任何规范。爱永远是神圣自由的。还可以说，爱是美的，但不适合说爱是道德的。在别尔嘉耶夫看来，特鲁别茨科伊公爵过于在道德哲学中康德主义化，过于赞同康德的绝对道德主义，并因此认为绝对道德律令运用于生活的全部领域。

别尔嘉耶夫认为，司徒卢威和穆列托夫过于想要把国家的价值绝对化，而国家的价值只是诸多非最高价值中的一种。国家绝对主义比道德绝对主义更不能容许。人的灵魂价值高于国家和世界的价值。民族本能的自发热情应当得到辩护和成为创造的源泉。将民族斗争道德化可能变成一种无道德的自我赞扬。更高的道德意识应当承认，在各民族的历史冲突中，永远不可能一方完全是善的，而另一方完全是恶的。这意味着，历史中的民族斗争不是为争取道德正义而斗争，而是为生存、为创造历史价值而斗争。

在别尔嘉耶夫看来，人生的悲剧不是表现为道德与非道德、善与恶之间的简单冲突，而是表现为不同等级的价值之间的复杂冲突。这些价值同样企图获得肯定意义，同样追求神性生活。人的灵魂是善的价值与美的价值或认识的价值发生悲剧性冲突的舞台。俄国知识分子的悲剧——首先在于各类价值的冲突，而不在于善与恶的冲突。他们愿意选择的只是社会道德价值，由此不能不有损于认识价值、审美价值^②。

我们看到，乌斯特里亚洛夫和别尔嘉耶夫都把民族爱欲这种内在情感看作审美之物，而把审美与道德对立起来。人们通常说俄国哲学强调道德，其实不完全如此。相对于抽象认知思维来说，俄国哲学家是强调道德，但他们也常常批评道德主义，批评康德的道德命令，从而来强调审美。认为美是最高范畴，因为审美更真实地体

①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Полемика 1909-1917. С.192.

② Там же.С.185-186.

现内在自由，所以俄国思想最核心的东西是个性自由。可是自由是最难达到也是最难说清的，如果勉强表达，只能说自由就是人本身，就是人的生活本身，就是当下活着。强调审美价值和个性自由，与强调民族主义的情感基础一样，都体现了俄罗斯思想的非理性特点。但这并不是说俄国思想家对民族主义的认识缺乏理性观点和哲学深度。这次民族主义争论之前，哲学家谢尔盖·布尔加科夫就发表了《关于民族性的思考》一文（1910年），对民族性和民族主义问题作了深刻的哲学研究。

五、民族性是名称还是实在

布尔加科夫站在哲学高度，看到了对民族性的研究不仅仅是客观的科学研究问题，对民族性的思考不是无前提的，而是有两种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作为思考的立场或前提。这个立场与思维判断过程伴随着——有时甚至不依赖于判断者的意识，乃至预先决定判断过程。这两种立场就是哲学史上的两大流派，唯名论和实在论。唯名论与实在论的区别，简而言之就是非感性的一般存在，比如族、类，是名称还是实在？唯名论认为这个一般的类只是个名称，不是真实存在，只有具体的个体才是真实存在；而实在论者认为一般的类不仅是个名称，也是一种实在。把这种哲学思维的分歧运用于民族问题，则得出对民族性的两种不同立场，而这两种立场本身没有对错之别，不是科学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属于直觉和信念的问题。

对唯名论来说，民族只不过是一些与民族生活有着这样或那样联系的事实的总和，或是一个集合概念，就像森林是许多树木的集合一样。在这里，通过尽可能完全地列举民族特点和民族现象而得到的总和，原则上就是民族概念的内容，用历史学方法对民族的起源予以解释，就是对民族问题的完全解决。启蒙哲学持有这种观点。俄国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历史学家米留科夫也都这样认为。

实在论哲学完全从另一种观点说明民族问题。民族不仅仅是科学研究的外部民族现象的总和，而首先是某种实体。它创造性地表现自身，但不完全容身于自己的任何一种表现，因此不与自己的表现混同。民族不是集体概念或逻辑抽象物，而是创造性的活的本原，是一个精神有机体，它的成员都处于同这个有机体的内在血肉联系之中。当我们体验民族感的时候，当我们在自身中体验到民族的存在或在民族中体验到自己存在的时候，我们所体认的是存在性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定义^①。

^① Булгаков С. Н.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1910)// С.Н.Булгаков.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2. М.,1993.С.459.

这样，唯名论和实在论，这两种哲学世界观必然导致关于民族的两种形而上学。在一种情况下，民族问题被完全诉诸现象，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民族则被确认为一种超验实在，是一种在直接体验中才能直观到的实在。这种形而上学的分歧完全不关涉对民族的经验研究和关于民族的科学。科学忠实于自己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依赖于哲学前提进行研究。但是，当讨论到价值问题时，一般来说，当一个人不仅仅是科学的记录者，而是遵循一定的理想、情绪和意愿动机而行动的活动者的时候，这些哲学前提就会明显表现出来。问题在于，每一个研究和讨论民族问题的人都是具体的个人，都是有情感、意愿，有民族属性的人，这也涉及到俄罗斯思想界当时所讨论的“知识分子的民族面孔”的问题。

布尔加科夫指出，如果从实在论的前提出发，我们应当把民族性思考作为某种实体的存在，是先于意识的存在物，是意识的出发点。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民族的成员，是因为我们在现实上属于这个民族，就像属于一个活的精神有机体一样。我们的这种从属关系完全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这种从属性存在于意识之前，不通过意识甚至与意识相背离。它不仅不是我们的意识或意愿的产物，甚至相反。民族意识和民族意志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倒是民族性的产物。因为自觉的和有意志的生命就已经是以某种存在的人格核心为前提的，人的意识和意志正是在这种人格核心的有机环境哺育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人是作为民族一员而诞生的，就像树枝在森林中不可能直接从空气或土地上长出来，而只能从树干上生长出来一样。在这种实在方面，我们无力改变任何东西，民族性是人无法脱去的本性之一。

俄国哲学家对民族、民族性、民族主义有着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思考与研究。强调民族情感的基础性和力量，是为了反驳某些人对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的简单否定；反对社会生活中的民族主义，强调民族情感服从道德规范，是为了确立民族—国家关系中的社会正义；强调民族情感的审美意义，是为了维护人的个性自由；而关于民族性的唯名论和实在论前提的分析，则体现了哲学方法对民族问题研究的意义。

六、结语

俄国思想家关于民族情感与道德义务的这次争论虽然发生在近百年前，但其中讨论的问题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启发意义。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三点结论：第一，民族情感作为个体性的“爱欲”，是人的生命的自然事实和结构要素，是民族主义的深层根源，其中既潜藏着创造力，也包含着危险性；第二，当民族情感进入社会生活和民族关系领域的时候，必须遵守普遍道德规范；第三，那么，普遍道德义务和道

德命令能否有效地指导和保障这种民族情感和民族主义处于社会正义之中呢？在此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哲学观点：一种是理性主义观点，另一种是非理性主义观点。按照前一种观点，作为“理性存在物”的人，自身就具备理性的自主和自律，具备道德义务感，因此，虽然人性有根本恶，但绝对道德律仍然能够对其进行有效调节和支配；按照后一种观点，普遍道德命令对人的内在生命来说只是一种抽象之物和外在之物，其自身不能起到根本作用，只能通过内在情感起作用。个性的生命总是存在着无法理性化的神秘方面，因此，个性之爱是有差异和等级的，普世之爱不能取代民族情感。

这些一般性结论对于解决当代民族主义问题具有的启示意义是：民族主义问题在战争年代多体现为爱国主义和国际关系问题；在当代社会，则主要表现为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问题。为了解决民族矛盾和冲突，在国家民族政策的指导方针上，往往需要倡导淡化民族意识。问题在于这种淡化在哪个层面上是可行的，通过怎样的方式才是有效的。根据民族情感的自发性和非理性特点，我们可以得知，为了有效解决民族矛盾，只通过公民意识和道德法规的宣传教育是不够的，首先应当重视和尊重民族情感，然后，应当加强民族间交往，培养个体性的跨民族情感和友爱，从内在精神上促进民族团结。

【Abstract】 Nationalism is the subject of lengthy discussions of intellectuals in Russia.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of nationalism raised and discussed by Russian scientists in 1916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1) the essence of nationalism is eros, there is neither good nor evil in it; (2) national sentiments should not blindly obey the emotions, but must be subject to moral principles, (3) the national feeling is both love and moral obligation; (4) the national feeling is above ethics and has aesthetic attributes. Understanding of national character is not only an objective science, there are also two different metaphysical premises — in terms of nominalism, the concept of nationalism is a collective concept or logical abstraction, in terms of realism, the spirit of nationalism is a real body.

【Key Words】 nationalism, national feeling, national love, nationalistic realism

【Аннотация】 Национализм является предметом длительных дискуссий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ов России. Поднятые и обсуждённые российскими учеными в 1916 году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вопросы дебатов о национализме можно разделить на четыре группы: (1) сущность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 это эрос, в нём нет ни добра, ни зла; (2)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чувства не должны слепо подчиняться эмоциям, а должны быть подчинены моральным принципам; (3)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чувство является и любовью и моральным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ом; (4)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чувство выше этики, обладает эстетическими атрибутами. Понима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являе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объективной наукой, существует также две различные метафизические предпосылки —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номинализма, понятие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 это коллективн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или логическая абстракция;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еализма, дух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является реальным организмом.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чувств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эрос,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реализм

(责任编辑 阎德学)

经济

中俄电力产业规制机构设置及影响因素比较研究

于彬 曲文轶**

【内容提要】规制机构改革是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电力产业为例，应用规制机构设置的相关理论以及制度分析方法，对中俄两国价格规制机构在独立性、管辖模式以及权力配置方面的特征加以介绍，并对形成两国规制机构特征的制度因素进行分析。两国宏观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电力产业自身特点，包括改革前的规制机构的初始权力配置、改革中实施的措施以及在改革后形成的在位企业的产权状况等，都是对规制机构的设置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电力产业 规制机构设置 影响因素 中俄比较

【中图分类号】F416.61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4-0075-(17)

规制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由规制机构通过制定法律或行政法规等手段实现对微观企业的定价、产业进入等一系列行为的干预和控制。规制大体分为政策与体制两方面，规制政策包括民营化、竞争及激励性规制，规制体制包括规制机构的设置以及规制法律的实施。自20世纪70年代各国进行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改革以来，学者们在规制政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对规制体制，特别是规制机构的设置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却又明显不足。规制机构的设置不仅对规制政策的激励效果产生约束，而且影响到整个规制改革的绩效。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转轨国家，政府的作用由计划经济时期基于所有权的对企业的直接经营管理，转变为

**本论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转轨经济中的自然垄断规制改革：中俄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790010）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普京主政以来俄罗斯经济政策调整评析”（项目批准号：07BGJ027）资助。

于彬，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转轨经济学博士研究生；曲文轶，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一个外部监督者的角度对企业的价格和产业的进入等进行规制，管理职能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此带来规制机构重构这一核心问题。那么，中俄两国是如何设置规制机构的？其背后的决定因素又有哪些？本文以中俄两国电力产业为例对此进行比较分析。

一、自然垄断规制机构设置及其影响因素

现有对自然垄断规制机构的研究，主要从规制机构如何设置的理论角度，以及如何针对国别特点设置适宜的规制机构的实践角度进行，也有少数研究关注到决定一国规制机构设置的影响因素。

（一）规制机构的设置问题

规制机构的设置包括若干问题，如规制机构的独立性、管辖模式、权力配置、工作机制、协调机制、监督机制等等。本文从最基本的前三个角度对规制机构的设置问题进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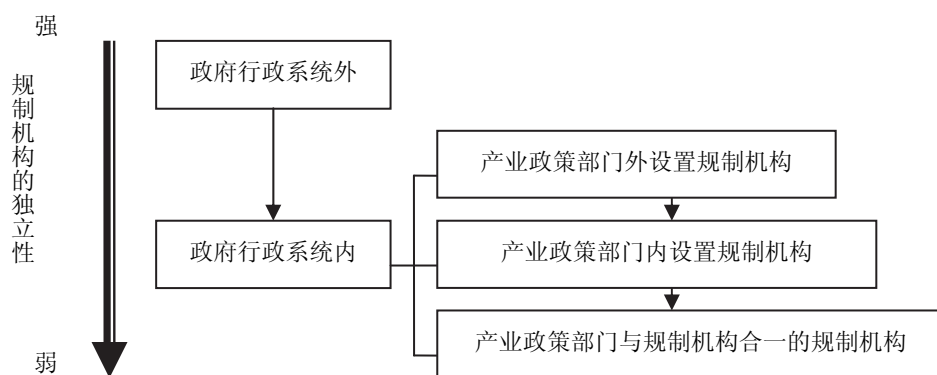


图 1 按规制机构独立程度划分的规制机构类型

第一，规制机构的独立性（图 1）。规制机构的独立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规制机构与作为其规制对象的企业之间的分离；二是指规制机构的规制职能与政府其他机构的政策制定职能的分离。^①规制机构与被规制企业分离，有助于保证规制机构不因与被规制企业的直接利益共同体关系而受其影响做出不利于消费者的决定；规制

^① 刘易斯·卡布罗：《产业组织导论》，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01 页。

职能与政策制定职能分离的影响则应区别对待：一方面，分离有助于使规制机构的决定不受政府政策部门的不当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规制勒索”^①；但另一方面，独立于政府其他机构所获得的自由裁量权，又使得规制机构在遇到被规制企业“献租”时更可能因不受政府其他部门干预而被被规制企业所“俘获”。因此，设置规制机构，一方面要保持其行使规制职能时的独立性，同时由于规制会带来让渡租金的权力，因此规制就必须由政治机构控制，以确保某种程度的问责。^②

由于独立规制机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规制职能与政策制定职能的分离，同时政策制定通常为政府行政系统内产业政策部门的职能，因此，规制机构与政府行政系统以及行政系统内部产业政策部门的关系，成为衡量规制机构独立程度的依据。在政府行政系统之外设立的规制机构最不容易受到政府和产业政策部门的影响，这是因为行政首长通常不得对此类规制机构的人事任意任免，规制职能的行使独立于行政系统，并且经费的来源也不依靠行政拨款，所以独立性最强；其次是政府行政系统内产业政策部门外设立的规制机构，虽然这种规制机构在人事任免方面通常由行政首长确定，但由于其拥有与产业政策制定部门同样的行政地位，通常也不易受到产业政策部门的影响；再次是产业政策部门内部设立的独立行使规制职能的规制机构，这种机构不能完全摆脱部长或最高行政首长的影响，但法律赋予他们很大的独立权力，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单独地作出规制决策；^③最后是独立性最弱的产业政策部门与规制机构合一的规制机构，这种设置方式不区分宏观政策部门和规制机构，而由传统行政部门的内部单位负责各项业务的处理，因此规制决策极易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

规制机构设置于行政系统内、外，决定了对其问责的对象。通常，规制机构无论设置于行政系统内还是行政系统外，都要受到立法机构和司法部门的监督。在规制机构与立法机构的关系方面，通常一国的规制机构通过立法机构建立并根据立法机构的立法原则和授权范围行使其权力，而且对规制机构首脑的行政任命也必须经过立法机构的同意；在规制机构与司法部门的关系方面，司法部门有权对规制机构权力的不当行使进行监督，有权对规制机构制定规制法律和政策进行解释等。^④有所

① “规制勒索”理论认为，自然垄断产业投资巨大，沉淀成本高，一旦投资完成，投资者通常处于被动地位，与政策部门未实现分离的规制机构有可能在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对被规制企业进行挤压，如政府为争取广大消费者的选票而降低服务价格从而形成对被规制企业不公的决策。参见拉丰、梯若尔：《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1页。

② 拉丰：《规制与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5页。

③ 王俊豪、肖兴志、唐要家：《中国垄断性产业管制机构的设立与运行机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13页。

④ 同上，第107页。

不同的是，是否受到行政机构的制约，是否对行政首长或是行政机构负责。只有独立于政府行政系统之外、与行政系统没有政治隶属关系，才不必对行政首长负责，而在政府行政系统内，无论是在政府部门下设立相对独立的规制机构还是直接由政府政策部门进行规制，规制机构的工作情况都要对行政首长负责。

第二，规制机构的管辖模式（表 1）。规制机构的管辖模式是指规制机构在产业维度方面是规制一个产业还是多个产业，在职能维度方面是只行使一项规制职能，还是同时行使多项规制职能。首先，按产业维度划分，规制机构的管辖模式包括两种，单产业模式和多产业模式。单产业模式指对电力、燃气、电信等各个产业进行单独规制；多产业模式指将相关产业如按能源包括电力、石油、天然气等产业、按交通运输包括航运、铁路运输、水运等产业分别进行规制，甚至建立对整个公共事业包括电力、供水、教育、医疗等进行规制的规制机构。相对于多产业模式，单产业模式的优点是可以针对每个产业的不同情况实施有针对性的规制；可以降低规制失效的损失；可以形成多个规制机构之间的创造性竞争，从而推进规制方法的创新。缺点是不利于规制资源的共享和人才的合作，增加规制俘获的可能性，不适应产业边界模糊和业务融合的趋势。

表 1 规制机构的管辖模式

管辖模式			
按产业维度划分		按职能维度划分	
单产业模式	多产业模式	单职能模式	多职能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作表

另外，由于规制有多个职能维度，包括价格、质量、环境和进入规制等，因此按规制职能维度划分，规制机构模式又分为单职能模式和多职能模式。单职能模式是指规制机构只针对一个职能维度，如价格，进行规制；多职能模式则是指多个规制职能集中于一个规制机构。相对于多职能模式，单职能模式的优点是可以发挥规制者的专业技能，从而有利于规制水平的提升；使各个职能规制机构之间串谋和企业俘获规制机构的成本上升，有助于规制政策目标的实现；被规制企业需要向不同的规制机构传递信息，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缺点是各项职能之间缺乏协调，可能产生规制决策拖延和规制效率下降；少量的规制人才分布在众多的职能部门，不利于发挥彼此之间的协同效应；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过度竞争可能造成规制政策不一。^①

第三，规制权力的配置。是应该在中央层次上进行统一（集权^②）规制还是中央

① 沈宏亮：“网络型产业规制机构模式研究”，《改革与战略》，2009年第4期，第139页。

② 关于权力配置的不同模式参见王俊豪、肖兴志、唐要家：《中国垄断性产业管制机构的设立与运

和地方组成的双层（分权）规制，这实际是规制权力的纵向配置问题。纵向集权规制的优点，是可以更好地利用全国性的专门知识，可以保证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可以减少地方规制者之间的协调成本。纵向分权的优点则是使规制者的目标和方法可以根据当地的条件、重点和偏好来进行调整；可以在规制者之间带来创造性竞争，这种竞争可能会减少政治家的自由裁量权，并且改进可问责性，可以使地方权力机构有更好的执行。^①规制权力配置还包括权力的横向配置，即同一规制职能在单个和多个规制机构之间的集权配置和分权配置，与横向分权规制相比，集权的规制具有更加清晰的规制权力界定，更能体现规制机构的独立性，相应地，规制机构被俘获的可能性也更大一些。

（二）规制机构设置的影响因素

规制改革是在一国既定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的，规制机构设置作为规制改革的一部分也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进行的。规制机构以什么形式出现，以及如何演化，这两方面均受到制度框架的根本性影响。对于特定产业规制机构的设置来说，一方面受一国宏观的政治、经济制度影响，另一方面也受特定产业自身特点的影响（表 2）。

表 2 影响规制机构设置的因素

影响因素 机构设置	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	产业特点		
	国家结构形式	财税体制	初始状态	改革措施	产权状况
独立性					√
管辖模式				√	
权力配置	√	√	√		√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作表

一国宏观的政治制度主要包括政党制度、国家结构形式、选举制度、法制制度以及行政管理体制。宏观经济制度则主要包括外贸、金融、财税、就业等。在政治制度的影响方面，规制权力的配置非常接近于一国的政治结构，^②特别是单一制和联邦制的国家结构^③影响一国规制机构的纵向权力划分，单一制倾向于中央集权规制，而联邦制倾向于中央与地方分权规制。这是因为，在联邦制国家，每级政府在其权力范围内都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政治实体，宪法赋予地方政府很大的独立性，属于地方管辖的事务，联邦政府无权干涉，在此基础上更加容易形成规制权力在中央与地

行机制》，第 145 页。

① 拉丰：《规制与发展》，第 151-154 页。

② 拉丰：《规制与发展》，第 125 页。

③ 余晖：“监管权的纵向配置”，《中国工业经济》，2003 年第 8 期，第 21 页。

方的分离。在单一制国家，虽然也存在某些管理领域的中央与地方分权，但是这种分权通常是在行政体系内，受行政纵向架构体制的影响。而单一制国家纵向行政架构通常是中央负责制定规制政策以及对规制的各个方面进行最终裁决，受其直接管理的部门则负责将中央的政策及决定予以推行，地方的自主性也相对较弱。并且，如果受规制产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则更倾向于权力向中央集中，以达到保证政策统一、提高组织效率以及防止地方规制者被俘获的目的。

在宏观经济制度影响方面，财税体制中财政收入来源与财政支出去向影响着规制机构纵向权力的划分。一般来说，征税权力应与相应的支出责任对等，同时支出责任与规制权力匹配更加适宜，因此，中央财政收支对应着中央规制，地方财政收支对应着地方规制。由与财政机构级别相对应的规制机构来行使规制权力，特别是存在对被规制企业进行财政补贴的情况下，规制权与财政收支权责的纵向匹配，才有助于实现规制机构的有效规制。

产业自身特点包括改革前的规制机构的初始权力配置、改革中实施的措施以及在改革后形成的被规制企业的产权状况等方面，这些都对规制机构的设置产生影响。首先，改革前初始状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改革结果往往是对初始状态的一种路径依赖，一旦改革开始时某个机构正在规制一个产业，尽管在改革过程中采取措施加以改革，却很难将规制结构完全改变。也就是说，从一个现有结构中转移权力是相当困难的，这是因为规制赋予了创造和分配租金的强大权力，使得政治和行政机构不愿放弃它。^①其次，改革中实施措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国对规制改革道路的设计以及改革过程中政策措施的具体实施将直接影响到规制机构的管辖模式，最终形成何种管辖模式是由每一步措施的推进累积取得的。最后，为使规制改革取得成功，规制机构设置需要与被规制企业的产权状况相适应。产权状况对规制机构的独立性以及纵向权力划分产生影响。独立性差的政府政策部门和规制机构合一的模式，一般出现在公用事业仍属于国家独占或国有股份仍占主要地位的国家。在这些国家，虽然实现了名义上的政企分开，但是大多数国有企业领导人都拥有行政级别，事实上仍属于国家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国家作为企业的出资人，能够利用对企业的行政领导关系，通过干预企业的经营决定来实现政治目标，因此往往采取传统行政部门统一行使所有权、经营权、政策制定权和规制权多重职能的管理模式，即使在实行市场化改革后也不愿意改变这种模式。^②此外，大型中央企业领导的级别通常高于地方规制机构。因此，在这些传统科层式行政官僚体系盛行的国家，规制央企对于地

① 拉丰：《规制与发展》，第 131 页。

② 王俊豪、肖兴志、唐要家：《中国垄断性产业管制机构的设立与运行机制》，第 118 页。

方规制机构来说往往是力不从心，而规制权力集中于中央规制机构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除以上因素之外，地区间差异化程度、地方性信息可利用程度、以及地方执行力情况也会对规制权力的纵向配置产生一定影响。^①地区间差异化程度大、地方性信息可利用程度强以及地方执行力强的情况下，倾向于纵向分权规制，反之，则倾向于纵向集权规制。由于对规制机构设置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最终规制机构如何设置取决于这些因素之间力量对比的结果的。下面将结合中俄两国的具体情况对规制机构的设置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二、中俄电力产业价格规制机构的设置

规制分为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两个方面，价格规制是经济性规制的最重要内容，主要是指在自然垄断产业中，规制者从资源有效配置和服务的公平供给观点出发，以限制垄断企业确定垄断价格为目的，对价格水平和价格体系进行规制。在竞争产业中也可以进行。^②随着电力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对自然垄断认识的深入，发、售电环节成为竞争环节，输配电环节仍具有自然垄断性质。中俄两国对竞争性的发、售电环节以及自然垄断性的输配电环节都实施了价格规制。^③

（一）中国电力产业价格规制机构设置

根据 2005 年 5 月 21 日起实施的《电力监管条例》，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规定，对电价实施监管（第二十条）。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为国务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发改委），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为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以下简称电监会），因此发改委和电监会为我国电价规制机构。下面从我国电价规制机构的独立性、管辖模式、权力配置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独立性及管辖模式。发改委是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的组成部门，是负责研究拟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进行总量平衡，并指导总体经济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虽然与国务院其他组成部门同属于部级机构，但从其职能看，发改委实际上是一个凌驾于各部委之上的综合宏观调控部门，其内设部门几乎涵盖了所有国

① 拉丰：《规制与发展》，第 151 页。

② 参见植草益：《微观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③ 根据电力的四个环节，最终电价（或称供电电价）相应地也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发电电价，也称上网电价，第二，输电电价；第三，配电电价；第四，供电电价。每个环节都有相应的服务性收费。对价格规制的分析还应包括对每一环节定价机制的探讨，但这并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本文主要对中俄电力产业规制机构的现状及其异同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务院组成部门，^①电力产业政策部门能源局作为能源产业的政策部门也是其下设机构。因此，作为电价规制机构之一的发改委，其性质是产业政策部门与规制机构合一的部门，是独立性最弱的一种规制机构设置方式。其内设机构价格司是价格规制的专门机构，除了对电力价格具有决定权之外，对由政府定价或确定指导价的其他产业也具有价格决定权。此外，发改委管理的能源局对电力产业重大项目的投资以及电力产业的进入具有决定权，具有投资和进入规制职能。因此，从独立性和规制模式上看，发改委是政府行政系统内设立的、产业政策部门与规制机构合一的、多产业、多职能的规制机构。

电监会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专门负责电力产业包括发电、输电和供电环节的监管，以及与发改委共同行使电力产业价格、投资以及进入规制的职责。^②电监会与电力产业政策部门能源局没有隶属关系，对除电力产业之外的其他产业也不行使管理和规制职能，因此属于政府行政系统内、产业政策部门外设立的单产业、多职能规制机构。

二者均设立于传统科层式行政官僚体系之内，一方面决定了其很难避免不当的政治干预和行政影响，另一方面则决定其问责对象。1992年颁布实施的《国务院组织法》规定，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由总理提出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设立、撤销或者合并，各部、各委员会工作中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行政措施，应向国务院请示报告，由国务院决定。在绩效考核和人选任命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务院总理提名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国务院负责审定行政机构的编制，依照法律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人员。因此，国务院发改委以及电监会分别作为国务院的下设部委以及直属事业单位，直接向国务院汇报工作，其领导任命由国务院总理提出，其内部行政人员的任免、考核和奖惩也属于国务院的职权范围。我国价格规制机构对国务院也就是中央政府负责，其行使电力价格职责的法律依据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价格法》、《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等法律。

第二，规制权力配置。从横向配置来看，同属国务院机构的发改委和电监会都是电价规制的主体。根据2005年下发的《关于明确发展改革委员会与电监会有关职责分工的通知》，在电价政策方面，由发改委和电监会共同制定^③；在具体价格制定

① 如农经司对应农业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对应环境保护部、经贸司对应商务部。

② 具体职责可以参考《电力监管条例》第三章监管职责的内容。

③ 《关于明确发展改革委员会与电监会有关职责分工的通知》中规定：发展改革委员会在起草有关电价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进行电价政策调整，制定全国性电价调整方案以及涉及全国性的重大电力项目电价时，应事先书面征求电监会意见，重要文件应会签电监会。规定输配电价格成本审核办法、区域电力市场最高、最低限价，由发展改革委员会同电监会制定，共同颁布实施。

方面，多是由电监会初审或拟定，由发改委最终确定^①；或是由发改委制定、电监会研究提出调整的意见和建议^②。因此，我国电价规制权力配置呈现横向分权的特点。这种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无论是发改委还是电监会，都无法独立地行使价格规制权，我国的价格规制机构缺乏独立性。具体管理机构及其职责见图 2。

从纵向配置来看，对于实施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的产品，可以由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价格主管机构分别制定中央定价目录和地方定价目录，^③由于电力属于中央定价目录产品，^④由中央价格主管机构（发改委）负责制定价格，省物价主管部门（省物价局）并不具有电力定价权。^⑤同样，作为电监会的派出机构区域电监局和省电监办也不具有价格决定权。因此，我国电价规制权力配置呈现纵向集中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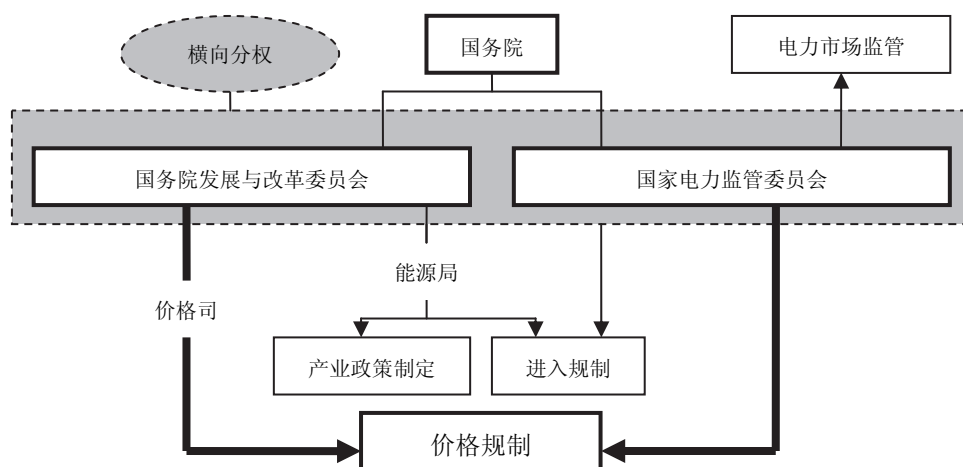


图 2 我国电力产业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① 如跨省（区）电力价格、辅助服务价格、跨区域电网输配电价、大用户用电直供的输配电价、区域电力市场发电容量电价。

② 如销售电价（省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参与提出调整建议）、未实行竞价上网电价、跨省电网输配电价。

③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章的规定。

④ 2001 年 7 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公布了《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定价目录》，将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定价的商品和服务项目由 1992 年定价目录颁布时管理的 141 种（类）减少为 13 种（类）。除电力外，其他包括重要的中央储备物资、国家专营的产品、部分化肥、部分重要药品、教材、天然气、中央直属及跨省水利工程供水、军品、重要交通运输、邮政基本业务、电信基本业务、专业服务。

⑤ 当然，目前部分地区存在违反国家规定的电价优惠政策，助长了高耗能企业盲目发展，增加了电网、发电企业的经营负担，但这并不是正式的制度安排，部分省市电价违规情况见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2010 年第 4 号《2009 年度全国电力交易与市场秩序情况监管报告》。

总之，我国电价规制机构是发改委和电监会。在独立性方面，二者均设立于传统科层式行政官僚体系之内，一方面决定了其很难避免不当的政治干预和行政影响，另一方面决定其作为国务院机构要向总理负责。在管辖模式方面，发改委是对多产业行使多职能的规制机构；电监会是对单产业行使多职能的规制机构。在规制权力配置方面，呈现横向分权和纵向集中的特点。价格规制权在发改委和电监会之间的横向分配也反映出我国价格规制机构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独立性。

（二）俄罗斯电力产业价格规制机构现状

俄罗斯的电价规制机构是联邦价格局和地区能源委员会。这里仍从电价规制机构的独立性、管辖模式以及规制权力配置三个方面，对俄罗斯电力产业价格规制机构进行分析。

第一，独立性及管辖模式。俄罗斯联邦价格局是政府总理管辖下的联邦机构，根据 2004 年第 314 号总统令，替代联邦能源委员会成立，将原来分散在联邦反垄断部和联邦能源委员会手中的自然垄断价格规制职责统一起来。电力等能源产业的政策部门是能源部，是在燃料能源部门范围内完成国家政策和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并发挥协调作用的联邦执行权力机构。联邦价格局与能源部没有行政隶属关系，联邦价格局是设立在行政体系内、产业政策部门外的规制机构。在联邦层面，联邦价格局隶属于联邦政府，由总理直接管理，在联邦政府的指导下行使职责，^①对总理负责。其内部最高机构管理委员会根据 2004 年 7 月 26 日第 995-p 号政府执行令建立。与其前身联邦能源委员会不同，管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除了联邦价格局的管理人员外，还包括相关部委的官员。现任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联邦价格局局长及副局长、联邦反垄断局副局长、联邦运输部部长、联邦经济发展部副部长、联邦地区发展部副部长、联邦通讯与大众传播部副部长、联邦经济发展部价格、基础设施改革与能源效率国家规制司司长、联邦能源部副部长。管理委员会的成员由政府任命^②。在地方层面，地区能源委员会负责人人选由地方政府提名并经联邦价格局同意^③，实际上也是对各地方政府首脑负责。

联邦价格局除了对电力产业的价格进行规制外，还对天然气、石油、住房和公共设施、运输、国防工业和基本社会产品及服务、电信业的自然垄断环节、信息服务及 IT 产业等产品进行价格规制，是一个多产业价格规制机构。联邦价格局只对价

^① Decree of the Russian Federal Government No. 49 of February 1, 2005, 来源于俄罗斯联邦价格局网站<http://www.fstrf.ru/eng/about/law>

^② “On Approving the Regulations for the Federal Tariff Service”, *Federal Tariff Service Order No. 37 of February 21, 2006*, 来源同上。

^③ 参见“On the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Electricity and Heat Tariff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来源同上。

格进行规制，规制职能的其他方面，如进入规制，由联邦反垄断局行使职责。在对联邦能源委员会进行机构改革的同时，并没有改变与其相对应的地区能源委员会的职责，各地区能源委员会仍继续行使其价格规制职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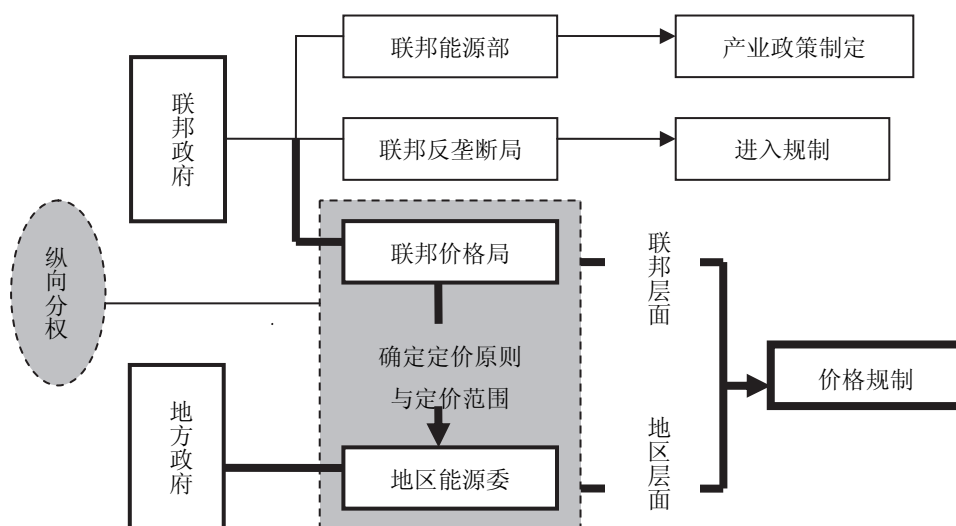


图 3 俄罗斯电力产业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第二，规制权力配置。俄罗斯电力产业管理机构及其职责见图 3。从横向配置来看，俄罗斯联邦价格局和地区能源委员会是联邦和地方层面唯一的实施电力价格规制职能的机构，不存在电价规制的横向分权。从纵向配置来看，俄罗斯实行电力价格规制的联邦中央与地方分权模式。1995 年颁布、2007 年 11 月最后一次修改的联邦法律《关于俄罗斯联邦电力和热力价格的政府规制》，按照联邦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对电力价格规制职能的划分作了详细的介绍。^①联邦价格局作为联邦中央层面的价格规制机构，在电力价格规制方面的职责集中于制定跨地区的联邦批发市场中的价格

① 俄罗斯最终的供电价格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电力批发市场中成交的发电价格，电力批发市场基础部门的手续费，输电价格（包括接入输电电网的价格以及按输送电量确定的输电价格），配电价格（包括接入配电网的价格以及配送电力的价格）以及供电企业的利润（包括自由竞争的供电企业和价格受到规制的责任供电商）。电力批发市场在过渡时期价格分为两个部分：规制部分和竞争部分。规制部分形成规制价格，主要特点是电力供求双方通过签订受规制的双边合同进行电力买卖；而竞争部分形成非规制价格，主要由日前交易市场（day-ahead market）、自由双边合同以及平衡市场（balancing market）组成。Kirill Fetisov: *The evolution of Russian power industry from monopoly to market operation* (Doctor Degree Paper), 2007, pp.75-90.

（或价格区间）以及最终的供电和供热价格区间；^①地区能源委员会则负责本地范围内相关价格的制定。^②

总之，俄罗斯电价规制机构是联邦价格局和地区能源委员会。二者分别隶属于联邦政府和地区政府，是在政府行政系统内、产业政策部门外设立的相对独立的多产业、单职能价格规制机构，分别对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负责。电价权力配置呈现横向集中和纵向分权的特点。

（三）中俄电价规制机构设置比较

首先，独立性方面，俄罗斯要优于我国。我国电价规制机构是发改委和电监会。发改委是政府行政系统内设立的、产业政策部门与规制机构合一的机构。发改委价格局在行使价格规制职能时的独立性很弱，不仅要对国务院负责，并且受发改委的行政制约；电监会是政府行政系统内、产业政策部门外设立的规制机构，虽然不受政策部门的直接行政影响，但是与发改委价格规制权责交叉，使其同样缺乏独立性。因此可以说我国价格规制机构并不能独立行使规制职责。俄罗斯电价规制机构是联邦价格局和地区能源委员会，与制定电力产业政策的能源部在行政关系上是分离的，并且法律赋予价格局独立行使规制职能的地位，因此，独立性较强。联邦价格局和地区能源委员会分别隶属于联邦政府和地区政府，是在政府行政系统内、产业政策部门外设立的相对独立的规制机构。我国发改委和电监会作为国务院机构对政府负责，俄罗斯联邦价格局和地区能源委员会分别对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负责。

其次，管辖模式方面，两国也呈现不同的特点。我国的发改委是多产业、多职能的规制机构，电监会是单产业、多职能的规制机构，二者均为多职能规制机构；俄罗斯的联邦价格局和地区能源委员会则是多产业、单职能的价格规制机构。

最后，权力配置方面，我国电价权力配置呈现横向分权和纵向集中的特点，横向上，发改委和电监会共同行使电价规制职责；纵向上，国务院发改委将电价规制职责集中起来，各地的物价机构没有电价规制权力。俄罗斯则正好相反，呈现横向集中和纵向分权的特点，横向上，联邦价格局和各地区能源委员会是各自层面对电价进行规制的唯一机构；纵向上，二者有明确的规制权力的划分，进行各自权力范

① 具体包括：第一，确定俄联邦境内电力和热力价格的形成机制，包括电力批发市场中规制价格部分价格的形成程序，并依据各联邦主体的具体情况对批发市场中的电价作出调整。第二，联邦价格局设定最终的供电和供热价格区间（包括规制和非规制两个部分的电力价格）。第三，批发市场中的上网电价（包括核电）、输电价格（或价格区间）、工程接入输电网的价格以及基础部门的服务费用（包括电力调配、统一电力系统的应急维修等维持系统稳定性的服务价格）。

② 具体包括在联邦价格局设定的配电价格区间的基础上设定接入以及经由本地配电网的电力输送服务的收费水平以及本地责任供电商的利润加成，在联邦价格局规定的价格区间内设定供电实体向消费者供电价格，非价格规制部分除外。

围内的规制。

三、影响中俄价格规制机构设置的因素分析

以上分析揭示了中俄两国电价规制机构在独立性、管辖模式和权力配置方面的差异，这里主要从国家结构形式、财税体制、初始权力分配、电力产业改革进程、以及在位企业产权状况几个方面对这种差异进行分析。

（一）国家结构形式的影响

一般来说，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倾向于中央集权规制，而联邦制国家则倾向于中央与地方分权规制。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俄罗斯是联邦制国家，两国电价规制机构的纵向权力配置形式恰好符合国家结构与规制机构纵向权力配置关系的判断。对于我国来说，虽然省级物价局对地方定价目录中的产品具有价格规制权，地方电监局也具有一定的电力市场规制职能，但是电力产业作为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价格规制权力集中于中央，地方部门只是具体执行，自主性也相对较弱。

俄罗斯的情况与中国不同，基于联邦制的俄罗斯联邦中央和地方之间行政权力的划分，对规制机构纵向分权的权力配置产生了重要影响。普京在 2001 年国情咨文中提出改革联邦关系，特别是联邦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包括通过联邦法律划分联邦与中央和地方机关之间的权限，并确保中央和地方在其共同管辖范围内具有明确的权限。事实上，在 2007 年进行最后一次修改的《关于俄联邦电力和热力价格的政府规制》的联邦法律，就是联邦中央和联邦主体机关行政权力在电力价格规制权力划分上的具体应用。

（二）财税体制的影响

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财政收入和支出是一国财税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规制权纵向配置的影响因素之一。一般来说，一国规制权的纵向配置应与财政收支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相适应。从财政收入看，我国的五大发电集团以及两大电网公司均是由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企业，其盈利归于中央财政。因此，由中央层面的发改委和电监会直接对电力产业各个环节价格进行规制，有利于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目标，有利于在现有财税体制下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①

从财政支出看，俄罗斯发电企业大多经过产权改革实现了去国有化，其收入并不与联邦政府直接相关。但是处于过渡期的电力市场，发电和售电领域受规制的部分仍然存在，价格并不都由竞争形成，基于政府保护电力价格的意愿，各级预算均

^① 此处对国资委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的合理性不作考虑与评论，而仅就中央价格规制合理性的原因进行分析。

对电力产业进行补贴。^①根据《关于俄罗斯联邦电力和热力价格的政府规制》的联邦法律，俄罗斯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对规制价格部分（包括批发市场的发电价格部分以及责任供电商售电价格部分）实施财政补贴，补贴资金由两级政府分别提供。联邦层面的补贴由联邦预算支付，而如果地区能源委员会设定的居民电价超出了联邦政府设定的价格范围，那么多出的成本由地方政府的预算承担。地方政府对电力产业的财政支出义务换来了地区能源委员会设定本地区电力价格的权力。同时，在定价权方面的财政支持，也增强了联邦主体价格规制机构定价行为的可实施性。

（三）电力规制改革前规制机构初始权力分配的影响

改革前初始状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改革结果往往是对初始状态的一种路径依赖。对于我国来说，早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形成了电价国家统一制定的价格管理体制，虽然“集资办电”实现了多种主体进入发电环节，但是电网仍是国家资产，上网电价以电力部和国家计委每年颁布的目录电价为依据，中央对电力价格的集权控制是一直存在的。

自国家发改委前身国家计划委员会于1952年11月成立以来，一直承担着政府对经济进行综合管理的职能。虽然经历了1998和2003年两次更名，但其对经济进行综合管理的职能并没有改变。2003年，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成立后，发改委仍实施电力价格规制。这是因为，如果改革开始时某个机构正规制一个产业，尽管在改革过程中采取措施加以改革，却很难将规制结构完全改变，在此基础上便形成了发改委与电监会共同规制电价的横向分权的规制模式。

对于俄罗斯来说，从苏联时期实行政府部门——电力工业部和地区电管局的二级电力监管体制，发展到联邦能源委员与地区能源委员会管理时期，价格规制一直实行纵向分权的权力配置形式，联邦层面的价格由联邦能源委员会制定，地区层面的价格由地区能源委员会在联邦能源委员会限定的价格范围内制定，联邦价格局替代联邦能源委员会的规制机构改革并没有改变中央与地方分权规制的初始权力配置形式。

（四）电力规制改革过程中实施措施的影响

改革中实施措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国对规制改革道路的设计以及改革过程中政策措施的具体实施将直接影响到规制机构的管辖模式，最终形成何种管辖模式是由每一步措施的推进累积取得的。抛开基于路径依赖和对既有权力保护而保持价格规制职能的发改委不谈，将电力产业政府规制改革过程中成立的电力监管委员会和

^① 普京时期，俄罗斯从立法上明确划分各级权力机关在资金和税收方面的责任，在预算津贴和地方拨款问题上建立透明机制。参见郑羽、蒋明君：《普京八年：俄罗斯复兴之路（政治卷）》，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第51页。

俄罗斯联邦和地区能源委员会进行比较，规制模式不同是二者的主要差别：我国电监会是单产业、多职能的规制机构，而俄罗斯的联邦价格局和地区能源委员会是多产业、单职能的规制机构。

电力产业改革措施的不同，是影响差异形成的因素。我国电力产业改革走在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前列。20世纪80年代以“多家办电”政策为标志，开始放松进入规制。1997年成立国家电力公司，实现政企分离。作为自然垄断产业规制体制改革的尝试，最先在电力产业成立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作为中国垄断性产业第一个专业规制机构，在电力产业最早实现了政监分离。^①

而俄罗斯电力产业改革步伐则相对缓慢。到2000年电力产业第一阶段改革结束后，电力部门仍属于少数几个沿用原苏联旧体制保持垂直一体化垄断的大工业部门之一。除此之外，俄罗斯电力产业进行纵向分拆后，实现了对发电环节竞争的引入，因此进入规制职能改由反垄断部行使，2002年又成立了系统调度公司（SO）和交易系统管理公司（ATS），分别负责电力系统调度以及市场规则的制定和争议的调解，联邦技术检查部门负责建立技术与安全标准并监督服务质量，^②电力的管理职责已经分散到各个部门。与此同时，俄罗斯行政机构调整，包括将原来分散在反垄断部和能源委员会手中的价格规制职责统一起来交给联邦价格局，也反映出俄罗斯将价格规制职能统一的改革方向。

（五）在位企业产权状况的影响

一方面，独立性差的政府政策部门和规制机构合一的模式一般出现在公用事业仍属于国家独占或国有股份仍占主要地位的国家。中国的发电和输配电环节分离之后，国家仍在发电领域占有绝对优势，^③输电领域的两家电网公司是国有独资公司。而俄罗斯在电力产业的规制改革过程中成立的7家电力批发集团以及14家地区电力公司，已经形成了私有制为主导的产权形式。因此，两国的产权状况的不同影响了

① 成立专门的电力规制机构并不是终点，下一步改革可能是基于产业融合而设立电力、石油、天然气综合的能源规制委员会，具体分析参见王俊豪、肖兴志、唐要家：《中国垄断性产业管制机构的设立与运行机制》，第322-324页。

② 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国外电力市场化改革年度分析报告（2008年）》，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9年，第39页、第42页。

③ 截至2009年底，全国有6000千瓦及以上各类发电厂4600家左右，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约占90%。中央直属五大发电集团（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年末总装机容量41704万千瓦，约占全国全口径装机容量的47.70%；其他6家中央直属发电集团（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华润电力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国核电集团公司、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年末总装机容量9115万千瓦，约占全国全口径装机容量的10.43%，私营和外资发电企业占全国总装机容量的4.82%。数据来源于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电力监管年度报告（2009）》，见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网站<http://www.serc.gov.cn/zwgkj/jggg/>

两国规制机构的独立性，中国规制机构采用了独立性较弱的政府政策部门和规制机构合一的模式。另一方面，中国的五大电力集团和两大电网公司的领导都具有行政级别，在官僚科层体系之中，级别高低对管理职能的行使产生重要影响。五大发电集团与两大电网公司均为副部级单位，而地方价格管理机构的行政级别为厅级，厅级单位对副部级单位进行管理不符合以级别论高低的官僚行政体制，因此，对我国电力产业的规制由发改委这个正部级机构行使。

四、小结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俄两国电力产业规制机构都实现了管理职能的根本转变。但受宏观政治、经济体制以及产业特点的影响，两国规制机构在独立性、管辖模式以及规制权配置方面呈现出不同特征。

我国电力产业价格规制权集中于中央层面的国务院发改委和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二者均设立于政府行政系统内部，独立性较弱，这与我国公用事业仍属于国家独占或国有股份仍占主要地位的产权性质高度相关。电力是我国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较早进行的领域。作为一种尝试，第一个专业规制机构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应运而生。但由于发改委的前身国家计委一直拥有价格管理权，在路径依赖效应之下，形成了价格规制横向分权的局面。与横向分权所不同的是，规制权的纵向集权安排是我国电力价格规制的又一显著特征，这是受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以及电力企业国家出资、盈利收归中央财政的财税体制的影响。

对于俄罗斯来说，随着改革推进，电力价格规制职能逐步与产业政策制定职能分离，成立了独立性较强的专门的价格规制机构联邦价格局。规制机构与政策机构分离，符合俄罗斯私有为主导的产权基础。联邦价格局是联邦层面唯一行使价格规制职能的机构，因此，规制权呈横向集中的特点。由于对改革之初中央与地方的二元管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加上受俄罗斯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以及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对电力产业补贴的影响，在规制权纵向配置方面，形成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制度安排。

【Abstract】 Institutional system reform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regulatory reform of industries of natural monopoly. In this paper the energy industry is taken as an example, using the appropriate theory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as well as system analysis, it describes the features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price control systems in China and Russia, as well as models of administr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ower, an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features of formation of institutional system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also provided.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acro-system of the two states, as well as features of the energy sector itself, include an initial distribution of power of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during the reform process, and the system of ownership in enterprises formed after the end of the reform, etc., these are all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Key Words】 energy sector, the regulatory organizati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 Аннотация 】 Реформа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одно из важных содержаний реформы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отраслей естественной монополии. В данной работе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имера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отрасль, используя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ую теорию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а также способ систем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даётся описан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ценовой систе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в Китае и России, а также моделей администрирования и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я власти, проводится анализ определяющих факторов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двух стран.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макросистемы дву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а такж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амой сферы энергетики, включают в себя начальное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власт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до начала реформы, меры по реализации в процессе реформ, а также образованную после реформы систему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на предприятиях и др., это всё важные факторы, оказывающие влияние на организацию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сфера энергетики, регулирующие органы, факторы, сравнение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责任编辑 韩冬涛)

卢布国际化战略评析 ——兼论中俄贸易本币结算*

李中海**

【内容提要】货币国际化是一种货币在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中行使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贮藏手段等职能的过程。货币国际化对货币发行国的利益是多方面的。卢布国际化是近年来俄罗斯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为实现卢布国际化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目前，卢布在独联体国家贸易中的使用量较大。而中俄贸易的本币结算则走过了从试行到推广的进程。由于俄罗斯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发展存在许多制约因素，卢布尚难以在国际贸易中成为强势货币，也难以成为储备货币，卢布国际化前景存在着不确定性。

【关键词】卢布国际化 中俄贸易 本币结算

【中图分类号】F823.1(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4-0092-(13)

卢布国际化是近年来俄罗斯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5月普京在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要实现卢布完全可兑换以后，俄罗斯拉开了以卢布国际化为目标的新一轮金融外交的序幕。2006年7月，俄罗斯完成了对《外汇调节与管制法》的修改，放松了对卢布在资本项目下的管制，使卢布实现了完全可兑换。此后，俄罗斯政府在外交活动中大力推动其贸易伙伴在双边贸易中以本币进行结算，用卢布进行能源贸易结算，以及力图使卢布成为地区储备货币。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俄罗斯经济虽然经受了严峻考验，但俄政府还是借助G-20峰会和“金砖国家”峰会等外交平台，呼吁建立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增加用于国际结算的币种。2009年6月，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更加明确地提出，俄罗斯的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俄罗斯的经济外交与新时期的中俄合作”（项目批准号：2009JJD810006）的阶段性成果。

** 李中海，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任务是“要使卢布成为更有吸引力、更方便、更可靠的结算手段”。这表明俄罗斯的卢布国际化战略没有丝毫放松。本文拟从货币国际化理论出发，对俄罗斯实现卢布国际化的措施、卢布在独联体国家中的地位、中俄贸易本币结算、以及卢布国际化的前景等问题进行分析。

一、卢布国际化的理论背景

货币国际化是一种货币突破国别界限，在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中行使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贮藏手段等职能。在这种状态下的货币被称为国际货币。当前世界通行的国际货币美元、欧元和日元，都走过了不同的国际化道路。美元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大货币，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中普遍使用，是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货币计量单位。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依赖的是一个全球性的货币汇率制度安排，也就是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支持这一体系的基础是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欧元作为信用货币的国际化进程是最短的。其基本做法是以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为基础，以相近的文化为纽带，在欧盟框架内让渡货币主权，建立共同体的单一货币。日元国际化走过的是一条金融深化与发展的道路，通过外汇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经常账户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利率与金融市场自由化，使日元成为国际经济活动中普遍使用的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多元储备货币时代，但美元仍是无可争议的世界货币。

货币国际化对货币发行国带来的利益是多方面的。从经济角度看，不仅可带来国际铸币税收益，也可带来从境外储备资产的生产成本到金融运作的净收益，还可为国际货币发行国及其居民带来许多难以计量却真实存在的“实惠”；从政治角度看，由于货币背后隐藏着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乃至文化意识形态的某种自动与自愿的服从，拥有国际货币发行权，将可以启动货币政策的制定权来影响甚至控制储备国的金融和经济，并提升发行国自身抵御金融冲击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国际货币发行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拥有较大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意味着制定或修改国际事务处理规则方面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①

俄罗斯提出卢布国际化战略出于多方面考虑。从经济角度看，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俄罗斯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卢布币值也渐趋平稳。2003 年以后，石油美元大量流入，进一步巩固了卢布的强势地位。在俄政府宣布卢布完全可兑换前的 12 个月内，卢布对美元升值近 10%。基于对国际油价将长期处于高位的乐观预期，俄

^① 陈雨露等：“作为国家竞争战略的货币国际化：美元的经验证据——兼论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经济研究》，2005 年第 2 期，第 35-41 页。

罗斯政府认为其完全有能力维持卢布币值的稳定。从政治角度看，俄罗斯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无法适应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主要力量中心的布局。这一体系不具备防范和应对阶段性金融危机的能力，无法保障世界货币体系和汇率的稳定，对各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发达国家股市和汇市的波动，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造成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失去稳定性。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在货币领域实现从美国中心主义到多中心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符合俄罗斯的利益。这是因为俄罗斯一直主张建立一个没有超级大国的多极世界。如果在可预见的将来货币体系实现多中心格局，则表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新的根本变化。^①

二、卢布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步骤及措施

近年来俄罗斯为实现卢布国际化及提高卢布的国际地位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

第一，实现卢布在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是俄实施卢布国际化战略的第一步。货币完全可兑换是货币国际化的基础条件之一。俄罗斯早在 1996 年 6 月就已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 8 条的规定，实现了卢布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但由于种种原因，俄罗斯一直没有放开对资本项目的管制。2000 年以后，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俄罗斯领导人开始将卢布完全可兑换提上议事日程。2003 年 5 月，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卢布完全可兑换的时间表，要求俄政府在 2007 年前完成这一任务。2006 年 5 月，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再次要求加快实现卢布完全可兑换。同年 6 月 13 日，俄中央银行宣布，从当年 7 月 1 日起，俄罗斯将完全取消 1998 年金融危机后所实施的针对卢布自由兑换的所有限制，对俄公民放开兑换卢布的数量限制，提高允许带出境外的卢布的数量，允许俄公民在国外银行开设账户。6 月 29 日，俄政府颁布了《外汇调节和外汇监督法》修正案草案。该法案取消了对资本流动的所有限制，其中包括有关俄出口商必须向指定银行出售外汇、以及对自然人向国外账户汇款超过 15 万美元实施限制的规定等。卢布完全可兑换为其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第二，推动贸易伙伴在相互贸易中用本币进行结算。一般认为，两国之间的贸易用本币进行结算需要满足一些条件，首先是两国贸易额较大，且进出口规模相当；其次是两国的货币应为可兑换货币；再次要解决一些技术性问题，比如在对方国家

^①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А. Будущее рубля ка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валюты// Мировая валютная система и проблема конвертируемости рубля. Институт Европы РАН, 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6 г. С.160.

开立银行账户，规避汇率风险等。目前俄罗斯只在与少数邻国的贸易中用本币进行结算，其中与白俄罗斯 80% 的贸易和与哈萨克斯坦 30—40% 的贸易是用本币结算的。为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本币结算的范围，俄罗斯与中国、委内瑞拉和土耳其等国进行了谈判，其目的在于首先与有一定经济基础和合作历史的贸易伙伴之间达成共识，寻求突破。2009 年 9 月，俄罗斯与越南中央银行就对外贸易本币结算问题达成了协议，但由于种种原因，两国在相互贸易中仍在用美元进行结算。2010 年 1 月，在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访问俄罗斯期间，俄土两国就本币结算问题达成了原则共识。但是俄罗斯对伊朗提出的相互贸易本币结算问题没有作出回应。俄罗斯认为，俄对伊的出口额远高于进口额，如两国实行本币结算，俄罗斯将持有大量伊朗货币难以消化。针对这种情况，伊朗提出俄伊两国可考虑部分贸易尤其是能源项目合作可试行本币结算，但目前这一问题仍未取得进展。

推动独联体成员国之间及中俄之间的贸易用本币进行结算，是卢布国际化战略的重点。2009 年 4 月 1 日，独联体财政部长、经济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后，俄罗斯财政部长库德林宣布，独联体成员国正在研拟扩大双边贸易本币结算的办法。同年 11 月 23 日，独联体国家政府首脑理事会会议在雅尔塔召开，会议详细讨论了成员国之间的本币结算问题。各国政府都表示支持贸易结算币种多样化，在相互贸易中不仅使用美元结算，还可用本币、卢布或其他货币进行结算。

第三，要求能源进口国在能源贸易中用卢布进行结算。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卢布国际化，也关系到俄罗斯的能源外交问题。首先，俄罗斯作为能源出口国，一直希望在石油定价机制中拥有一定的发言权。为此，普京提出了俄罗斯建立石油交易所、天然气和其他产品的交易所，并用卢布进行定价和结算。2006 年 6 月 8 日，“俄罗斯交易系统”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始石油远期合同交易。俄罗斯还在圣彼得堡建立了专门的石油交易所，并希望将其建设成为继纽约、伦敦、新加坡和东京之后的全球第五大石油交易所。其次，俄罗斯向其合作伙伴提出油气贸易以卢布定价和支付款项的要求。目前俄与越南、白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正在就用卢布支付油气款项进行谈判，并向摩尔多瓦、蒙古和乌克兰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但只有越南原则同意了俄方的提议。此外，俄罗斯政府还要求主要油气公司在其油气贸易中用卢布定价和交易。2008 年底，梅德韦杰夫在其就任总统后的首次国情咨文中要求俄罗斯企业加快在油气贸易中用卢布结算的进程，并在其他行业的对外经济活动中使用卢布。天然气工业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等大公司，已多次要求其合作伙伴用卢布支付贸易款项，但至今应者寥寥。

第四，推动独联体框架内的货币合作。为提高卢布和独联体其他国家货币的国际地位，在俄罗斯的推动下，独联体成员国于 2004 年 9 月 15 日颁布了《独联体货

币领域合作与协调行动的构想》。该文件放弃了建设统一卢布区的设想，提出成员国各自建设本国的货币体系、支付体系和外汇市场，进而为实现金融和货币一体化创造条件。《构想》确定独联体国家货币合作的主要目标是：实现货币的完全可兑换；货币进入外汇市场交易；协调汇率政策，保持本币币值稳定；建立可靠、有效的货币转移制度，包括储蓄存款业务的转移；向经济主体和金融机构在金融服务领域提供国民待遇，共同制定限制金融市场准入的清单。《构想》提出，为实现上述目标，应采取的措施有：实现国内外汇市场的自由化，提高外汇市场的流动性水平，根据国际通用的规则制定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调节规则，并使之趋同；完善支付结算机制，在支付结算中扩大本币的使用范围和使用量；汇率政策趋同，远景是建立消除汇率波动的协作机制；选择最优化的汇率制度，并协调行动，确定汇率波动的区间；建立协调货币政策的跨国结构，或对现有机构进行完善；对国际收支失衡的国家，建立联合的货币支持机制，稳定国际收支失衡国家的汇率和宏观经济平衡。

《构想》提出将分阶段完成上述目标，第一阶段（2004—2006年），实现经常项目下货币可兑换；独联体国家的结算除使用硬通货外，可使用本币。第二阶段（2006—2010年），各国货币法相互协调并趋于一致，保障资本自由流通。第三阶段（2010—2017年），各国进入经济稳定增长阶段；经济改革完成；支付结算采用现代标准；完成关税同盟建设，建立统一的内部市场，实现经济法律法规的高水平协调。最终目标是制定干预汇率的共同方针，针对货币金融政策作出集体决策，就共同货币达成一致，并使之成为国际支付手段和国际储备货币。

第五，打造俄罗斯的国际金融中心。卢布国际化战略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是密不可分的。俄罗斯专家指出，建设俄罗斯的国际金融中心，首先是一个民族自豪感问题，也是加强俄罗斯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问题；其次，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可起到创造就业机会的作用，比如，纽约的证券行业占城市工资的23%，就业人数占全市就业人数的5%；此外，发达的金融市场将提高投资，保障生产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①更为重要的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对卢布的国际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在俄罗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情况下，卢布的国际化进程才能取得积极进展。

根据俄经济发展部制定的《俄罗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构想》，俄罗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将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2008—2010年，重点在于发展国内证券市场，实现本国证券市场与地区证券市场的一体化，使俄罗斯金融市场成为提供跨国

^① Виктория Никитина. Рубль буде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валютой, если Россия станет мировым финансовым центром// 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07.05.08), http://www.ffms.ru/catalog.asp?ob_no=101190

金融服务的局部的国际金融中心，成为独联体地区范围内的金融中心。第二阶段，在全球范围内提高竞争力水平，使俄罗斯金融市场成为地区性金融中心，成为在欧亚地区起主导作用国际金融中心。《构想》提出，为实现这一目标，除构建良好的国内金融制度、培育发达的银行体系和证券市场、改革税制等国内措施外，还要实现与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体化。为此，俄计划为外资提供简单便利的准入制度。主要工作有四项：一是简化外国资本进入俄罗斯的制度；二是降低交易成本；三是简化外国资本的交易制度；四是完善外汇法规，取消那些影响俄罗斯机构投资者在境外投资的限制，降低风险。

三、卢布在独联体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卢布在独联体地位的演变

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曾提出建立统一卢布区的设想。但随着独联体成员国先后推出本国货币，统一卢布区的设想被束之高阁，独联体成员国开始用本国货币与卢布进行结算。在独立初期，独联体成员国经济状况普遍恶化，本币币值极不稳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大多以实物或“硬通货”进行结算，国内经济中也出现了严重的美元化现象。1998年金融危机后，成员国之间停止了以实物结算对外贸易的做法，开始转向用“硬通货”进行结算。美元在独联体国家对外贸易中承担了价值尺度、支付工具和贮藏手段的职能。除美元外，卢布在独联体国家对外贸易结算和外汇构成中也占较大比重。而独联体其他国家的货币则难以成为对外贸易的支付工具，更无法承担价值尺度和贮藏手段的职能。根据独联体统计委员会发布的数据，独联体成员国之间总出口的20%和总进口的38%为区域内贸易，2004年前11个月相互贸易规模达到950亿美元^①，实际上具备了进行本币结算的条件。但制约本币结算的因素仍大量存在。首先，虽然独联体国家间贸易依存度较高，但各成员国在信贷领域和证券领域的合作微乎其微，各国金融联系松散，金融基础设施和制度不完善，外汇市场发展滞后，各国政府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水平高。其次，一些成员国银行系统的流动性过低，无法承担起兑换货币的职能。相比之下，俄罗斯卢布是最有可能成为地区货币的币种。

卢布在独联体对外贸易中扮演着仅次于美元的重要角色。首先，俄罗斯经济总量大，占独联体地区的70%以上，在独联体地区没有哪个国家可与之相匹敌，这是卢布可能成为独联体主要货币的决定因素。卢布是独联体地区为数不多的可在交易

^① Статкомитет СНГ// Экспресс-доклад. 2005. Янв. С.33.

所作为外币进行买卖的币种，各国中央银行均发布美元、卢布与本币的汇率牌价，而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货币的汇率则是套算出来的。其次，俄罗斯为提高卢布地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在国内市场禁止以美元、欧元或所谓“约定单位”对商品标价，并以立法形式明确卢布为俄境外唯一的价值尺度，这为降低“美元化”水平、提高卢布地位创造了良好条件。二是部分出口商品开始用卢布标价。2005年1月，俄政府决定按国内卢布价格向独联体其他成员国出口军火，这一措施进一步强化了卢布在独联体地区的地位。

（二）独联体国家间的本币结算

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俄罗斯外汇管理制度自由化以后，独联体国家对在与俄罗斯的双边贸易中使用卢布的兴趣明显增强。独联体国家从事外贸业务的企业和个人大多开始倾向于接受卢布，并在银行账户中存入卢布。这是因为卢布兑换美元不存在困难，并且卢布的存款利率较高。独联体国家的商业银行出于种种考虑，也乐于向其客户提供卢布贷款，或进行卢布资产操作，或将卢布投入具有较高流动性的银行间信贷市场和公司债券市场。

表1 2009年俄罗斯与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支付关系中所使用的币种（%）

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	俄罗斯卢布	美元	欧元
白俄罗斯	51.9	33.6	14.0
哈萨克斯坦	48.5	48.1	2.1
吉尔吉斯斯坦	25.2	62.9	11.9
塔吉克斯坦	45.8	51.3	2.6

资料来源：俄罗斯中央银行。

目前，俄罗斯与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用卢布进行贸易结算较为积极。在这些国家之间的支付业务中，卢布正在挤出美元。2009年使用卢布的结算量达到相当于178亿美元的规模，约占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支付总额的48%左右。由表1可以看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约50%都是用卢布结算的。但不可否认，美元仍是除卢布以外最主要的结算币种。此外，欧亚经济共同体除俄罗斯以外的成员国间的结算，卢布不是最主要的币种。比如，在哈萨克斯坦与白俄罗斯的结算中，卢布所占比重约为25%，美元占58%；在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的结算中，卢布占3%，美元占88%；在哈萨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的结算中，卢布仅占0.5%，美元占99%。这表明，在一定程度上，卢布可以成为俄罗斯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结算币种，但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参与，独联体其他国家还是倾向于使用美元进行结算。

此外，独联体国家在对外贸易结算中使用本币的比例很低。比如，哈萨克斯坦坚戈、白俄罗斯卢布、乌克兰格里夫纳在与俄罗斯的外贸结算中虽扮演一定角色，

但在对俄贸易结算中所占比例极低，不足 2%。哈萨克斯坦在与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进行外贸结算时，使用坚戈的比重仅占 1%，相当于 1.8 亿美元，白俄罗斯在与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外贸结算中，其货币仅占 0.5%，约为 1.77 亿美元。

（三）卢布在独联体作为结算货币面临的问题

如上所述，卢布在独联体国家中的地位受到许多限制。首先，政治因素影响卢布在独联体国家中的使用。货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独联体国家在获得独立后，将本国货币视为主权独立的象征，对使用卢布持排斥态度。其次，任何一种货币都需要有足够的商品作保证，卢布能否被广泛接受，取决于其购买能力。再者，俄罗斯向独联体国家出口的商品中，能源占相当大的比重^①，这些产品在传统上是用美元标价和结算的，卢布在能源贸易中既不是价值尺度，也不是支付手段，这种状况不利于卢布成为地区货币。结算币种与合同标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独联体国家的企业在对外贸易活动中，为锁定合同价格，仍倾向于用美元或欧元标定价格。这表明，对外贸易主体对卢布汇率的稳定性仍不够信任。此外，独联体各国除与俄罗斯开展经贸活动外，也与许多非独联体国家进行广泛的经贸活动，需要大量的可自由兑换货币。

四、中俄贸易本币结算：从试行到推广

中俄两国在相互贸易中以本币进行结算是中俄贸易中的突出问题，也是两国金融合作的重点之一。自 2003 年中俄开始在边境贸易中试行本币结算以来，两国间的本币结算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 2003 年 1 月 1 日，这是中俄贸易本币结算的试行阶段。在 2002 年 8 月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期间，两国中央银行签署了《关于边境地区贸易的银行结算协定》。该协定规定：（1）双方商定，作为试点，自 2003 年第一季度起，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的中国的银行和在俄罗斯阿穆尔州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注册的俄罗斯的银行及俄罗斯的银行在该市注册的分行之间的边境贸易结算和支付，除使用自由兑换货币之外，也可使用人民币和卢布。（2）为办理两国本币结算业务，两国指定银行可依据合同，彼此在对方开立相应的代理账户。（3）双方委托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和俄罗斯中央银行阿穆尔州总分行，会同协定所指定的银行，依照两国现行法律，协商确定第二条所涉及的账户的管理办法，包括核定账户的透支额度、为

^① 能源在俄罗斯向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占 24%—60%。

法人和自然人办理日常支付的程序、两国本币买卖业务的操作程序、以两国本币相互提供贷款的业务操作程序、以及执行本协定所必须解决的有关账户管理办法的其他问题。(4)为使双方能够实施对本协定执行过程的监督,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和俄罗斯中央银行阿穆尔州总分行应至少每季度一次向各自的总行通报本协定规定的试点的实施情况。(5)双方商定,为使本协定第一条规定的边境地区的居民之间的贸易和往来较为方便,位于上述地区的中国的银行和俄罗斯的银行在对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俄罗斯联邦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可以在各自地区办理人民币和卢布的现钞兑换业务。2002年12月,两国又签订了《关于实施2002年8月22日签署的〈关于边境地区贸易的银行结算协定〉的纪要》。上述两份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中俄边境贸易本币结算进行了试行阶段。

这一时期,两国一些大中型商业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并设立了代表处,有的商业银行之间签署了出口买方信贷协议,为双方贸易的扩大提供了融资便利。到2003年4月底,中国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均与俄方商业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其中中国工商银行有27家,中国农业银行38家,中国银行36家,中国建设银行25家。在出口信贷方面,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先后分别与俄罗斯外贸银行签订了总额为6亿美元的出口买方信贷协议。中国光大银行黑龙江分行和俄罗斯外贸银行哈巴罗夫斯克分行签约建立了账户行和代理行关系,中国建设银行满洲里市分行与俄联邦储蓄银行赤塔分行在互开账户并办理国际结算业务方面达成了协议。此外,从2004年9月24日起,中俄本币信用卡结算也开始在两国边境地区推广。

第二阶段始于2005年1月1日,本币结算扩展到中俄两国毗邻的所有地区。根据2002年《关于边境地区贸易的银行结算协定》的规定,在协定执行18个月之后,双方将共同研究协定执行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就是否有必要延长本协定的有效期,以及是否有必要将本协定适用范围扩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其他边境地区,作出协调一致的决定。两国中央银行根据这一规定,决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将本币结算范围扩展到中俄边境的所有地区,即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和黑河扩展到俄罗斯边境地区(阿尔泰共和国、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阿穆尔州、赤塔州、犹太自治州)的俄罗斯银行(分行)和位于中国边境地区(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吉林省)中国方面的银行。

在这一时期,中俄两国边境贸易本币结算以及中俄金融合作获得了新的发展。2006年9月,中俄双方批准了《信息交换指标的统一清单》。从2006年11月起,俄罗斯中央银行滨海边疆区总局与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和长春中心支行开始交换信息。从2008年1月1日起,将本币结算范围从贸易领域扩大到旅游领域,规

定两国旅游行业也可进行本币结算。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全面好转以及中俄两国贸易额的快速增长，俄罗斯方面在 2008 年提出了两国贸易完全转为本币结算的倡议。

第三阶段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两国探索全面实行贸易本币结算的新时期。2008 年 12 月，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下的银行分委会针对双方贸易中的本币结算问题进行了全面磋商，双方讨论了 2002 年 8 月 22 日签署的《关于边境地区贸易的银行结算协定》的落实情况。俄罗斯方面多次提出就两国全面实行贸易本币结算签订有关协议，中方则希望首先解决人民币与卢布汇率的关联问题。中方认为，如果不能解决两国货币的汇率形成机制问题，空泛地提出本币结算是没有意义的。2009 年中俄最高级会晤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再次提出了两国在要在双边贸易中更多地使用本币结算的目标。

截至 2009 年 4 月，黑龙江省有 12 家商业银行与俄罗斯 19 家商业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2008 年，通过账户行办理本币结算业务折合 7.9 亿美元，较 2003 年增长了 54 倍。本币结算量在黑龙江省对俄贸易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从 2003 年的 0.5% 上升到 2008 年的 7.1%。这一时期中俄金融合作的新进展是，2010 年 4 月 27 日中国银行宣布，自即日起在中国境内推出卢布对人民币直接汇率项下的卢布现汇业务。当天，随着首笔 140 万卢布汇款结汇业务的成功办理，中行黑龙江省分行成为中国境内首家成功推出卢布对人民币直接汇率项下的卢布现汇业务的省级银行。2010 年底，人民币和卢布在对方国家挂牌交易，中俄贸易本币结算进入了新阶段。

2003 年以来，中俄贸易进行本币结算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两城市试点到边境地区全面推广的发展进程，两国贸易的本币结算额有了很大提高。但同时应该看到，两国贸易的本币结算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当前中俄贸易的本币结算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本币结算。最突出的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是人民币与卢布的汇率问题。2010 年以前，中俄之间没有人民币与卢布的汇率。^①2010 年底，中俄货币虽可在对方国家挂牌交易，但汇率仍然是套算出来的。第二是银行间的清算方式问题。由于人民币和卢布之间尚未形成直接的市场汇率，在中俄两国银行的清算系统中无法对日间业务进行直接清算，仍需通过第三国货币美元进行套算；每日营业终了，要通过人民币、卢布和美元的汇率清算头寸，即将头寸调回账户余额并清零，所以现行的本币结算过程中没有人民币和卢布的流动，第三方货币实际上还是清算的中介，目前实行的本币结算，只是将企业的购汇行为变成了银行的购汇行为。

其次，卢布在双边贸易本币结算中占绝对优势。随着中俄两国边境贸易额的不

^① Рудько-Силиванов В. В. Межбанков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обмен опытом// Деньги и кредит. 2008, № 10.

断扩大和本币结算量的不断增加，卢布与人民币结算量不均衡的问题日益突出，即所谓中俄贸易本币结算中的“卢布化”问题。2003年至2008年，黑龙江省通过银行办理边境地区本币结算业务累计折合194623万美元。其中：卢布结算折合193851万美元，占本币结算量的99.6%；人民币结算折合772万美元，仅占本币结算量的0.4%。^①

再次，本币结算并未明显降低贸易成本。由于当前的本币结算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本币结算，即人民币或卢布尚不能单独完成一笔贸易的完整结算过程，这使得边境贸易的结算成本与普通的国际汇兑相比未见明显减少。目前的边贸结算成本包括0.1%的手续费、2.48%的汇兑差额以及100元的电报费，双重兑换造成的损失显而易见。^②此外，本币结算还存在业务范围窄、缺乏风险防范机制以及配套政策不完善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五、对卢布国际化及中俄贸易本币结算前景的评价

货币国际化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进程。卢布要实现国际化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要有健全的金融市场，国内对本国金融体系和货币可靠性具有较高的信任度；二是要有强大的银行系统；三是要有多样化的商品出口结构，高科技产品在出口结构中占较大比重，降低对能源原材料出口的依赖性；四是要增加稳定基金规模，并使其成为控制货币发行量的工具；五是要使卢布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借款国提供贷款的储备货币；六是要加入世贸组织，融入全球最大的贸易体系中去。虽然进入21世纪以后俄罗斯经济已明显好转，但在货币领域仍存在许多问题，从目前来看，卢布国际化仍存在许多困难，最突出的问题是卢布币值的稳定性和对卢布的信任问题。从币值角度看，俄罗斯通货膨胀状况虽有一些改善，但汇率不起大落的现象仍然存在，卢布币值的稳定仍令人担忧。从对卢布的信任程度看，俄罗斯仍存在资本外逃现象，表明俄国内对卢布的信任程度有待提高；从国际范围看，2005年俄罗斯偿还国际货币基金债务后，俄罗斯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使用俄罗斯在基金组织所占的2.79%份额，将其转换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后用于对外贷款。用卢布发放贷款存在很大难度，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找不到愿意将储备货币变成

① 张远军：“黑龙江省6年边贸本币结算试点报告”，<http://forex.jrj.com.cn/2010/01/1310336798193.shtml>

② 周逢民：“中俄本币结算模式亟待改善”，《中国金融》，2006年第10期，第21页。

卢布的国家。借款国需要的是储备货币，用以弥补国际收支赤字、支持宏观经济稳定和结构改革。

因此，卢布暂时不可能成为对外借贷的币种，也不可能成为国际结算的工具。在可预见的将来，卢布不会成为国际货币，这也是俄罗斯经济状况所决定的。俄罗斯在全球GDP、进出口和直接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很低，尚不具备推动卢布成为世界货币的条件。根据不同专家的估计，按购买力平价折算，俄罗斯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重不超过 2%，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低于 2%，对外直接投资不超过 0.5%。^①要实现卢布完全可兑换并使之成为国际货币的目标，必须首先进行经济结构改革，实现经济多样化发展，提高经济竞争力，发展金融市场，提高卢布信誉。同时，由于俄罗斯经济在独联体地区所占比重较大，独联体各国对俄罗斯有很高的依赖度，因此不排除卢布成为独联体国家储备货币的可能性。

至于中俄贸易本币结算，这既是一个经济和金融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和外交问题。对中俄贸易本币结算应进行多视角考察。首先，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视角看，中俄两国通过本币结算加强金融合作，有利于两国提高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动性和话语权。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俄两国就改革国际货币体系问题进行了密切的磋商和合作，两国在 G20 峰会和金砖国家财长会议上对改革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发出了一致的声音。从这一角度来看，中俄两国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本币结算应成为两国深化金融合作的突破口。其次，从货币国际化的视角看，中俄贸易本币结算均是两国货币国际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做法的推广可以为两国货币的国际化提供参考经验。再次，从促进中俄经济合作的视角看，双边贸易实行本币结算对促进中俄经济合作的作用实际上非常有限。对外贸易在中俄两国经济发展全局中均占据重要地位，中俄进一步扩大相互贸易额不仅是两国巩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需要，也是各自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但从国际贸易史以及当前国际贸易发展状况来看，国家间贸易关系的发展首先取决于两国可贸易品的互补性、贸易制度以及关税水平等基础因素，结算方式在国家间贸易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在国家间经贸关系与金融关系中，金融合作始终处于次要和从属的地位。为促进中俄经济合作的发展和深化，两国政府部门首先应进行有利于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磋商和谈判，并可就签订自由贸易协议（FTA）和经济一体化等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currency is a process in which the

① Ю.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Будущее рубля ка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валюты. С.157.

currency serves as a mediator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apital flows, measuring of the cost and savings and so on.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many ways defines the monetary interests of the country.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uble in recent year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of Russia. Russia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uble has adopted many positive measures. Currently, the ruble has a significant place in the trade in the CIS countries. Currency settlement of Sino-Russian trade has gone from probing to distribution. Due to the economic structural imbalance in Russia, there are many obstacles to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uble is still difficult to become a strong currenc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s well as hard to become a reserve currency, the prospe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uble remain uncertain.

【Key Wo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uble, the Chinese-Russian trade, currency calculation

【Аннотация】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валюты — это процесс, в котором эта валюта начинает выполнять функции посредника, меры стоимости и средства сбережений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е и потоках капитала. И тем самым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валюты может приносить эмитирующе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е выгоды.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рубля становится важной частью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России. Для реализации эт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власть России приняла много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х мер.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рубль занимает 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место во взаимной торговле между странами СНГ. Тем не менее расчёт в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валютах в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й торговле прошёл от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льного этапа до этапа расширения. С учетом сложившихс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в том числе структурных дисбалансов, и существует множество препятствий на пут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России, говорить о том, что рубль станет сильной валютой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е и резервной валютой, пока преждевременно.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и рубля остаются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ым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рубля,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ая торговля, расчёт в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валютах

(责任编辑 黄翔)

冷战国际史

关于1960年代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的若干问题 ——来自中国档案文献的新证据

李丹慧*

【内容提要】1960年代中苏关系走向分裂时期，中国与苏联东欧集团中的保、捷、东德、匈、波五国的关系，受到中苏关系演变的约束，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变化而起伏波动。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一度实现缓和后，中国与东欧五国的关系也随之呈现冷热交替，以争取缓和为主的特点。1962年末63年初，中苏围绕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开始酝酿新的斗争。中共将对苏方针调整为以斗争、进攻为基调，准备与苏共进行论战；苏共则部署东欧五国在东欧四国党代会上对中共展开批判。中共与苏东集团意识形态公开论战开始。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启动，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为局部战争，中苏关系进入敌对状态，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也严重恶化。1960年代中国对东欧五国方针的变化，总体上与中国的对苏方针同步发展，但也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根据时期的演进呈现出不同的变化。中国以分化苏东集团为主要目的而采取的“区别对待”方针突出反映在中波关系上。就总体而言，1960年代中共对东欧五国的方针既不断变化，又相互矛盾，其结果非但没有达到分化苏东集团的目的，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苏东集团的凝聚力。

【关键词】中苏分裂 中国对东欧五国方针 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9.51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4-0105-(25)

196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东欧五国，即波兰、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作为经互会和华沙条约成员国，在政

* 李丹慧，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

治、经济和军事上对苏联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性，其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自主性相对薄弱，在内政和外交政策上与苏共基本保持一致。因此，五国的对华政策突出地表现出配合苏联对华政策的特点。其间，五国的对华态度虽然时有差异，但其对苏共理论纲领的认同基本上是一致的；中国则与苏联大唱对台戏，态度也比较僵硬而缺少变通。相应地，中国同东欧五国关系的演变实际上受到中苏关系演变的约束，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起伏而波动。其大致走势是：1960—1964年，中苏两党从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到展开大论战，两党关系破裂，中国与东欧五国的关系随之出现裂痕并呈现恶化的趋势；1965—1969年，国际共运正式分裂，中国另起炉灶，缔造世界革命的中心，中苏关系恶化乃至爆发边界武装冲突，两国同盟关系名存实亡，中国与东欧五国的关系也严重恶化。

应该说，东欧五国与中国并无直接的利害冲突，就经贸关系而言，苏联固然是五国的主要依靠对象，但他们对于对华贸易也有不同程度的依赖。例如波兰，对外贸易在其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全国40%的职工依靠外贸生活，所谓“对外贸易对于波兰‘就像人离不开空气’”，“没有贸易，波就不能生存”。中国则可以成为波兰工业产品的最大主顾，反华必然给波兰带来不利的经济后果。^①而保加利亚在东欧五国中经济力量最为薄弱，其对外贸的依赖也颇为显著。19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两三年中，中保贸易降低了五分之四，给保的国民经济“造成损失”是不言而喻的。至于东德和捷克，也都“不满意把自己的贸易局限在经互会范围之内”。^②因此，与中国团结、友好、合作最符合东欧五国的利益。1950年代，中苏友好合作时期，东欧五国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但是，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发生与难以调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潜在的体制性弊病，即强调意识形态的同一性、以党际关系取代国家关系的负面影响开始显露出来。1960年末，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大会通过共同文件《莫斯科声明》，特别重申“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突出社会主义阵营利益与各国民族利益的统一性，以及阵营利益高于民族利益、党际关系重于国家关系的内涵，为重塑苏共是国际共运的领导者、莫斯科是国际共运的中心的形象铺平了道路。由于东欧五国党的思想观点与苏共基本一致，以及经互会分工、专业化机制造成五国在经济上依赖苏联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五国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国际路线斗争中，成为苏共依靠的核

① 参见驻波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1年10月17日；王炳南大使向部党委汇报纪要，1962年5月31日；我参加波兹南博览会政府代表团访波情况的报告，1965年7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以下简称外交部档案），109-02311-01；109-02392-01；109-02907-01。

② 参见驻保使馆致外交部电，1963年8月4日；驻波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4年4月14日，外交部档案，109-02625-02；109-02747-01。

心力量。其间虽有苏联对东欧五国所谓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的存在，但在整个 1960 年代，苏联对五国的制约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中苏关系也自然成为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的主导性因素。当 1960 年夏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后，东欧五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开始紧密配合苏共代表团，对中共代表团展开围攻。此后至 1960 年代末，在以中苏关系为核心的国际共运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中苏关系的每一步变化几乎都直接影响着中国与东欧五国的关系，使之呈现出时冷时暖、松紧交替的态势。

本文以中国解密档案文献资料为基础，着重考察 1960 年代中苏关系因素对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的影响，以及中国处理同五国关系方针的变化情况，为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的发展勾勒出一条逻辑线索。

中苏关系短暂缓和带来中国与东欧关系一度回暖

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为了迫使中共屈服于苏共的理论纲领，赫鲁晓夫于 1960 年 7 月决定单方面全部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率先将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之中。一时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呈现出分裂的趋势。此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周边环境恶化、以及“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形势恶化的严峻局面。这种状况要求中国尽可能缓和与苏联的关系。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既要“硬着头皮顶住”，又要“留有余地”。^①于是，中共中央制定的“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对苏 24 字方针^②，其侧重点实际放在了“后发制人”和“留有余地”上面。这实际上是一种以缓和为主的对苏让步方针。中国在处理苏联单方面撤走在华专家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冷静与温和，就是落实此方针的结果。此后至是年末，中共在莫斯科会议上与苏共等达成妥协，签署《莫斯科声明》，以此为转折点，“缓和”上升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中的一种主色调。

进入 1961 年后，中共的外交政策，用时任外交部长陈毅的话说，就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即“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要“把亚非国家放在第二位”，“不能厚于亚非而薄于社会主义”。陈毅甚至高度评价莫斯科声明“又是个新的里程碑”，提出：“莫斯科声明之后，不是斗的阶段，我们应该服从团结”。“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一点我们要取得一致的意见，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③毛泽东则在 1 月 18 日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0 年 8 月 10 日，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9。

②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第 237 页。

③ 陈毅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报告，1961 年 1 月 5 日，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

八届九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要同国际兄弟党团结，要同苏联团结”，“不管他们怎样骂过我们，我们还是要团结，等待他们觉悟”。^①彭真还形象地描述中苏不再争吵的原因“是谁也离不开谁，两个刺猬都在冷风中取暖，谁都有刺，但还送有暖气，分裂还分裂不了。我们从未这样设想”。他还强调说：“我们对苏联的问题，是世界头号的问题，左右都不好，要严肃谨慎。”^②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后，随着中共越来越深地介入苏阿冲突，以及中国国内对这次大会通过的苏共新党纲的批判，使得中苏关系重新出现恶化的迹象。但中国此时的注意力仍然放在恢复国民经济方面，中苏两党都表示要珍惜关系缓和的局面。1962年春季，苏联报刊纪念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日的报道，“基调是强调中苏团结，相互支持，携手前进”；中共中央采取的还是“以缓和对缓和的方针”，认为“现在不是斗的时候”，“不能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押在这个宝上”，“同苏联的关系要保持到一定水平，争取好转”；强调“一定要继续努力加强……中苏的团结、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③不过，一直到1962年10月，中苏关系实际上逐步进入了一个僵持阶段，关系时紧时松、内冷外热。

此时，东欧五国同中国的关系与中苏关系的缓和同步，出现了回暖迹象，冷热交替。

在《莫斯科声明》发表之前，赫鲁晓夫曾专门与若干参加莫斯科会议的兄弟党负责人谈话，部署“如果中共代表拒绝在声明上签字，大家就联合起来像狼一样地围攻中共代表”。哥穆尔卡则不仅在会前公开谴责中共，召开波党中央全会作出反华决议，向中共提交意见书，“自己开始写文章参与反华”，而且还在“在莫斯科会议上站到第一线充当打手反对”中共。但是，当刘少奇发表讲话说完全同意声明的内容，签署了该文件，中苏迎来新一轮团结友好的局面后，波党虽限制中国党在波兰影响的扩大，但在宣传上也开始增加对中国建设的报道。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特别提出，要加强对中国的友谊。1961年1月31日晚，萨瓦茨基设宴招待前来波兰参加报刊三百周年庆祝活动的各国代表团及波新闻界活动家，并与波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奥哈布一起主动同中国代表团接触，进行友好谈话。萨瓦茨基称赞波报纸上关于中国人民公社的通讯写得“很美很精辟”，把人民公社“作为正面的、好的现象加以描写”。奥哈布则表示，“我们要求波兰报刊，更多地报道中国”；“中国发展

①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1961年1月18日，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8。

② 彭真在全国第五次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1年2月3日，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

③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并中联部电，1962年2月10日至4月6日；外交部致驻苏使馆电，1962年4月26日；陈毅在部党委会听了刘晓关于驻苏使馆工作汇报后所作的指示，1962年2月16日，外交部档案，109-03813-01；109-03811-02；109-03801-01。

迅速，苏联和中国两个社会主义强国将来一定都能超过美国”。是年 10 月，波兰对中国国庆的庆祝比上一年隆重热烈，波党报对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报道的限制有所放宽，而波地方上的庆祝会报告人则主动赞扬中国的“三面红旗”。波党通过这些举措，摆出了一种“亲苏拉华”，改善波中关系的姿态。^①

1960 年 11 月 25 日，保加利亚《工人事业报》发表社论，纪念《莫斯科宣言》三周年，不再宣扬过去坚持的“无武器无战争的世界”、战争可以避免、和平过渡、以及和平共处政策是保外交政策的总路线等论点，特别是根本不提“教条主义”。同日，保鲁赛市人民委员会文化休息站向中国驻保使馆提出：12 月份准备以该市党委、人委、祖国阵线的名义举办保中友好周。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的 10 月 1 日前后，保方为了表示对中国的冷淡，曾破例取消了在索非亚等地为中国组织的国庆晚会，而时隔月余，值此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会议上协商相互让步之际，一直站在与中共斗争前列的保方突然表示要在一个州辖市举行保中友好周，不能不说是破例了。^②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中苏两党在缓和的旗帜下围绕阿尔巴尼亚问题展开明争暗斗，保加利亚的对华态度也一度很冷，到 1962 年 2 月，甚至发展到保共中央向中共中央发出攻击性信函的地步。但是，随着苏中两党借纪念两国同盟条约签订之机同奏缓和之曲的节拍，保方的对华做法也出现了“松动迹象”。保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在 4 月 4 日匈牙利使馆举行的匈国庆招待会上对到会的中国大使表现出格外的友好，当中国等兄弟国家使节向其敬酒时，他在主动表示“今天，在这里有苏联、中国、波兰……的代表在一起喝酒，是体现兄弟国家间的团结友好，请大家干杯”时，特意把中国紧排在苏联之后。生怕中方人员听不懂，他还先后对着中国大使和中国翻译连续将此话重复了三遍，不仅用中国话说了“干杯”一词，而且在向大家敬酒时又对着中国大使说：“为中国，干杯！”此后不久，保《工人事业报》刊载了有关中国征服黄河的短文，并附图片，呈现出少有的示好现象。^③

东欧国家中第一个公开指责中国党的事件发生在捷克。1961 年 11 月 24 日，捷共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发表中央政治局委员、总理西罗基在捷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指名攻击中共在苏共二十大后“更加深了个人崇拜”。尤其在捷共中央致函中国党后，捷“报纸上大量发表文章，指桑骂槐”，反华“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但自翌年 2 月下旬起，捷方也透露出点滴要缓和的迹象。3 月中旬以后，更

① 参见驻保使馆致外交部电，1961 年 1 月 19 日；驻波使馆 1960 年工作总结和 1961 年工作规划，1961 年 4 月 14 日；驻波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1 年 2 月 1 日；驻波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1 年 10 月 17 日，外交部档案，109-02338-02；109-01526-02；109-02311-01。

② 参见驻保使馆致外交部电，1960 年 11 月 25 日，外交部档案，109-02338-02。

③ 参见驻保使馆致外交部电，1962 年 4 月 11 日，外交部档案，109-03276-04。

是明显向中国摆出“一副要缓和的姿态”。捷地方州、县、市在接待来访的中国驻捷大使时，一改前一年冷淡的态度，给予极为殷勤的接待，友好团结成为主要谈论的话题；而庆祝中捷友好合作条约签订五周年的活动，更是呈现出“近两年来未曾有过的”热烈场面。《红色权利报》转而详细摘要发表《人民日报》社论《稳扎稳打逐步前进》，并用重体字刊登社论所引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内容，这种做法还是“该报近年来的第一次”。^①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国际共运两条路线的争执中，对华态度也是“松紧起伏，斗争形势波浪式向前发展”。苏共二十二大后，匈牙利的报纸上不断出现影射攻击中国的言论；从1962年3月前后起，匈党的“态度有所收敛”，报刊杂志不再发表意识形态争论的文章，在重大庆祝集会上避免涉及争论问题，对中国的正面报道也有所增加。在东德，是年10月中国驻东德使馆举行国庆活动时，东德人员“到得最齐全”，他们的外交官员一般都能与中国保持一定的友好关系。^②

根据驻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分析，苏共二十二大后，国际共运中的“两面旗帜日益分明，两条路线的反复斗争将更为尖锐”。在公开向中共展开“大规模的面对面斗争的条件尚未成熟之时”，苏联的“主要方针是用两面手法力图限制和孤立”中国，同时为“大反华作积极的准备”。^③与此相一致，中国驻东欧五国大使馆的认识则是，驻在国对华关系松动、缓和局面的出现，不过是一种“策略上的变化”，“做点姿态，骗点资本，以便重整旗鼓，再作较量”。认为冷暖交替、关系改善的原因在于响应苏共对中共“玩弄”的“两面手法”，“是在莫斯科统一指挥下有意安排的”，其“直接目的”是为“配合苏联的政策”而采取的一种“双簧”式的斗争手法。事实上，松动缓和关系的做法是“外松内紧”，并且“只限于上层”，“而对下层还是严加控制”，所谓“上松下稍松，控制力强的多松，控制力弱的少松”，“好转有限度，缓和有保留”。至于友好状态的持续与否，则要根据“莫斯科的指挥棒而定”。^④这种评估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苏联对东欧五国牵制、约束的现实，但是，就中苏关系短暂缓和的

① 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05页；外交部致驻捷使馆并各驻外使领馆、代办处等机构电，1961年11月27日；驻捷使馆致外交部电，1962年4月4日；驻捷使馆致外交部电，1962年4月5日，外交部档案，109-02989-05；109-03242-01。

② 参见驻匈使馆报告，1962年10月17日；驻保使馆致外交部电，1962年10月29日，外交部档案，109-02474-02；109-03821-01。

③ 中国驻苏使馆1961年工作总结和1962年工作计划，1962年2月16日，外交部档案，109-02422-01。

④ 参见驻捷使馆致外交部电，1962年4月14日；驻捷使馆致外交部电，1962年4月4日；驻保使馆致外交部电，1962年10月29日；驻捷使馆致外交部电，1962年5月3日；驻保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1年6月1日；驻匈使馆报告，1962年10月17日，外交部档案，109-03242-01；109-03821-01；109-02338-01；109-02474-02。

结束而言，中国内政外交方针的扭转实际上起了决定作用。随着中共对苏方针由让步向激烈斗争回归，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进入了向着分裂前进的不可逆转的轨道之中。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松、暖”的状态，也不可避免地转为以“紧、冷”为主的基调。

东欧四国兄弟党会议与大论战的肇始

1960年夏开始的中共对苏政策的让步性调整，实际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迫于国内经济形势与周边环境恶化而作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是一种“大的容忍”，所谓“革命的妥协”和“调和”，不过是“一种过渡”，^①中苏两党分歧的症结并未就此化解。因此，新的团结形成的基础其实十分脆弱。到1962年中后期，由于中共中央在总结大跃进等政策失误过程中显露出的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倾向突破了毛泽东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以及中国国内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国际共运左派队伍形成后中共要做国际共运旗手的心理逐渐膨胀，毛泽东是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中断了对扭转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进程。随着毛泽东将中国党内及国内出现的意见分歧与赫鲁晓夫联系到一起，寻找这些现象的国际背景，其1960年以来形成的务实的对外政策指导思想也开始转变。国内政治的变化最终不可避免地启动了中国外交政策“左”转的行程。^②此后经中苏两党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中的斗争，中国对苏联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把中苏两国近两年来战略方针上的矛盾、两国关系中的矛盾，定性为“敌我性质”，中苏关系成为一种“统战关系”。^③据此，中共的对苏方针也随之发生重要变化，由此前的注重留有余地，转化为采取“攻势”，强调“临阵要斗”，要“敢于斗”，中苏

① 陈毅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报告，1961年1月5日，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

② 有关此问题，详见李丹慧：“走向分裂：从暗中斗争到公开论战——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二”，《史学集刊》，2006年第6期，第51-67页。

③ 中共中央这时开始把中苏两国战略方针上的矛盾、两国关系中的矛盾，定性为“是敌我性质”，是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根本路线的不同，矛盾的性质“是敌我性质的不可调和的”，只是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两个国家关系的性质变了”，苏联现在在领土、独立、主权问题上颠覆中国。苏联已是“坏兄弟、修大哥”。赫鲁晓夫也不再是“半修正主义者”，在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中，他已被说成是“叛徒”、“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敌对人民的”。只是因为他“是苏联的国家首领”，所以要注意“投鼠忌器”，对他“带点统战性质”，在宣传上先“不提赫的名字”。由此提出，中苏关系已成为一种“统战关系”。参见章汉夫在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2年11月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康生讲话，1962年11月8日，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陈毅在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1月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1/31/164；第六次全国外事会议传达要点，1963年2月，长春市档案馆，1/1-16/53。

斗争应是“积极的、主动的、进攻的”，而不是“防御、消极、被动”的。^①在处于僵持状态的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中共要用革命的、马列主义的两手政策对付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两手政策，并且要不怕走向边缘。^②中共开始与苏共进行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成为定局。

当中国就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问题上与美国妥协之事大做文章，掀起反对美帝国主义、实际也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政治浪潮，以及认为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出卖背叛我们，支持尼赫鲁”，准备通过在外交上、宣传上开展揭露印度的斗争，“使现代修正主义者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之时，^③赫鲁晓夫实际上也开始部署东欧五国党与其共同对付中共的新一轮攻击，说服捷共如期召开十二大，其他党“也在莫斯科的指示下纷纷要在年底前召开大会”。^④这样，从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八大（11月5—14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八大（11月20—24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十二大（12月4—13日）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1963年1月15—21日）相继举行。中共中央联络部分管联络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副部长伍修权率中共代表团出席了这四个党的代表大会；苏共方面则由苏斯洛夫、库西宁、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分别率团出席。^⑤

在保、匈两党代表大会上，报告人都在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时，影射攻击了中共。在保党大会上，指责阿党的兄弟党，在与会的64国代表中有40国的代表；在匈党大会上，与会60国代表中有30国的代表攻击阿党。卡达尔和库西宁在匈党代会上的报告及致词中多次出现影射中共的话语，还有代表指名攻击中共。由此，中共中央认为，这次匈党代表大会，是在苏共的指挥棒下，有计划地组织了对中国党的围攻，显然是修正主义者发动反华运动的一个新步骤。于是决定，“要抓住为首，进行回击”，要“集中讲三点：（1）苏阿关系恶化的责任在苏共；（2）揭露反华大合唱；（3）抓团结和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旗帜”。由于这时苏共代表尚未指名攻击中共，因此中共中央指示说，“我党也不指苏联的名”，而“对于那些仆从国家”则“不予纠缠”。中共中央还肯定中共代表在匈党代会闭幕后的酒会上发表的维护阿劳动党的祝酒讲话，称“这一回击表明了我们的严正立场，使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意外的震

① 章汉夫在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2年11月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

② 第六次全国外事会议传达要点，1963年2月，长春市档案馆，1/1-16/53。

③ 章汉夫在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2年11月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中央关于中印边境冲突和中印关系问题的通知，1962年11月14日，长春市档案馆，1/1-15/38。

④ 参见驻捷使馆致外交部电，1962年11月20日，外交部档案，109-03242-01。此前捷国内曾传言捷共十二大要延期，理由是经济上搞得很糟。参见驻捷使馆致外交部电，1962年10月24日，外交部档案，109-03242-01。

⑤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33页。

动”。^①

12月3日，捷共十二大开幕前夕，中共代表团赶到布拉格，苏共代表团团长勃列日涅夫已率苏共中央国际部人员先期抵达，捷共党代会会场内外到处是苏共代表团的人在活动。翌日，大会开幕。捷共总书记诺沃提尼在总结报告中猛烈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支持他们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民族主义者”。作为第一个外国党致词的勃列日涅夫紧随其后，也指责阿劳动党和所谓“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说他们企图把人类拖入热核战争。对于中共方面来说，这种影射性言论，不啻于一个反华动员令。由此开始，无论是捷共代表发言，还是外国党代表团团长的致词，都纷纷攻击阿劳动党和指责中国党。据中共代表团的统计，与会60多个外国党代表团，其中有50多家指名攻击阿劳动党，并有20家指名攻击中共，其数量和比例超过了保、匈两国的党代会，形成了又一次反对中国党的高潮。东道主捷克党这次站在了反华、反阿的第一线。^②中共代表团团长伍修权于12月5日在会上致词进行回应，指出，这次代表大会又一次重复了破坏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做法。在伍发言过程中，会场上出现了嘘声、拍桌、跺地板等现象；其后的发言人也开始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共和中共代表团。^③

中共中央接到中共代表团的报告后，刘少奇于12月7日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一致认为，东欧几个党的代表大会反阿反华的情况愈益严重，捷共的大会极不正常，我方应当采取进一步措施。会议决定由中共代表团发表一个特别声明，并指示代表团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后发制人，但要留有余地，在任何情况下也不退出大会，要坚持参加会议到底。同时决定准备写几篇评论，公开回答欧洲几个党的代表大会对中共的攻击，并且首先要评论捷共大会。公开评论之前，首先发表他们的重要反华言论。毛泽东同意了常委会的决定。12月8日，诺沃提尼总结发言之前，伍修权向大会主席团递交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声明”，批评大会攻击阿劳动党和中共的做法，以及大会上出现的“喧嚷、嘘叫等不正常的方式”。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指出，意共、捷共两个大会的反华叫嚣，明显是苏共一手组织的，表明现代修正主义者已经进一步采取分裂步骤。看来，在古巴问题上，充分暴露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面貌，他们很不得人心，所以妄想用猖狂的反华来转移视线。这个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道路斗争的新发展。这个斗争，正在继续展开着。^④

^① 参见中央联络部、外交部关于保、匈党代会情况的通报，1962年12月3日，长春市档案馆，1/1-15/38。

^② 参见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52-353、356-357页。

^③ 《人民日报》，1962年12月15日，第1版；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353-354页。

^④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12-514页；《人民日报》，1962年12月15日，第1版；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355-356页；中共中

捷共十二大结束不久，12月14日的《人民日报》用一个半版的篇幅刊登了诺沃捷尼和其他代表在会议上对中共批评和指责的言论。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的长篇社论。社论评述说，在国际共运队伍里，出现了一股反对马列主义、反对中国党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破坏国际共运团结的逆流。社论指出，在过去的一个多月中，在欧洲先后举行了保共八大、匈社会主义工人党八大、意共十大和捷共十二大，“不幸的是，这些党的代表大会的讲台，竟被利用为攻击兄弟党的场所。这一股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逆流，在意共和捷共的代表大会上，达到了新的高峰”。社论特别介绍了捷共代表大会的情况。此社论由毛泽东审阅并改定标题，毛还批示说：“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在中共看来，保、匈、捷三个兄弟党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情况不啻为一轮“围剿”，中共必须发起“反围剿”斗争。12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标志着中共与苏共集团公开论战的开始。^①

对于此时的中共来说，那种在布加勒斯特会议、莫斯科会议，乃至苏共二十二大之后迫使中国党搁置争议、淡化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势已成为过去。1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党内外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工作的通知》，指出在赫鲁晓夫的指挥下，修正主义者在欧洲四个党的代表大会上迫不及待地发动对中共的攻击。“从保、匈、捷、意四个党的代表大会情况来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通知》号召：“从现在起，我们就应当在全党全军范围内，有领导地、有控制地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②此后至1963年初，《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相继发表两篇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和《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拉开了全面论战的架势。^③莫斯科则以1月7日《真理报》近两万字的编辑部文章予以回应，不点名地批评中共把自己置于列宁的地位，把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处方强加给兄弟党，分裂共运。^④

1963年1月15日至21日，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赫鲁晓夫亲率庞大的苏共代表团出席。会议一开始就宣布了几条限制发言的新规定，诸如只邀请各党第一书记为代表团团长的来宾在大会上致词、其他各国的党按地区推派代表

央关于我党代表在意共、捷共代表大会上进行斗争的情况的通知，1962年12月8日，福建省档案馆，101/2/1129。

① 参见《人民日报》，1962年12月14、15日，第3、4、1版；吴冷西：《十年论战》，第515-517页。此篇社论底稿的标题为“坚持真理，分清是非，团结对敌”，毛将其改为发表时的题目，并批语：“题目似以改一下更为概括些和响亮些，请酌定。”吴冷西：《十年论战》，第515页。

② 吉林省档案馆，1/1-19/240，第4-5页。

③ 《人民日报》，1962年12月31日；《红旗》杂志，1963年第1期。

④ “苏联真理报一月七日的编辑部文章”，《人民日报》，1963年2月21日。

致词等，旨在剥夺许多代表团发言机会的同时，也限制支持中共的朝鲜、印尼等国党发表意见。而东德报纸则在发表各兄弟党的书面致词时，限制刊登支持中共意见的致词。如此种种措施，使大会处于一种不正常的气氛之中。东德党总书记乌布利希在 15 日大会开幕时的报告中，率先就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对中共发起攻击，指责中共拒绝和平共处原则，必将导致战争。^①

面对中国党亮出的“反围剿”、进行论战的姿态，赫鲁晓夫转而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他在 16 日大会上的致词中并未直接提及中国，只说：“现在停止各共产党之间的论战，停止在自己党内对其他党进行批评”，“是有益的”。^②赫鲁晓夫讲话之后，东德党中央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委员会负责人约见中共代表团，表示东德党支持苏共的“正确建议”，要求中共予以响应。与此同时，苏共代表团同东欧、西欧一些国家的兄弟党在会场内外活动，宣传赫鲁晓夫的讲话是“温和的、和解的”，说现在不应该追究谁先开始攻击，“而是如何停止争论的问题”，“一切都清楚了，就要听中国代表的讲话了”。对此，1 月 17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赫鲁晓夫的提议进行了讨论，并为中共代表团拟定了新的给德党六大的祝辞。新祝辞强调对“和解”建议要听其言观其行，反对搞假团结真分裂。次日上午，伍修权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词并宣读贺电时，大会执行主席一再摇铃制止伍继续发言，主席台上、会场中则是吹口哨、跺地板，一片喧闹之声。^③

中共中央根据中共代表团的汇报，认为德党代表大会是修正主义者们反阿反华的新高峰，赫鲁晓夫亲自出席指挥，而且还假惺惺地说要停止公开论战，因此很有必要专门写一篇社论，一方面高举团结的旗帜，一方面对赫鲁晓夫的诡计加以揭露，只是还不公开点赫鲁晓夫本人的名。这样，德党六大闭幕一周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的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以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为名，揭露赫鲁晓夫的真面目。^④

2 月 21 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建议两党停止论战，举行会谈，共同筹备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其后，3 月 30 日，苏共中央又在公开发表的给中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了“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符合它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的总路线”的问题。^⑤但是，此时的中共已正式提出“同修正主义在国际斗争中争夺领导权的问

①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 359-360 页；“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致词的摘录”，《人民日报》，1963 年 1 月 26 日。

② “赫鲁晓夫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3 年 2 月 22 日。

③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 360-362 页。

④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523 页；《人民日报》，1963 年 1 月 27 日。

⑤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 250 页；人民出版社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462-463 页。

题”^①，认为国际共运领袖的责任已落到中国党身上，“落在我们的毛主席身上”；“世界革命的领导中心”已转移到中国，世界革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仅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而且还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进行。^②因此，中国党已不能再完全认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接受把苏共的纲领确定为是国际共运的总路线。于是，当赫鲁晓夫送来这一契机时，中共中央于6月14日复函苏共中央，并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封信。^③中共中央在信中提出与苏共纲领大相径庭的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设想^④，正式迈出争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步伐。

可以说，赫鲁晓夫为报复中共对其处理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问题的攻击，试图借保、匈、捷、德四国党及意共（十二大，1962年12月2—8日）召开代表大会之机，由兄弟党领导人打头阵，影射攻击中国党。会上发生所谓“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进一步激起了中共要与苏共公开进行全面意识形态大论战的雄心。不过，在这五国党代表大会上，尽管有42个党公开指责中国党，但与1960年莫斯科会议相比，数目还是少了，而兄弟党中的左派敢于公开出来说话维护阿劳动党和中共的却多了。^⑤这种情况无疑又增强了中共把论战进行到底的信心。由此，东欧四国党的代表大会实际上不仅为中共进行大论战提供了演练的舞台，而且还为这场大论战的全面展开提供了契机。正如中共中央所指出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向我党进行的公开攻击，丝毫不能损害我们，相反地，使我们取得了公开回击和批评他们的权利。公开争论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益无害的”，“我们同现代修正主义所进行的争论，是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必须严肃对待”。^⑥

此后，波、匈、东德、捷、保东欧五国党成为苏共与中共进行意识形态论战的主要依靠力量。^⑦根据中国驻这五国大使馆的分析，或说“德党态度之恶劣较东欧各国更甚”，他们放肆攻击中共中央领导人，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恶化中德两党两国关

① 第六次全国外事会议传达要点，1963年2月，长春市档案馆，1/1-16/53。这里指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等国际斗争中，“必须旗帜鲜明，始终掌握领导权”。“决不能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降低马列主义的原则，迎合修正主义，以至脱离左派，加强右派，增加中间派的动摇”。

② 陈毅在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1月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1/31/164。

③ 《人民日报》，1963年7月20日。

④ 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人民出版社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5页。

⑤ 1963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着重分析了这次欧洲兄弟党会议形成的所谓新的反华浪潮的特点。吴冷西：《十年论战》，第532-533页。

⑥ 中央关于正确宣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的通知，1963年1月6日，吉林省档案馆，1/1-19/263。

⑦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224页。

系；或认为“捷现修领导集团，紧跟着指挥棒”，“用敌性宣传方式，竭力想把我与最反动势力放在一起”，“在新的斗争阶段中，成了反华大合唱丑角中的绝对冠军”，“其特点是：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继续恶化两国关系”；或通报说保共斥责中国党诬蔑诋毁苏共和苏联，“只能得到马列主义背弃者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叛徒的耻辱称号”，鼓动大反华；或介绍匈牙利党报“故意歪曲”中国代表在世界妇女大会上的发言，指责中国好战，“煽动人民反华”；或报告波兰报刊就中国国庆发表社论并攻击中共，波对华关系更为冷淡。^①总之，随着党际争论的尖锐化，中国与这五国的关系也开始全面恶化。

进入1965年后，中苏两党围绕莫斯科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3月会议以及援越问题发生了新的冲突。斗争的中心，前者涉及国际共运的领导权问题，以此次会议为标志，国际共运正式分裂。后者则关系到谁能掌握对越南问题的主导权。中国不能容忍苏联控制对越南问题的发言权，因此在援越问题上排斥苏联，双方在援越物资过境中国等问题上矛盾冲突不断。在这两方面的斗争中，东欧五国密切配合苏联反对中国：一是与中共继续论战，指责“中国分裂”，“不参加三月会议”，“反对通过国际会议商定反帝斗争共同策略并加以贯彻的必要性”；保共甚至在转载兄弟党反华文章时使用了“世界霸权政策”等标题。根据苏共提供的苏联援越物资从中国过境受阻等信息，五国党同时统一口径指责“中国只是口头上支持越南，毛泽东声称只有战争打到中国边界中国才会参战”，而“越打落的美国飞机都是苏帮助的结果”。波党领导人则认为，“越南问题是由于共运分歧敌人才敢侵略的，如共运团结，肯定不会发生越南战争”，进而抢先配合苏联发表反华文章，在人民群众援越反美情绪高涨之际，就中国反对在越南问题上与苏联“联合行动”，攻击中国党，并封锁报道中国支持、援助越南的言论和行动。^②东欧五国与苏联协同动作，一时间似乎在重演与苏共“对对表”的局面。

1966年中国正式启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后，全国渲染出浓重的反苏氛围。中苏边

① 驻德使馆致外交部电，1963年7月20日；驻捷使馆致外交部电，1963年7月24日，1963年8月20日，1963年9月9日；各国共产党动向，1963年8月6日；驻匈使馆致外交部电，1963年7月7日；驻波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4年10月1日，外交部档案，109-02574-02；109-03391-03；109-02631-01；109-02666-01；109-02742-01。

② 驻保使馆致外交部电，1965年4月1日；驻波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5年5月29日；驻保使馆致外交部电，1965年12月24日，1965年3月15日；驻波使馆致外交部电，1965年10月18日；驻波使馆一九六五年宣传工作总结，1965年12月10日；驻波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5年4月1日，外交部档案，109-02938-02；109-02910-01；109-02938-02；109-02910-01；109-03669-04；109-02910-01。关于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斗争，详见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1961-1973）”，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126-191页。

界冲突随之逐步升级，到1969年还爆发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中苏边境局势趋向紧张，一度濒临战争边缘。两国关系完成了由盟友到敌人的转化过程，进入敌对阶段。与此同时，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也严重恶化，其中中保、中捷关系尤为紧张。这一时期，中国进一步认为五国已经变为“修正主义集团”，中共与捷、匈、保、德四国党的关系相继断绝，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关系虽未正式终止，但中波两党的对立情绪同样愈益加剧；中国与东欧五国的国家关系也呈低迷状态，除贸易关系外，其他各领域的合作陆续中断，相互间抗议交涉频繁，社会主义阵营已是名存实亡。^①

中国对东欧五国方针的变化

1960年代中国对东欧五国方针的变化，总体上是与中国的对苏方针同步发展的。就中国的对苏方针而言，1960年初以后，中苏两党虽然经历了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日上的斗争，以及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北京会议和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的激烈冲突，但是双方都不愿意矛盾激化，都强调要在马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达成新的团结。毛泽东此时仍然将同赫鲁晓夫的斗争定性为是人民内部矛盾，按照周恩来的解释就是，赫鲁晓夫还是半修正主义，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苏共尚没有脱离马列主义总的轨道，两党两国的关系总会雨过天晴。^②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制定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对苏24字方针，其最终目的是争取两党两国重新团结起来。^③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批示，中共中央还确定了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方式，即“要讲究策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争取多数，孤立修正主义”。^④如前所述，自1960年中期到1962年中后期，中共的对苏方针有一个从以让步为主到以斗争为主的调整，中苏关系也由缓和、僵持转入两党意识形态论战开始后的紧张状态。1964年初，随着大论战的升级，^⑤中苏两党关系走向破裂，两国关系恶化，毛泽东在是年中期对国家军事

① 关于1965-1969年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的详细状况，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15-322页。

② 毛泽东在中央转发安徽省委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报告的批语，1960年9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91-293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44-345、342页。

③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37页。

④ 毛泽东在中央转发安徽省委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报告的批语，1960年9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292-293页。

⑤ 1964年1月初，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现在对兄弟党可以既往不咎。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要集中攻赫鲁晓夫，其他可以放在一边，网开一面（吴冷西：《十年论战》，第657、660页）。这样，2月4日至7月1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连续发表3篇长文，即“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

防御战略作出调整，苏联开始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假想敌；同时酝酿发动一场巩固政权的政治大革命。苏联由友变敌角色的质的变换，彻底扭转了中苏关系发展的方向。^①与此相应，中国在处理与东欧五国关系问题上，大方针随着中国对苏方针的调整而调整，但也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根据时期的演进呈现出不同的变化。与此相应，中国在处理与东欧五国关系问题上，大方针随着中国对苏方针的调整而调整，但也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根据时期的演进呈现出不同的变化。

（一）关系回暖时期中国对东欧五国的基本方针及其变化情况

196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处理与东欧五国关系的基本方针为“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多做工作”，“同时还要区别对待”。^②这一方针在中国与东欧关系回暖时期，基本上得到了正常的贯彻。

例如，1959年末1960年初，中共中央在确定继续把中苏团结作为基本政策的同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赫鲁晓夫有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可能，中共应该帮助他，要向赫鲁晓夫做工作的思路，^③利用4月22日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日的机会，相继发表了《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共中央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④集中宣传中共的理论观点，以拖住赫鲁晓夫，延缓其向修正主义滑落的步伐。^⑤这三篇文章被汇编成单行本，以《列宁主义万岁》为书名出版。^⑥此后，还有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讲话等多种反映中苏分歧、强调中共

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文章从标题上就鲜明地突出了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人民日报》，1964年2月4日、3月31日、7月14日）。

① 关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问题，详见李丹慧：“毛泽东的安全战略思路及其转变1964-65”，（香港）《二十一世纪》，2000年6月号；李丹慧：“走向分裂：从暗中斗争到公开论战——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二”，《史学集刊》，2006年第6期。

② 驻波使馆党委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1年8月16日，外交部档案，109-02305-01；驻保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1年6月1日，外交部档案，109-02338-01。鉴于“区别对待”方针的情况比较特殊，本文将另节考察。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31、233页；林克日记（手稿），未刊，第124-126页；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1月17日，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7。

④ 《人民日报》，1960年4月20日，4月22日，4月23日。

⑤ 彭真在全国第五次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1年2月3日，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

⑥ 人民出版社编：《列宁主义万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这些文章很快“被译成外文，匆忙通过各共产党的上层领导寄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并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3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存，2004年，未刊，第3351页。

立场观点的单行文件印发。随着中苏分歧的发展，这些出版物和印行材料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为中共方面向兄弟党散发的主要宣传品。

对于中国驻外使领馆在驻在国大力散发宣传材料的做法，东欧五国都表达了反感情绪。有的是由国家领导人直接提出责备，如哥穆尔卡指责中国驻波使馆散发宣传材料，特别对中国使馆印发《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满。^①有的是由主管官员发表意见，如保加利亚外交部新闻司长约见中国驻保使馆官员，要求该馆停止散发印有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讲话的使馆公报，认为这是不尊重中保双方达成的协议，是在干涉保加利亚的内政。^②而匈牙利副外长则与中国大使会见，就该馆第17期公报中发表涉及阿尔巴尼亚问题的蒋南翔和吴玉章的讲话、中共致阿劳动党贺电等问题进行交涉，希望删除这些材料。^③一时间，围绕对外散发宣传材料事，中国大使馆与驻在国摩擦不断。

在此期间，中国在处理这类问题时，采取了与驻在国配合的态度，要求使馆在驻在国印发小册子，“要贯彻‘求同存异’的精神”，“不要给对方以我挑起争论的口实，以适应和巩固莫斯科会议后兄弟党团结一致的新局面”；并指示，要在陈述散发小册子、使馆公报等属于使馆的正常业务、符合外交惯例的同时，决定停止或不发小册子等单行文件。关于涉及争论问题的使馆公报事，中国外交部一方面电令驻保使馆：国内报刊评论和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争论的文件，如无国内特别指示，不必刊印；一方面指示驻匈使馆：第17期公报停发，抽出引起争议的讲话、贺电等，改为第18期，以脱期表示抗议。^④

当然，中国围绕对外散发宣传材料作出的一定程度的妥协，并不意味着中共与东欧五国党意识形态分歧的消弭，只是表明中国方面为配合此时对苏关系和解的趋势，对东欧五国关系的基本方针也转向“注意谨慎、克制地解决矛盾，留有余地”。事实上，对于以正统马列主义代表自居的中国党来说，在宣传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反对修正主义的理论观点方面屈从于外部的限制，不与之争执、辨明是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是要做秋后算账的准备的。即如伍修权在哥穆尔卡批评中国驻波使馆散发宣传材料一事上所发表的意见那样：“现在不要谈，可记下一笔账，将来

① 外交部请示函，1961年3月17日；驻波使馆1960年工作总结和1961年工作规划，1961年4月14日，外交部档案，109-03769-01；109-01526-02。

② 驻保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1年11月2日，外交部档案，109-02335-01。

③ 驻匈使馆致外交部电，1961年12月15日，外交部档案，109-02328-01。

④ 参见驻波使馆1960年工作总结和1961年工作规划，1961年4月14日；驻保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1年11月2日；外交部致驻保使馆电，1961年11月14日；驻匈使馆致外交部电，1961年12月9日；驻匈使馆致外交部电，1961年12月15日，外交部档案，109-01526-02；109-02335-01；109-02328-01。

需要时再用。”面对捷总理西罗基发表指责中共搞个人迷信的讲话一事，外交部的指示也是：“把帐挂起，不要多同他们纠缠。”同时采取党和政府不出面，而让群众表示愤慨的方法，致使捷方十分狼狈，认为中国运用了“异乎寻常的手段”。^①

1962年以后，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随中苏关系的变化，进入到表面上继续缓和友好，实际却或松或紧的僵持状态。在反修斗争形势出现新变化的情况下，中共对东欧五国的基本方针有了微妙的调整，即关注的侧重点有所变化：“对于驻在国一切不利于团结的言行”，强调“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在对驻在国做工作方面，强调“积极主动地多做工作”，“扩大我党的影响”，“适当扩大接触面，不要局限于少数同我很友好的人”，以便“扩大眼界，便于对照比较，得出更全面的看法”。并且增添了新的内容：一是“过去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不交朋友”，现在“在兄弟国家也应该允许交朋友，并把交朋友看成是正常的活动。为了不被人抓把柄，可以好坏都交，以坏的掩护好的”。二是通过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揭露以南斯拉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背叛马列主义的真实面目”，“增加对驻在国领导集团的压力”，“争取团结对敌”；面对东欧五国跟随苏联步伐而出现的缓和和对华关系的现象，要“本着弄假成真、因势利导、争取主动、恰如其分的方针积极开展工作”。^②

（二）中苏关系走向恶化时中国对东欧五国方针的调整

1962年末，毛泽东指示：“我们要做革命的促进派，利用当前有利形势，掌握主动，抓紧时机，发挥效能，调动全局，以展开新的局面，取得新的胜利。”据此，中国开始“以我为中心开展工作”，提出在国际活动中“要冲破修正主义的圈子，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的一套，使北京成为一个国际活动中心，同帝、修唱对台戏”。^③于是，到1964年中后期，中国与苏联和东欧五国的关系转入意识形态论战的轨道。此后一直到1960年代末，中国对东欧五国的方针不断发生变化，逐渐加进了分化瓦解苏东集团、以及联合东欧五国对抗苏联霸权主义的构想。

随着中国对苏方针的调整，中国对东欧五国的方针也从“以斗争求团结”转向如遇影射、挑衅，“应坚决斗争，当场痛斥，不怕紧张”；“既要抓团结的旗帜”，又

^① 外交部请示函，1961年3月17日；外交部致驻捷使馆并各驻外使领馆、代办处等机构电，1961年11月27日；驻捷使馆致外交部电，1962年4月4日，外交部档案，109-03769-01；109-02989-05；109-03242-01。

^② 驻保使馆1962年工作计划要点，1962年2月1日；外交部批复驻波兰使馆函，1962年4月21日；朱其文大使向部党委汇报纪要，1962年5月25日；驻捷使馆致外交部电，1962年4月14日，外交部档案，109-032821-04；109-02305-02；109-02395-01；109-03242-01。

^③ 第六次全国外事会议传达要点，1963年2月，长春市档案馆，1/1-16/53。

要“仍采取冷的态度”，对于驻在国“装出”的友好姿态，“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而对驻在国提出的建议和要求，应“冷淡表示报外交部研究”，“不要承担任何义务”。^①由此，中国驻外机构开始积极投身大论战的行列，广泛散发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致苏共中央的复信，递送的对象不仅为“党和国家机关、企业、合作社、文化科学机构、社会团体、个人等”，而且还包括驻在国被开除党籍的人；不仅“通过邮寄和亲送到手的方式散发”译成驻在国文字的《建议》，而且还从北京向驻在国研究所、机关、团体和个别人士寄送俄文和英文的宣传材料，甚至从美国向东欧一些国家的个人和机构邮寄中共的论战文章。^②

此时，中国把对东欧五国方针的重点放在了对驻在国展开工作的问题上，强调遵循中共中央“关于反修同做友好工作相结合的原则”，在“做好上层工作”的同时，开始格外注重做“中下层人士的工作”，利用举行国庆招待会的机会，积极主动地接触中下层，以期逐步扩大中国的影响，突破“修正主义集团”的“限制、冷落”和“封锁”。^③赫鲁晓夫下台后，这种工作方针进一步转化为做东欧各国内部的分化瓦解工作。根据驻在国民众思想波动，所谓“左派信心更足”，“中间的更动摇”，“右派则更心虚”的情况，突出注意抓各种机会，同各方人士多做接触，多做工作。^④1965年中共拒绝参加莫斯科三月会议，国际共运正式分裂之后，与苏共采取的呼吁团结、停止公开论战，即所谓“笼络右派、分化左派、孤立中国”的方针针锋相对的是，中国更加强调“要讲究实效，抓紧战机”，“同帝、修、反争夺宣传上的主动权”，并且“要敢于宣传”，“着眼在争取大多数”。^⑤

早在与东欧五国关系短暂缓和时期，中国就已在评估驻在国所谓“健康力量”的发展前途，以及由这种“内部健康力量”替换现领导的可能性的问题。^⑥在中苏分裂之后，培育驻在国亲华势力，以及分化东欧五国与苏联的关系，更成为中国对五国方针中的重要内容。至于鼓励并支持兄弟党中左派分子另组派别或另行建党，壮大国际共运左派队伍，则是在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国际共运发生分裂迹象时即开

① 外交部致各驻外使馆、代办处电，1963年4月27日，外交部档案，109-02574-02。

② 驻保使馆致外交部电，1963年8月4日；各国共产党动向，1963年8月6日，外交部档案，109-02625-02；109-02631-01。

③ 参见驻捷使馆致外交部电，1963年10月5日；驻保使馆致外交部电，1963年10月6日，外交部档案，109-03391-03；117-01365-04。

④ 驻捷使馆致外交部电，1964年12月03日，外交部档案，109-02736-03。

⑤ 驻波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5年10月3日；驻波使馆一九六五年宣传工作总结，1965年12月10日，外交部档案，109-02910-01；109-03669-04。

⑥ 朱其文大使向部党委汇报纪要，1962年5月25日，外交部档案，109-02395-01。

始了。^①到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夕，支持东欧五国党中分裂出来的左派组织，促进五国对苏联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也开始成为分化瓦解东欧集团、孤立苏联的手段之一。

1966年5月初，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与谢胡、卡博等人就苏共二十三大问题交换意见。当谢胡谈到德、保、波、捷各党完全是苏联的仆从时，毛泽东表示：“不一定意见完全一致吧！”他们是“一个控制，一个反控制。”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卡博向邓小平等人介绍说：在东欧这些党内，特别是像波兰、保加利亚，他们有左派。保加利亚有很多很好的共产党人，就是没有组织起来。不久前波兰就在阿尔巴尼亚建立了一个地下党。该党临时中央负责人（杨力），过去是波党中央委员，贝鲁特的助手，曾经任交通部长。他是秘密出去的，进行地下活动。当卡博转达杨力的愿望，说他表示希望同中国党保持联系时，毛当即明确答复说：“好，应该联系。”并嘱咐说：“他们要更谨慎。”^②

是年末，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代表杨力随同出访阿尔巴尼亚的康生一起乘专机抵达北京。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专门接见了杨力。毛鼓励说：“希望在你们，在少数而不在多数。希望在你们造反派。”杨力回应道：“我们的造反是正确的，是符合革命方向的。”毛即加以肯定说：“不错，讲得对！说有希望，就是因为正确。一大群挂着马列主义招牌，现在成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中国也是这样”。“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在介绍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毛关心地询问杨力的行程。康生报告：“次日将离开北京去武汉、广州，然后由湛江乘船去阿尔巴尼亚。”杨力表示：“感谢中国党，使我有机会来到中国，向中国同志介绍了我们党和国家的情况，听取了中国同志的看法和中国同志对国内情况和其他党情况的介绍”。“我离开中国时，反帝反修斗争的信心更加坚定了。中国的革命斗争，对我是最大的帮助。”毛则指导说：“在中国看到了希望，在世界也看到

① 根据苏共领导人的判断，“中共领导人从1958年开始就一步一步加深分歧，越来越多地采取分裂主义、宗派主义手段，背着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在国际共运中搞宗派活动。对此，乌拉圭共产党中央书记、巴拿马人民党书记，以及阿根廷共产党中央书记都曾向苏共中央通报说，中共领导人试图积极地对拉美各国共产党的代表施加影响。北京还一直在为大部分来自亚洲和拉美国家的共产党员办学习班，开始拉其他兄弟党反对苏共路线，努力孤立苏共（参见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3卷，第3350-3352页）。”1961年至1965年，毛泽东也是频繁接见亚非拉美地区的左派共产党人。

② 毛主席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这里及下文提到的杨力，波兰名为Kazimierz Mijal。前不久，笔者与沈志华赴德国参加一个讨论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关系的会议。会上，我们的朋友、波兰学者郭什卡也谈到这个人。她向会议提交的报告指出：Kazimierz Mijal领导一个获中国支持的非法的波兰共产党，其与中国人联系密切，经常作为“波兰党第一书记”应邀访华。见Malgorzata K. Gnoinska, Poland's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Light of Sino-Soviet Interactions, 1949-1989, for FRIAS conference "'Interkit': An International against China?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Soviet Bloc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Cold War", May 12-13, 2011.

了希望。波兰、苏联、美国、日本、印尼、印度、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都有希望。革命要靠群众，靠多数；少数人是靠不住的。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同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的人进行斗争。如果不这样做，就没有希望。”杨力进一步表示：“离开中国时我更坚信，团结在中国周围进行革命斗争，这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接见结束时，毛亲自将杨力送到门外，并请他向霍查和阿尔巴尼亚其他领导人转致问候。^①

其后，毛泽东继续关注东欧国家的情况。1967年12月末，他在接见印共左派大吉岭县委第二批学习代表团时，特意同陪同接见的康生、周恩来等人讨论了东欧五国与苏联领导人的互访动态，以及西德问题、罗马尼亚政府改组及罗苏关系，周谈及苏东集团现在“困难重重”。^②

1968年8月20日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人民日报》于23日发表评论员文章：《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公开给苏联戴上“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③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接见阿国防部长巴卢库，谈到苏联的入侵时说：铁托也很紧张。南斯拉夫成了我们间接的同盟军。它与苏联有矛盾，要利用他们的矛盾，包括罗马尼亚、杜布切克。对东欧国家要一分为二。苏联武装占领捷克，匈、捷、波、东德等国好多人是不满的，是不赞成的。^④以此向阿方表示了联合东欧其他国家，抗衡苏联霸权主义的意图。周恩来稍后向阿方提出了建立对抗苏联的有中国参加的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巴尔干联盟的建议，遭到霍查的拒绝。^⑤时隔数月，在毛泽东会见澳共（马列）希尔时，康生又谈到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党和小组的情况，如苏联的斯大林小组，捷克、波兰一些新的马列主义小组等。^⑥

根据目前中国的资料，在整个1960年代，毛泽东从未与东欧五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谋面，唯一受到接见的杨力，还是移居阿尔巴尼亚的地下党负责人。中国联合东

① 毛主席接见波共杨力谈话记录，1966年12月21日。

② 毛主席接见印共左派大吉岭县委第二批学习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3日。

③ 《人民日报》，1968年8月23日。1968年6月周恩来在会见越南领导人范雄等人时即指出：苏联已经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见 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 Stein Tønnesson, Nguyen Vu Tung and James G. Hershberg (ed.),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964-1977*,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Working Paper*, No. 22, p. 138.

④ 毛主席同巴卢库谈话记录，1968年10月1日。

⑤ 佩罗·兹拉塔尔：《霍查政治传记》，阳果、云飞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271-272、281-282、304页。该书对此事的记述有矛盾：一处说1966年5月谢胡、巴卢库访华时，中国即对他们提出此项计划；6月周恩来访阿时又向霍查解释这一建议；1968年10月毛、周再次对巴卢库重申此设想（第271-272、281-282页）。另一处则说1968年10月巴卢库首次向霍查报告中国的这个计划（第304页）。根据现有材料以及1966年中南关系的状况，笔者暂时采用后一说。

⑥ 毛主席会见澳共（马列）希尔谈话记录，1968年11月28日。

欧五国对付苏联的设想未能实现，中国在苏侵捷问题上强硬攻击苏联，声援捷克斯洛伐克的举措也没有得到捷方的呼应。到1969年中苏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时，捷还同匈牙利一起严词谴责中国，说中国在边界上进行“挑衅”。在此期间，中国与东欧五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争执和冲突，政治关系持续恶化，如中国使馆宣传窗展出有关1967年莫斯科红场事件的照片受到指责，捷限制中国使馆人员活动范围及关闭新华社布拉格分社，波兰远洋货轮船船员途经上海时，代存英国人拍摄中国军事设施的相机等，相互关系中的紧张气氛随之加剧。^①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试图将分化的触角伸向东欧五国党内部所作的努力，一方面又反映了作为苏联倚重力量的东欧五国集团虽然与苏联之间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但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其离心力尚不强大。而中国试图扶植东欧五国反执政党势力的做法，不仅无法达到瓦解苏东集团的目的，反而还构成了促进东欧五国强化对华敌对情绪的动因。

（三）中国对东欧五国政策中的“区别对待”方针

1960年代中国对东欧五国采取“区别对待”方针，试图分化苏东集团的做法，突出反映在中国与波兰的关系问题上。

可以说，中波关系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1956年波兰十月危机时，中国党曾帮助哥穆尔卡抗衡赫鲁晓夫的老子党、大国主义的倾向。由此，中国在波兰的影响也在这一年达到高峰。^②鉴于波兰想要维护一定的独立性，以及哥穆尔卡办事“不走极端，主张留有余地”的特点，中国驻波大使王炳南认为：“如果说英国是西方国家的中间地带，那么波兰可能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间地带，它究竟跟谁走，还难作定论。”^③这种意见，为中共中央确定处理与波兰关系的方针提供了参考，使得中波关系较中国与东欧其他四国的关系更近一些，中国对波兰的方针也始终注意留有回旋的余地。

中国对波的方针，随着波兰在国际反修斗争中的表现而起伏波动，双方互为因应。波兰虽然在总的方面依靠苏联，对华却并不愿把文章做死。即便因中国在1961年削减对波贸易70%，国内经济受到极大影响，他们也“并未像捷克那样说中国的坏话”。当中国北调船只经台湾海峡，向苏联方面寻求帮助，借用苏联船只和船员遭到拒绝时，中国大使给波兰相关人员打个电话就解决了问题，表现得很“够朋友”。于是投桃报李，尽管中国方面认为“波领导人的修正主义思想比苏联有过之、无不

① 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19-320页。

② 详见沈志华：《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119-143页；《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3期，第45-58页；Zhihua Shen/Yafeng Xia, “New Evidence for China’s Role in the Hungarian Crisis of October 1956: A Note”,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XXXI, No. 3 (September 2009), pp. 558-575。

③ 王炳南大使向部党委汇报纪要，1962年5月31日，外交部档案，109-02392-01。

及”，有时“哥穆尔卡的口里只有苏联，没有中国”，中国方面仍然认为“修正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内总是少数，打击面不要搞得过宽”。^①

在中国外交部看来，1962年底哥穆尔卡与赫鲁晓夫两度会谈以后，波方反华言论更为突出，成为德党六大后东欧国家发表影射和攻击中国文章最多的国家之一。但一般情况下，波兰不愿走在反华第一线，斗争比较谨慎，留有余地，对维持国家关系比较注意，对中国进行挑衅的事件也比较少，在两国贸易谈判中能够谅解中方的困难等，与此相应，中国“也注意区别对待，给波适当照顾”。^②

中苏两党大论战开始后，中国外交部认为苏联同东欧国家的矛盾正在发展，由此决定“对波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可多做些工作，但也不宜表现过热，操之过急。在经济方面，可给波一些甜头。初步考虑，明年对波贸易总额比今年将有较大的增长”，“贸易总额争取超过3000万卢布”，“出口方面也可增供一些波兰需要的商品”，“还可根据情况的发展，做一些补充贸易”。外交部还指示王炳南，“另找时间利用适当时机同波方一位领导人作一次交谈”，向其表示：“我们注意到波兰在同中国的国家关系方面，有着自己的做法，这是同有些国家有区别的”；“我们愿看到中波两国关系不断发展”。^③

1964年初，毛泽东提出：现在对兄弟党可以既往不咎，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这一方针虽然主旨在于部署大论战的文章将矛头直指赫鲁晓夫，进行点名批判，打到其痛处，而不再围绕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新殖民主义、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政策等问题做文章，但对于中国与东欧五国的关系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是年初，为了阻止西德通过“多边核力量计划”直接掌握核武器，波兰提出了冻结中欧核武器的建议。对此，中国方面认为，该项提案“是建立在修正主义和平共处总路线基础上的消极建议”，“美苏可能利用此项建议，要求援例在其他地区冻结现状”，束缚中国，以维持美苏的核垄断。因此，中国外交部特通告各驻外机构，“对于波兰的建议，我们不宜支持”。同时又指示说，由于该提议有可能是为牵制苏联在西德核武装问题上作更大让步，以及鉴于波一向注意同中国保持友好的国家关系，因此，“对波方建议也不宜进行揭露和批评”。^④

毛泽东本人也对波兰的动向格外关注。是年5月，他在接见秘鲁、厄瓜多尔两

① 参见王炳南大使向部党委汇报纪要，1962年5月31日（此件中“削减对波贸易70%”文字的上部，有手写“50%”的字样）；驻波使馆1960年工作总结和1961年工作规划，1961年4月14日，外交部档案，109-02392-01；109-01526-02。

② 中波两国政治关系简况，1963年1月31日，外交部档案，109-02609-01。

③ 外交部复驻波使馆电，1963年11月20日，外交部档案，109-03928-01。

④ 外交部致各驻外使馆、代办处，广东、河北、山东、辽宁、上海各省市市委并转外事办电，1964年3月28日，外交部档案，109-03930-01。

个共产党学习代表团时，特别谈到波兰对召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不积极”，从1963年夏季前到1964年夏季前有这个变化，询问对方感觉到这一点没有？毛指出，“修正主义内部有危机，如赫鲁晓夫要开会，要开集体制裁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会议，也许开得成，也许开不成”。^①其后不久，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出现“大肆反华”的情况，外交部仍然考虑：尽管如此，“但我已决定不扩大打击面，不作评论，特别在国家关系上，仍要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由此建议与波方相应部门有关系的单位，对当年的波兰国庆节依旧按惯例、按礼节致贺；同时复电中国驻波使馆，表示同意该馆关于加强对波工作的意见，还特别强调“对波的工作还可多做一些”。^②

当克里姆林宫发生政权更迭后，中国有关部门在了解到“哥穆尔卡和卡达尔同苏联新领导最亲近”的情况下，依然请示派遣政府代表团参观第三十四届波兹南国际博览会，并提议代表团的“规格可比往年高一些”，以利“对波兰做些工作，利用波苏矛盾，扩大我在波兰的影响”，获周恩来批示同意。面对波兹南博览会期间波方接待规格高于往常，对中国代表团态度的特点是“谈友好、合作，不谈分歧；谈经济贸易，不谈政治”的状况，代表团根据国内指示的精神，以“给以希望，但不承担具体义务”；“反复表明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经济合作关系是我党和政府的既定方针”，“我们愿意看到中波两国关系进一步搞好”作为对应之策，但建议在有利于分化波苏关系的前提下，适当发展对波贸易，加强同波兰的科技合作和文化往来，加强对波兰的宣传工作。而此时中国与东欧五国中其他四国的关系则相对较差，其中中保、中捷关系更为紧张。最后，中国与其他四国终止了党的关系，而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关系却没有正式断绝。^③

尽管如此，中国以分化苏东集团为主要目的而采取的“区别对待”方针并未取得成功。中共一方面暗中扶植从波兰党分裂出来的“健康力量”，一方面又公开支持波兰与苏联闹独立，在分化苏东集团的同一目标下所采取的这两种方针是矛盾和冲突的。注重前者，势必引起驻在国的反感和防范，使“区别对待”方针流于形式。而追求后者，则又会影响毛泽东另起炉灶，重新组织世界革命力量这一政治目标的实现。

① 毛泽东接见秘共、厄共两个学习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5月25日。

② 外交部关于按惯例祝贺波国庆节的请示，1964年7月4日；外交部、对外文委复驻波使馆电，1964年9月9日，外交部档案，109-02742-02；109-03559-01。

③ 驻波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4年12月7日；外交部请示函，1965年5月24日；我参加波兹南博览会政府代表团访波情况的报告，1965年7月5日；驻波使馆一九六五年宣传工作总结，1965年12月10日，外交部档案，109-02747-01；109-02907-01；109-03669-04；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15-316页。

总体来讲，中国在 1960 年代对苏东集团的外交方针是失败的。从目前中国方面披露的档案文献来看，中共对东欧五国的方针既不断变化，又相互矛盾，其结果，非但没有达到分化苏东集团的目的，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苏东集团的凝聚力。

【Abstract】 In 1960s, Sino-Soviet relations were in splitting, China's relations with Bulgaria, Czech, East Germany, Hungary, Poland, the five countries of Soviet-Eastern Europe Bloc, restrained by the evolution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fluctuated with changes of the country and part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viet Union. In the beginning of 1960s, as the detente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for a time,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fiv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instability yet striving for detente. In the end of 1962 and beginning of 1963, centered on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China-India boundary clash issues, new struggle between China and Soviet Union were in incub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justed policies towards Soviet Union to struggle and attack as keynote, ready to debate with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while,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deployed that the fiv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criticiz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congress of part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our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Hereon, the public debate on ideology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were initiated. At the launching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Sin-Soviet boundary clash was accelerated to local war, the Sino-Soviet relations were in hostile status, and the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fiv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were exacerbated. In 1960s, changes of China's policy towards the fiv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were in general synchronized with China's policy towards the Soviet Union, yet with diverse contents and features, presenting with different changes in accordance with evolution of period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Differential Treatment" adopted by China, with aim to divide Soviet-Eastern Europe Bloc, was prominently reflected in Sino-Poland relations. In general, China's policy towards the fiv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in 1960s was changing and conflicting, which, to some extent, only resulted in strengthening cohesive power among the Soviet-Eastern Europe Bloc, rather than obtaining the aim of dividing the Bloc.

【Key Words】 China-Soviet split, the Chinese politics towards fiv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5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Аннотация】 В 1960-е гг.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ходились на эпохе

раскола.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НР и пятью странами советско-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 (Болгария, Чехия, Восточная Германия, Венгрия, Польша) менялись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эволюции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колебались по мере изменений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и партиями двух стран. В начале 1960-х гг. ,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определенное время смягчались,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НР и пятью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улучшались и смягчались. В конце 1962 - начале 1963 г, КНР и СССР начали новую борьбу вокруг проблем кубинского ракетного кризиса и китайско-индийского пограничн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КПК изменила политику к СССР наступлением и борьбой, собралась вести полемику с КПСС; КПСС подала мысль пяти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м странам критиковать КПК на партийных съездах четырех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 Началась открытая полемика по идеологии между КНР и советско-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ой. С началом культур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КНР,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й пограни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евращался в локальную войну.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попали в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НР и пятью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сильно ухудшились. В 1960-е гг. измен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к пяти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м странам во многом были схожими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к СССР, а в разных эпохах были разными в содержании и чертах. С целью раздел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 КНР принял курс «относиться по-разному». Такой курс отражался в китайско-п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В целом, китайск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урс к пяти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м странам непрерывно изменялся, даже вступал в противоречие с самим собой.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КНР не достигла цели раздел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 наоборот, в определенной степени укрепила сцепление группировк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й раскол, политика Китая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пятью странам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отношение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пятью странам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责任编辑 阎德学)

1968年“普韦布洛”号危机初期的美苏交涉*

梁志**

【内容提要】1968年“普韦布洛”号危机发生前后，约翰逊政府最高决策层依旧在很大程度上坚持“共产主义铁板一块”的观点，一致认为朝鲜此举的目的在于支持北越，苏联参与其中，甚至是主谋。于是，美国的第一反应便是寻求苏联的帮助，要求对方迫使朝鲜还船放人。苏联一面拒绝充当调停者，一面暗中规劝朝鲜尽快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然而，最终苏联的努力未见成效。此次美苏交涉充分表明：虽然中苏同盟破裂已成定局，但华盛顿依旧固守过往的冷战思维，深信苏朝越的对外战略是协调一致的；1960年代末，在中苏分裂和朝韩竞争的特定时期下，苏联这个社会主义超级大国已无力真正影响朝鲜外交政策的走向。

【关键词】“普韦布洛”号危机 美国 苏联

【中图分类号】D819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4-0130-(17)

1968年年初美国和朝鲜之间发生的“普韦布洛”号危机，是冷战时期美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重要事件。从中，人们可以看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如何应对地区危机，“共产主义铁板一块”的观念在约翰逊及其主要顾问脑海中是怎样地根深蒂固，苏联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朝鲜的外交决策。

由于难以获得有关外交档案，很长一段时间内，学者们无法详细考察“普韦布洛”号危机发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①2000年以后，美国通过《美国外交关系文件》

* 本文写作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冷战起源研究”（项目批准号：08JJDGJW 261）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计划重点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国际关系史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一期）（项目批准号：SZ201010028010）的资助。

** 梁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① B. C. Koh, “The Pueblo Incident in Perspective”, *Asian Survey*, vol.9, no.4(April 1969), pp.264-280; Alfred P. Rubin, “Some Legal Implications of the Pueblo Incident”, *Th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18, no.4(October 1969), pp.961-970; Paul R. Schratz, “A Commentary on the Pueblo Affair”, *Military Affairs*, vol.35, no.3(October 1971), pp.93-95; Michael J. Hamm, “The Pueblo and Mayaguez Incidents: A Study of Flexible Response and Decision-Making”, *Asian Survey*, vol.17, no.6(June 1977), pp.545-555.

(FRUS)和《解密文件参考系统》(DDRS),公布了大量涉及此次危机的档案文献,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也解密了部分相关外交文件。美国、韩国、日本、德国和中国等各国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此次危机,考察了美国最初的反应和对策、美朝板门店谈判的基本过程、朝鲜的战略意图以及苏联所扮演的角色,一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①2008年9月,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北朝鲜国际文献项目与北韩大学院联合召开了题为“朝鲜半岛的危机与对抗,1968—1969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公布了300件美国、朝鲜以及苏东国家的相关档案。^②2010年6月,北朝鲜国际文献项目与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又公布了一批有关“普韦布洛”号危机的多国档案文件,标题为“有关北朝鲜的新证据”。^③这些新史料的出现使进一步研究“普韦布洛”号危机成为可能。本文拟利用以上新近公开的美国、苏联和东欧国家档案文献,对以往学者们很少关注的“普韦布洛”号危机初期的美苏交涉问题加以评述。

① 国外学术界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Richard Mobley, “Pueblo”,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54, issue2(Spring 2001), pp.98-117; Mitchell Lerner, “A Failure of Perception: Lyndon Johnson, North Korean Ideology, and the Pueblo Incident”, *Diplomatic History*, vol.25, no.4(Fall 2001), pp. 647-675; Jeongwon Kim, “U.S. Policy on Pueblo Crisis in 1968: Focusing on Policy-making Process”, MA thesis,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2002; Mitchell Lerner, *The Pueblo Incident: A Spy Ship and the Fail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 Richard A. Mobley, *Flash Point North Korea: The Pueblo and EC-121 Crises*,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3; Mitchell Lerner, “A Dangerous Miscalculation: New Evidence from Communist-Bloc Archives about North Korea and the Crises of 1968”,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6, no.1(Winter 2004), pp.3-21; Bernd Schaefer, “North Korean ‘Adventurism’ and China’s Long Shadow, 1966-1972”,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44; Sergey S. Radchenko,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North Korean Seizure of the USS Pueblo: Evidence from Russian Archiv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47; David P. Houghton, “Reconstructing the U.S. Response to the Pueblo Hostage Crisis of 1968: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Portland, Oregon, July 2007; 黑川修司:“‘普韦布洛’号事件、美国的情报活动与1968年危机”,《东京女子大学纪要论集》57(1),第99—123页。从国内学术界观察,2000年《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4—1968年》第29卷第1部分朝鲜出版后,笔者最早利用这部分文献试图还原“普韦布洛”号危机的基本过程,接着又从国际危机谈判策略的角度考察了美朝板门店秘密谈判。(梁志:“‘普韦布洛’危机始末初探”,崔丕主编:《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69—189页;梁志:“国际危机谈判策略初探——以‘普韦布洛’号危机秘密谈判为例”,《国际论坛》,2008年第4期,第19—24页。)此后,东北师范大学的王爽和蒋华杰以及黑龙江大学的马德义分别考察了美朝谈判的行为特点、约翰逊政府危机之初的对策以及苏联面对危机的低调反应。(王爽:《“普韦布洛”号危机与美朝谈判》,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5年;蒋华杰:“‘普韦布洛’事件——有限能力、局势不可控因素影响下的危机决策及对等法则的失效”,2006年,未刊稿。)

② James Person, Mitch Lerner, etc. (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September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wilsoncenter.org/index.cfm/topic_id=230972&fuseaction=topics.publications&group_id=474507

③ James Person (ed.), *New Evidence on North Korea*, June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wilsoncenter.org/index.cfm/topic_id=230972&fuseaction=topics.publications&group_id=474507

危机发生前后美国的惯性认知

1952年10月24日,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下令将武装部队安全局(Armed Forces Security Agency, AFSA)更名为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使命是在国防部长的领导下依据美国通讯情报委员会(United States Communications Intelligence Board, USCIB)制定的政策收集和撰写通讯情报。^①很快,国家安全局便在世界范围内设立了2000多个监听站。但这些监听站的地理分布极不均衡,非洲只有两个,南美洲则一个也没有。为了解决该问题,国家安全局仿效苏联,将退役货船用于情报收集,使之成为流动监听站。1965年,海军部仿效国家安全局的做法,单独发起了一个将轻型货船改造为“辅助总体环境考察船”(Auxiliary General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GER)的计划,“旗帜”号(AGER-1)、“普韦布洛”号(AGER-2)和“棕榈滩”号(AGER-3)相继诞生,主要任务是在目标国家的近海收集信号情报和水文资料。国防部之所以批准该计划,根本原因在于相信美苏之间在互派间谍船问题上存在“对等原则”——只要对方间谍船不侵入己方领海,则听之任之;即便对方间谍船驶入己方领海,也不发动攻击,仅要求其重返公海。军方领导人特别是情报部门首脑还认为,其他共产党国家在苏联的“约束”下同样也会遵守这一原则。由于对“对等原则”深信不疑,加上资金紧张,船只改造、人员配备和试航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远距离无线电导航系统误差较大,通讯设施性能不佳,信号情报收集设备和军事装备安装位置不当,紧急破坏方面准备不足;船员年龄偏低且缺少训练,翻译人员水平欠佳;试航时设备多次出现故障并遭到敌国骚扰等现象没有受到决策者应有的重视。^②不过,对“普韦布洛”号来说,更糟糕的是首次航行任务的提出及其风险评估。

从1966年秋天开始,朝鲜非军事区(Demilitarized Zone, DMZ)武装冲突的次

① “Memorandum From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Smith 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Council(Lay)”, December 10, 1951, in *FRUS*, 1950-1955,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Security 1950-1955,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7, p.229; “Editorial Note”, in *FRUS*, 1950-1955,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1950-1955, p.233; “Memorandum From President Truman to Secretary of State Acheson and Secretary of Defense Lovett”, October 24, 1952, in *FRUS*, 1950-1955,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1950-1955, pp.350-355;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Canine)an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ilitary Services and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Secretary of Defense Lovett”, November 20, 1952, in *FRUS*, 1950-1955,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1950-1955, pp.362-366.

② Mitchell Lerner, *The Pueblo Incident: A Spy Ship and the Fail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6-43, 64-65; Edwin B. Hooper, “The Pueblo Incident: The skipper and His Ship”, *Naval History*, vol.2, issue4 (Fall 1988), p.53; Lloyd M. Bucher, “The Pueblo Incident: Commander Bucher Replies”, *Naval History*, vol.3, issue1 (Winter 1989), pp.44-50.

数明显增加。^①鉴于此，1967年下半年，“联合国军”司令兼驻韩美军司令查尔斯·博恩斯蒂尔第三（Charles H. Bonesteel III）、美国情报委员会（U.S. Intelligence Board, USIB）和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均建议或呼吁情报机关加强对朝鲜军事活动的侦查，对朝鲜发动“颠覆和常规战争”的能力与意图作出评估。^②考虑到朝鲜电子情报收集的优先性，美国驻日海军司令提议，将朝鲜作为“普韦布洛”号处女航的主要目标，任务为体察朝鲜东海岸电子情报收集环境，分析朝鲜海军活动情况，监视苏联海军在对马海峡的动向，试探苏朝对公开情报收集活动的反应，报告苏朝军队的调动情况并评估自身能力。期间，“普韦布洛”号要在朝鲜海岸进行长达17天的作业，有时必须深入距离朝鲜海岸约13海里处，并在“极为危险”的元山港附近收集电子情报。军方对此次行动的危险程度进行了评估。评估工作总体上来说进行得较为仓促，原因是至少有四级共6个国家机构参与其中，而时间却只有短短的12个工作日（其间又恰逢圣诞节），且同期还有808项敏感的军事情报收集任务接受评估。在考虑是否批准这项行动计划时，各级审查机关均将以下假设作为“不容置疑”的评估前提：朝鲜会遵守公海法，允许外国军舰在其宣称的十二海里领海之外作业。最终，此次行动被认定为“最低风险”（minimal risk）。1968年1月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告知驻太平洋美军司令，“普韦布洛”号行动计划获准。^③

1月11日，“普韦布洛”号驶离日本佐世保港，开始执行任务。23日上午，“普韦布洛”号像以往一样来到元山港附近收集情报，一切都非常平静。午饭时分，航信士官发现远方一艘朝鲜SO—1型猎潜舰艇正在全速靠近。在距“普韦布洛”号约500码处，猎潜舰艇开始作顺时针环行，并以国际旗语询问“普韦布洛”号的国籍。船长布赫（Lloyd Bucher）不予理睬。15分钟后，另有三艘苏制朝鲜P—4型鱼雷艇高速靠拢过来。“普韦布洛”号船员仍然将其当成惯常的骚扰。突然，朝鲜猎潜舰艇用旗语命令道：“停船，否则我就开火。”“普韦布洛”号答复说：“我船处于国际水域，欲在此停留至明天。”没过多久，两架苏制朝鲜米格战斗机飞至“普韦

① “Intelligence Memorandum”, November 8, 1966,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0, pp.209-210;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eptember 15, 1967,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274-275.

② “Memorandum From Alfred Jenkin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Rostow)”, July 26, 1967,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261-266; Richard Mobley, *Flash Point North Korea: The Pueblo and EC-121 Crises*, p.27;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14.2-67”, September 21, 1967,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283; “Explanation of the USS PUEBLO’s Reconnaissance Mission off North Korean Waters and a Description of Its Subsequent Capture”, Undated, CK3100151052, *DDRS*.

③ Richard Mobley, *Flash Point North Korea: The Pueblo and EC-121 Crises*, pp.24-25, 27-35, 41.

布洛”号上空，另外还有一艘猎潜舰艇和一艘鱼雷艇驶出元山港，前往事发地点。朝鲜方面很快做好了登船准备，“普韦布洛”号加速逃跑，船员们着手进行紧急破坏。朝方开火，“普韦布洛”号被俘，船员一死四伤。^①

值得深思的是，危机发生后，美国主要决策者并未因此怀疑“对等原则”的有效性，而是继续沿着类似于“共产主义铁板一块”的思路从各种角度将危机与越战联系起来：约翰逊总统指出，东方的越南、朝鲜和西方的柏林同属一体，“普韦布洛”号危机与越战密切相关；^②在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看来，朝鲜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在越南问题上向美国施压，并开辟第二战场；^③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声称，朝鲜半岛危机的背景是越共加紧攻击美军；^④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沃尔特·罗斯托（Walt W. Rostow）则认为，朝鲜攻击“普韦布洛”号可能不仅与北越的军事行动有关，而且与共产党在太平洋地区的许多行为相呼应；^⑤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M. Helms）的结论是，朝鲜此举意在阻止韩国继续向越南派兵，扰乱美国在越南的行动。^⑥与这一主流看法直接相关的另一种获得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朝鲜俘获“普韦布洛”号的行动蓄谋已久，苏联是知情者，甚至还可能是主谋。^⑦于是，美国一面向事发地大规模调兵遣将，进行武力威胁，^⑧一面要求苏联向朝鲜施压，迫使对方还船放人。

① Mitchell Lerner, *The Pueblo Incident: A Spy Ship and the Fail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43,72-82; “Chronology of Diplomatic Activity in the Pueblo Crisis”, October 1, 1968, CK3100150480, *DDRS*; “Intelligence Chronological List of Events Leading up to the North Korean Seizure of the USS PUEBLO and Its Crew”, Undated, CK3100467222, *DDRS*; “A Day-by-day Chronological Account of the Seizure of the USS PUEBLO and Its Crew by North Korean Forces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off North Korea and U.S. Activities in Its Aftermath”, December 12, 1968, CK3100548745-CK3100548748, *DDRS*.

② “Notes of Meeting”, January 23,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462-463; “Notes of Meeting”, January 25,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516.

③ “Notes of Meeting”, January 24,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478.

④ “Notes of Meeting”, p.516.

⑤ “Notes of Meeting”, p.516.

⑥ “Memorandum From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Helms to Secretary Defense McNamara”, January 23,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464-465; “Summary Minutes of Meeting”, January 24,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469; “Notes of Meeting”, January 24,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480.

⑦ “Summary Minutes of Meeting”, January 24,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470-471; “Notes of Meeting”, January 24,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476-478, 480; Notes of Meeting”, January 25,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506; “NSC Meeting Held January 24, 1968, at 1: 00 p.m. in the Cabinet Room”, January 24, 1968, in James Person, Mitchell Lerner, etc.(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6.

⑧ Richard Mobley, “Pueblo”, pp.98-107; Hanson W. Baldwin, “Call-Up: A First Step”,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6, 1968, p.6.

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话

1月23日危机发生当天，腊斯克紧急致电驻苏联使馆，要求使馆立即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或其他可能见到的最高级别的苏联官员会面，主要谈三方面内容：其一，陈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以“最强烈的语气”敦促苏联促使朝鲜立即归还“普韦布洛”号，妥善照顾伤员；其二，向苏联人郑重表明此事件已令美朝关系急剧恶化，建议莫斯科向朝鲜转达美国的立场和“最强烈的抗议”，并从中进行斡旋，以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其三，适当的时候，提醒苏联人，他们的拖网渔船也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从事与“普韦布洛”号类似的活动。^①美国驻苏大使卢埃林·汤普森（Llewellyn E. Thompson）接到电报后立即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取得了联系。对方答复说，驻韩美军才是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根源，此次危机与苏联无关，苏联人不会介入其中。^②赫尔姆斯分析道，库兹涅佐夫并未咨询任何人或请示上级便一口拒绝了美国的斡旋请求，这表明苏联是知情者。麦克纳马拉也作如是观，认为如果事先并不了解此事，苏联人不可能如此迅速地作出反应。^③可以说，美苏之间的首次交涉令美国政府高层更加坚信苏联与朝鲜合谋抓捕了“普韦布洛”号。

虽然目前仍无法确切知道是库兹涅佐夫“自作主张”还是苏联决策者早有授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苏联事前并不知情，更谈不上是主谋。危机发生后，苏联要求朝鲜给予说明。24日，朝鲜外交部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和代理大使召集到一起，向他们通报了抓捕“普韦布洛”号的情况，希望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全力支持朝鲜的行动和立场，共同谴责美帝国主义。得知情况后，苏联认为根据有关海上航行的《1958年日内瓦公海公约》的相关规定，理应护送进入本国领海的他国战舰重返公海。即使是按照国际惯例，朝鲜扣船抓人的做法也是过激的，比美国人的做法更不可接受。但无论如何，苏联仍然决定在对美交涉中坚决站在朝鲜一边。^④

26日，汤普森秘密会见葛罗米柯，通报了约翰逊总统当天发表的有关“普韦布

①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January 23,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459-460.

② “Notes of Meeting”, January 23,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462.

③ “Summary Minutes of Meeting”, January 24,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470; “Notes of Meeting,” January 24,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480.

④ “Report from Embassy of Hungar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Hungarian Foreign Ministry, 30 January 1968”, in James Person, Mitchell Lerner, etc.(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56; “Information of the Foreign Ministry of the DPRK Given by Comrade Kim Tae-bong,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of the DPRK, 9:00 p.m. to 9:40 p.m., for the Ambassadors and Acting Ambassadors of all Socialist Countries Accredited to the DPRK, 24 January 1968, ” in James Person, Mitchell Lerner, etc.(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8.

洛”号危机的讲话内容。^①第二天，葛罗米柯正式给予答复，大体内容如下：美国情报船是在朝鲜领海被俘的，责任完全在美国；对华盛顿而言，要想解决危机，必须创造良好的氛围，而不是采取过激行为来加剧紧张局势；迅速解决危机符合美朝双方的利益。^②或许是为了防止美国对这一略显强硬的回应作出错误的判断，26日当天在与美国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进行私人谈话时，苏联外交部的津丘克明确表示：莫斯科对此次危机事先并不知情，更没有推动朝鲜抓捕“普韦布洛”号；苏联对事件的发生表示遗憾；美国一定要保持平静。苏联非常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危机。而且，外交也确实有可能成为可资利用的方式；美国派出航空母舰是彻头彻尾的示武行为，绝非外交手段。^③

美国国务院详细分析了苏联的反应，认为苏联人不愿意就“普韦布洛”号危机同美国进行官方交涉。然而，美国仍然要与苏联保持密切联系，向对方强调事态的严重性和美国目标的有限性，避免产生误解。^④为了贯彻这一政策，28日腊斯克致函葛罗米柯，指出“普韦布洛”号被俘于公海，美国正在谋求和平解决危机，希望苏联从中斡旋。接到信后，葛罗米柯再次敦促美国不要向朝鲜施压，否则危机将难以化解。虽然苏联不是调停者，但既然美国请求苏联帮忙，就应充分重视苏联的意见。作为具体建议，葛罗米柯要求美国将“企业”号航母南移，以表明减少对朝鲜的压力。^⑤

与此同时，苏联也在试图劝说朝鲜和平解决危机。苏联人指出，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获得了希望获得的一切，朝鲜应寻找合适的机会还船放人。否则，如果危机长期得不到解决，朝鲜乃至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声望将随之下降，约翰逊政府甚至会因此选择动武，到那时形势将变得十分危险。朝鲜人答复说，如果美国人不采取极端手段进行挑衅和威胁的话，朝鲜希望和平解决危机，归还船只和船员。

① 26日，约翰逊就朝鲜问题向全国发表演说，告知公众美国对“普韦布洛”号危机的反应是：一方面，将此事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继续利用一切可行的手段寻求立即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结果就是由联合国安理会说服朝鲜还船放人，停止对韩国的“侵略”；另一方面，采取预防性措施，确保美军能够应付朝鲜地区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但并未因此削减在越南的军事力量。详情参见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Lyndon B. Johnson, Book I, 1968-1969*, p.77. 汤普森与葛罗米柯的谈话记录参见“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26,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520-521.

②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27,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533-534.

③ “Telegram from Ambassador Thompson (Moscow 2588), 26 January 1968,” in James Person, Mitchell Lerner, etc.(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32.

④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January 28,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549.

⑤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29,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552-553; “Notes of Meeting”, January 30,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573.

但事到如今，面对美国的威胁，朝鲜人不能这样做。^①

不过，事态很快发生转折。27日，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方代表朴正国（Pak Chung-kuk）邀请中立国监察委员会（Neutral Nations Supervisory Commission, NNSC）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代表团代理团长举行会谈，请求他们将下列信息传递给瑞士代表团团长：“普韦布洛”号侵入朝鲜领海的行为违反停战协定，如何处置被俘船只和船员完全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内政。美帝国主义本应致歉，可是它却企图动武，以核武器威胁朝鲜。假若美国向朝鲜发动进攻，试图夺回船只和船员，船员们将性命难保。如果美国承认“普韦布洛”号船员是战犯并正式同朝鲜协商或讨论此事，问题还是很有可能获得解决的。瑞士代表团团长很快将这一消息转告军事停战委员会美方代表约翰·史密斯（John V. Smith）。^②收到信息后，国务院马上指示驻韩使馆作出如下答复：约翰逊总统在26日的演说中已明确表示“我们将继续竭尽全力寻求立即和平地解决该问题”，希望朝鲜尽快安排军事停战委员会中的双方代表举行公开或秘密会谈，讨论危机解决方案。^③月底，美朝正式决定命令军事停战委员会中的两国代表在板门店共同安全区（Joint Security Area）举行秘密会谈。^④

在朝鲜做出缓和姿态后，苏联再次告知朝鲜人，他们已经在维护主权方面采取了坚决措施，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在巩固这些成果的同时，应通过将“普韦布洛”号船员驱逐出朝鲜，以表明自己和平解决危机的愿望。此举不会被解释为软弱，而会被认为是负责任的做法，有助于提高朝鲜的国际地位。但朝鲜人的态度仍十分强硬，声称他们希望和平解决危机，但前提是美国放弃武力威胁，承认犯下的罪行。如果美国人继续发出威胁，攻击朝鲜，朝鲜必将还击。^⑤

回过头来，苏联继续促使美国减少对朝鲜的压力。2月3日，葛罗米柯召见汤普

① “Report from Embassy of Hungar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Hungarian Foreign Ministry, 30 January 1968,” in James Person, Mitchell Lerner, etc. (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56.

②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Ambassadors of the CSSR(Czechoslovak Socialist Republic) Comrade Holub, an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Poland, Comrade Naperei, on 29 January 1968, from 2.30 p.m. to 4.00 p.m.,” in James Person, Mitchell Lerner, etc.(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49;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27,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536-537.

③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 January 28,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537-538.

④ “Editorial Note”,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570-571; “Chronological Events Regarding North Korean Seizure of the USS Pueblo”, Undated, CK3100121309-CK3100121312, *DDRS*.

⑤ “Memorandum on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USSR Ambassador, Comrade Sudarikov, on 16 February 1968 between 16:15 and 17:30 hours”, in James Person(ed.), *New Evidence on North Korea*, Document 60; “Letter Relaying Information Shared between USSR Ambassador in Prague c. S.V. Cervenenko and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c. V. David about the Situation in Korea, February 1968,” in James Person(ed.), *New Evidence on North Korea*, document 61.

森，温和地抱怨美国海军在朝鲜附近集结的行为。同一天，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也向汤普森指出，如果美国“不进一步采取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危机能够获得解决。“（美国的）武力威胁只会使苏联难以实施干预。假使美国真的动武，苏联将必须作出反应”。朝鲜人不可能在放弃致歉要求的情况下同意解决危机。汤普森建议国务院接受葛罗米柯的看法，削减部署在朝鲜附近的海军力量。^①6日，约翰逊致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声称美国集结军队完全是为了应付朝鲜的“挑衅”。此后美国非但不会再增兵，还会将一艘航母略微南移。柯西金一面继续指责美国的示武行为，一面对板门店谈判表示满意，认为美朝直接对话胜过第三方调停，希望危机能够立即得到化解。^②

2月中旬，美国在板门店谈判中提出“先放人，后调查”的建议，而朝鲜坚持认为放人的前提是美国为“普韦布洛”号在朝鲜领海的间谍和敌对活动道歉并保证永不再犯，双方僵持不下。无奈之下，美国再次求助苏联。24日，国务院致电驻苏使馆，要求汤普森会见葛罗米柯，表明如下立场：美国始终保持着极大的克制，希望能够迅速和平地解决危机；华盛顿接受了苏联的建议，对军事部署作出了局部调整；美朝已经进行了八次会谈，美国提出了“先放人，后调查”方案，朝鲜不同意。详细的会议记录已交给多勃雷宁。美国将在下次会谈作出妥协，承诺可以将船员先交由中立方看管；立即解决危机符合美苏两国利益；朝鲜不时发出强硬战争言论，美国正在约束韩国，希望苏联也能约束朝鲜。结果，葛罗米柯仅表示希望危机能够尽早获得解决，并未作出其他承诺。^③

3月14日，腊斯克在致约翰逊的备忘录中指出，目前最佳政策选择就是把谈判难以取得进展的责任推卸给朝鲜。为此，美国应提出以下建议：只要朝鲜释放船员，美国将承认“普韦布洛”号执行的是收集情报的任务，保证继续命令本国舰只在距朝鲜海岸12海里以外的海域航行，为“普韦布洛”号可能违反命令进入距朝鲜海岸12海里范围内表示遗憾。^④21日，美朝第12次会谈举行，美方提出了这一建议。^⑤

①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3,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591-592;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5,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606.

②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 February 6,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609-610;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6,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611-612.

③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 February 24,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642-644;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26,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645-646.

④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to President Johnson”, March 14,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665-668.

⑤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21,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670-671.

五天后，汤普森再次与葛罗米柯会谈。葛罗米柯声称，苏联并不清楚朝鲜是否会对美国最近的建议作出反应，非常高兴看到美朝两国能够在相对平和的气氛中举行会谈，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美国不愿意承认事实。^①这表明莫斯科在与美国交涉的过程中依然回避向朝鲜施压的问题，并反过来指责美国的不当做法是导致谈判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苏联一直在暗中规劝朝鲜缓和态度，尽早释放船员，但未取得真正的成效。2月，朝鲜政府明确告知人民，美国向朝鲜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25日之前还船放人，朝鲜必须做好迎战的一切准备。为此，平壤居民实施了撤离计划。^②这一切令苏联领导人十分不满。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4月份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指出：朝鲜抓捕“普韦布洛”号的行为似乎过于激进了，正确的做法是建议或迫使进入本国领海的外国军舰离开。由于美国进行大规模军事调动，苏联必须公开声援朝鲜，迫使华盛顿放弃示武政策。在苏联的压力下，美国将“企业号”航母南移。同时，苏联也在劝说朝鲜保持克制，尽快放人。令人遗憾的是，朝鲜坚持自己的极端立场，对人民进行战争宣传，积极备战。1月31日，金日成致函柯西金，指责美国对朝鲜和苏联进行战争威胁，要求苏联在战争开始后向朝鲜提供援助。朝鲜这是在利用同盟条约胁迫苏联支持它单独制定并实施的计划。苏联没有给金日成正式的答复，仅在随后表明苏朝同盟条约是防御性的，目前苏联对朝鲜援助的问题必须仔细协商。朝鲜应立即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危机，否则必将失去在危机之初获得的巨大政治利益。非但如此，朝鲜还拒绝向苏联通报与美国会谈的情况与会谈的目标，这对和平解决危机非常不利。不过，在苏联的劝说下，朝鲜最终发表了和平声明，开始向苏联大使通报美朝谈判的进展情况，并淡化了战争宣传。总的来说，苏联在抵制美国武力威胁和劝说朝鲜保持克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这有利于苏联自身的利益。^③

然而，情况绝非勃列日涅夫所说的那样乐观。4月中下旬，朝鲜军事分界线以南地区连续发生了几次武装冲突。从4月份开始直至5月初，朝鲜全国始终处于战备

①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26,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674-675.

② “Memorandum on an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Report] of 24 February and 26 February 1968 from Helga Picht, the Embassy of the GDR in the DPRK, Pyongyang”, in James Person, Mitchell Lerner, etc. (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132.

③ “Excerpt from Leonid Brezhnev’s Speech at the April (1968) CC CPSU Plenum Regarding the Pueblo crisis: ‘On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on the Struggle of the CPSU for the Un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9 April 1968”, in James Person, Mitchell Lerner, etc. (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139.

状态，政府公开宣传美国随时可能发动战争。^①5月6日，柯西金会见朝鲜驻苏联大使谭斗焕（Ten Du Hwan）。谭斗焕一面声称朝鲜坚持和平统一的立场，一面指责“普韦布洛”号危机以来美国和韩国加紧进行讹诈、挑衅和备战。在他看来，约翰逊与朴正熙会谈^②后，美韩两国对朝鲜发动战争的可能性进一步上升，朝鲜必须做好保卫社会主义胜利果实的准备。为什么朝鲜选择军事和经济建设并重的发展道路，原因就在于此。柯西金答复道，苏联理解朝鲜的处境，但无法向朝鲜提供外交支持，因为莫斯科只能通过公开出版物了解一点儿事态进展的相关信息，不清楚朝鲜的考虑和计划。^③31日，金日成对苏联人说，只要美国不正式道歉，朝鲜绝不放人。^④6月，朝鲜外交部向民主德国使馆提交了一份题为“将美国占领军驱逐出南朝鲜联合行动月（1968年6月25日—7月25日）”的信息报告，并详细说明了朝鲜组织群众开展反美活动的计划。^⑤10月中旬，金日成在接见蒙古议会代表团时指出，韩国上百万全副武装的军队正在准备对朝鲜发动战争，朝鲜做好了随时迎战的准备。此时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帝国主义。^⑥以上种种迹象显示，苏联人的规劝并没有改变朝鲜对外政策的基本走向。

或许约翰逊政府也意识到了苏联并不能发挥太大的作用，因此4月份以后，美国不再将苏联作为外交的主要突破点。美朝板门店秘密谈判就这样一直僵持了10个月。12月17日第26次会谈举行，美国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美国提出“另签”（美国在接收船员的单据上签字，试图让朝鲜误以为美国也同时签署了朝鲜提供的道歉文件，诱使朝鲜放人）和新的“有条件道歉”方案（美方在朝鲜文件上签字的条件是事先发表正式声明，澄清美国的立场——美国政府不认为“普韦布洛”号从事过

① “Political Report No. 21 from Ambassador Henke to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rague, ‘No. 21 of the Work Plan Prepared by M. Holub’, 4 June 1968,” in James Person, Mitchell Lerner, etc.(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160.

② 4月17日，应美国的邀请，韩国总统朴正熙赴火奴鲁鲁与约翰逊举行会谈，讨论了韩国安全的问题。

③ “Record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USSR A.N. Kosygin with the Ambassador of the DPRK in Moscow Ten Du Hwan, 6 May 1968”, in James Person, Mitchell Lerner, etc.(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154.

④ “Memorandum on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First Secretary of the Embassy of the USSR in the DPRK, Comrade Zvetkov, and Comrade Jarck on 26 July 1968 between 14:30 and 16:15 in the USSR Embassy, 29 July 1968,” in James Person, Mitchell Lerner, etc.(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162.

⑤ “Note on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Director of the First Department of the Foreign Ministry of the DPRK, Comrade Ri In-gyu, on 15 June 1968, from 4:00 p.m. to 5:30 p.m., Embassy of the GDR in the DPRK, 18 June 1968”, in James Person, Mitchell Lerner, etc.(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161.

⑥ “Note on a Club Meeting of the Ambassadors and Acting Ambassadors from the GDR, USSR, Czechoslovakia, Hungary, Poland, Mongolia and Bulgaria on 24 October 1969 in the USSR Embassy”, in James Person(ed.), *New Evidence on North Korea*, document 73.

非法活动，而朝鲜一方也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除非证实“普韦布洛”号确实进入朝鲜领海从事非法活动，否则美国政府不能为此道歉。美国政府同意签字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想要使船员获释），告知朝鲜必须在圣诞节前选择其一。如果都不接受，圣诞节后美国将撤回这两个方案，到那时朝鲜就只能等待与新一届美国政府交涉了。结果，朝鲜接受了新的“有条件道歉”方案。^①23日，朝鲜释放了82名船员并归还了第83名船员的遗体，危机得以解决。^②

美苏交涉表象的背后

透视“普韦布洛”号危机初期美苏交涉的全过程，人们不仅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铁板一块”的观念在美国主要决策人的脑海中是怎样的挥之不去，还能够同时窥见中苏分裂、苏朝结盟和大国尊严令苏联陷入了怎样的决策困境。

危机后，美国的第一个外交行动便是要求苏联敦促朝鲜还船放人。对华盛顿而言，这样的举动可以说是本能的反应。因为约翰逊等人认定，作为“当事人”的苏联，面对冲突升级的危险可能会选择后退，更重要的是只有苏联才有能力影响朝鲜的外交政策。结果，由于美国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与苏联的交涉并没有起到促进危机迅速解决的作用。美国作出以上误断绝非偶然，因为约翰逊政府一贯将朝鲜半岛的局势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1966年秋以后，朝鲜非军事区武装冲突加剧，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阿尔弗雷德·詹金斯（Alfred LeS. Jenkins）分析道：朝鲜加强攻击的目的在于表明对意识形态伙伴越南的支持，至少也让国际社会看到朝鲜在反美方面同中国站在一起。^③国务院情报和研究署（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的看法是，朝鲜加强“渗透”和“颠覆”活动，意在实现武力统一并阻止韩国向越南增兵。^④博恩斯蒂尔第三也持类似观点，认为朝鲜在非军事区加紧攻击美韩军队的目的之一，是阻止韩国继续向越南派兵、推动朝鲜半岛“共产化”。^⑤当其

① “Action Memorandum From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Katzenbach) to President Johnson,” December 3,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726-731;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 December 11,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731-734;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ecember 17, 1968,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734-735.

② “Editorial Note”,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p.740-744.

③ “Memorandum From Alfred Jenkin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Rostow),” July 26, 1967,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262.

④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eptember 15, 1967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275.

⑤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Defense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Foster) to Secretary of Defense McNamara”, December 7, 1967,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1, Korea, p.299.

他地区发生危机时，美国的情报和决策部门亦作出了大致相同的判断。1964年1月9日，巴拿马人民因美国中学生污损巴拿马国旗而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中央情报局警告说，古巴向巴拿马人提供了武器，支持当地的亲卡斯特罗势力，企图发动政变。刚刚上任的约翰逊政府据此得出结论，在这场危机中最可怕的是苏联和古巴的野心，一定不能让巴拿马成为“第二个古巴”。^①一年多以后，多米尼加发生全国性政治动乱。约翰逊政府亦宣称：这场危机的根源是“外部共产主义扩张”，古巴训练的恐怖分子正在推波助澜，意欲建立共产党独裁统治。意识形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抵抗中苏侵略，因此必须出兵干预，“防止西半球出现另一个古巴。”^②

这一切告诉我们，虽然约翰逊政府努力缓和同苏联的关系，也真切地看到了中苏同盟分裂的现实，但并不相信苏联彻底放弃了“输出革命”的企图，更不相信中苏关系破裂后的“共产主义世界”已分崩离析。^③约翰逊及其主要顾问认为，“共产主义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整体，苏联依旧充当着社会主义阵营首脑的角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至少是除中国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如同以往一样，服从苏联的战略安排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外扩张”的总目标。正因为如此，美国决策者才习惯性地把世界各地发生的动荡不安和反政府行为统统看成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全球斗争的一部分，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行为统统看成是受苏联指使、以削弱美国为最终目的的国际阴谋。^④

如果说美国的认知与反应之间存在着明确的逻辑联系，那么苏联的对策则显得

① Michael E. Latham, “Imperial Legacy and Cold War Credibility: Lyndon Johnson and the Panama Crisis”, *Peace & Chance*, vol.27, No.4 (October 2002), pp.508-509.

②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 to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Carter)”, April 28, 1965, in *FRUS*, 1964-1968, vol.32, Dominican Republic; Cuba; Haiti; Guyan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5, p.85;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Raborn and President Johnson”, April 29, 1965, in *FRUS*, 1964-1968, vol.32, Dominican Republic; Cuba; Haiti; Guyana, pp.89-90; “Editorial Note”, in *FRUS*, 1964-1968, vol.32, Dominican Republic; Cuba; Haiti; Guyana, p.102; “Draft Memorandum of Meeting”, May 15, 1965, in *FRUS*, 1964-1968, vol.32, Dominican Republic; Cuba; Haiti; Guyana, p. 176;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Lyndon B. Johnson, Book I, 1965*, pp.469-474.

③ 政治事务副国务卿尤金·罗斯托 (Eugene Rostow) 曾在 1967 年 5 月警告说：“苏联会在世界上的诸多薄弱地带继续（或者我应该说变本加厉地？）推行冒险主义”。参见 John Dumbrell, *President Lyndon Johnson and Soviet Communism*,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34; 腊斯克 1968 年 1 月 31 日同国会领导人会谈时表示，在他看来，此时苏联对北朝鲜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参见“January 31, 1968 Meeting of Johnson and Congressional Leaders to Discuss Pueblo Incident”, January 31, 1968, CK3100196847, *DDRS*, Gale Group, 2010; 中央情报局 1967 年 9 月的一份长达 500 多页的分析报告认为，由于中苏对外政策的改变，当年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共产党而言，民族主义的情绪与对于苏联的经济依赖相比显得并不重要。参见“The Sino-Soviet Struggle in the World Communist Movement since Khrushchev’s Fall, Part I”, September 1967. available at: <http://www.foia.cia.gov/cpe.asp>

④ Mitchell Lerner, *The Pueblo Incident: A Spy Ship and the Fail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232.

“自相矛盾”：一面在私下里抱怨和指责朝鲜“擅自行事”、行为过激、极端顽固，一面在对美交涉中全力支持朝鲜；一面拒绝接受美国的调停请求，一面暗中规劝朝鲜尽早释放美国船员、和平解决危机。恰恰是这些看似无序的反应显示出苏联决策者面对复杂局势时决策的被动与无奈。

1950年代中后期，由于赫鲁晓夫积极推行“三和路线”，重点发展核武器，以及中苏军事合作的日益加强，在苏联决策者心目中，朝鲜的战略重要性明显下降。^①不过，这种趋势并未持续太长时间。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后，中苏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开始出现分歧。最终，苏联决定暂时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研制核武器的技术材料，在中印冲突中保持中立，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迅速恶化。^②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和北京都希望朝鲜能够在这场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之争中支持自己。相应地，朝鲜也转而实行等距离外交，于1961年7月相继签订了《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③

1962年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将中苏的对外战略分歧进一步凸显出来，^④此时朝鲜再难维持在中苏之间不偏不倚的立场。是年秋天，当中国尖锐地批评苏联在古巴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时，金日成却对赫鲁晓夫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手法大加赞扬。11月，金日成向赫鲁晓夫提出巨额无偿军事援助的要求，遭到对方拒绝。于是，平壤反过来和北京一道批评苏联的“修正主义”，而莫斯科则针锋相对地指责朝鲜对“主体”思想的宣传只不过是为了掩饰亲华态度而已，苏朝关系随之滑向低谷。1964年10月苏联领导人发生更迭，但中苏两党的和解尝试仍旧以失败告终，这一切为苏朝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1965年2月，金日成与柯西金举行会谈，请求苏联向朝鲜提供总额为1.5亿卢布的无偿军事援助，柯西金表示同意。此后三年，苏联对朝鲜的援助额显著增加。在此期间，为消除苏联对朝鲜战争宣传的

① Sergey S. Radchenko,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North Korean Seizure of the USS Pueblo: Evidence from Russian Archives”, p.2.

② 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30—34页；沈志华：“难以弥合的裂痕：苏联对中印冲突的立场及中苏分歧公开化（1959—1960）”，《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5-27页；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283-315页。

③ 沈志华：“‘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续（1946—196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第184-188页。

④ 李丹慧：“走向分裂：从暗中斗争到公开论战——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二”，《史学集刊》2006年第6期，第58-61页。

担心，获取更多的援助，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多次保证不再谋求武力统一。^①

“普韦布洛”号危机发生后，苏联的外交决策目标大体定格为既要维护超级大国的尊严，又要防止战争的爆发。前者要求苏联绝不能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必须支持和保护朝鲜这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小兄弟”；后者则意味着一定要迫使美国放弃武力威胁，劝说朝鲜保持克制。于是，莫斯科一边拒绝充当调停人，鼎力声援朝鲜，一边公开推动美国缓和紧张局势，私下规劝朝鲜尽快归还船员和船只。应该说，苏联的对美外交基本上是成功的，部分地是由于苏联较为强硬的态度和苏朝同盟的存在，使华盛顿彻底放弃了动武的念头。^②但另一方面，在面对朝鲜这一几乎完全自行其是的盟友时，苏联的外交却显得无能为力：朝鲜未与苏联协商便抓捕了“普韦布洛”号，苏联只得被迫应付一场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危机。这时，苏联非但不能疏远朝鲜，反倒要在对美交涉中无奈地站在朝鲜一边。虽然苏联一再苦口婆心地劝说朝鲜尽快和平解决危机，可朝鲜执意将美国正式道歉作为释放船员的前提条件，甚至拒绝向苏联提供美朝板门店秘密谈判的记录，继续进行反美战争宣传。即便如此，苏朝关系也并未因此趋于恶化，苏联的援助依旧源源不断地流向朝鲜。^③为什么会出出现这样一种同盟内部两国间的实力差距与决策回旋余地不成正比的局面呢？主要是因为此刻朝鲜在苏联对外战略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1960年代下半期，中苏之间的矛盾和竞争愈演愈烈，莫斯科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首领地位已极不稳固，无论如何不能再失去朝鲜的意识形态支持；另一方面，朝鲜半岛是东西方对抗的前沿阵地，1965年后韩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迅速增长，南北方的“和平竞赛”日益激烈，因此苏联必须向朝鲜提供大量援助，以尽可能地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持自身作为社会主义超级大国的威信。

① Sergey S. Radchenko,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North Korean Seizure of the USS Pueblo: Evidence from Russian Archives”, pp.7-12; “Record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oviet Foreign Minister Andrei Gromyko and North Korean Foreign Minister Pak Song Ch’ol, 9 April 1966”, in Sergey S. Radchenko,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North Korean Seizure of the USS Pueblo: Evidence from Russian Archives”, pp.53、55; “Record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A.A. Gromyko and Deputy Chairman of the Cabinet of Ministers,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DPRK Comrade Pak Song-ch’ol 20 November 1967”, in Bernd Schaefer, “North Korean ‘Adventurism’ and China’s Long Shadow, 1966-1972”, pp.43-45; 李丹慧：“失去的机遇？——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两党和解的新尝试”，《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8期，第21-34页。

② 下面这段约翰逊总统的原话很好地概括了美国的这一考虑：“我们并不想扩大战争。我们已经意识到北朝鲜同中国和苏联之间签订了共同安全条约。我们知道参与一场战争比摆脱一场战争要容易得多。”参见“January 31, 1968 Meeting of Johnson and Congressional Leaders to Discuss Pueblo Incident”, January 31, 1968, CK3100196819, *DDRS*。

③ Sergey S. Radchenko,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North Korean Seizure of the USS Pueblo: Evidence from Russian Archives”, p.21.

【Abstract】 Supreme policy-maker of Johnson administration still held on to “communism is monolithic” to a large extent before and after the *Pueblo* Crisis of 1968, believed that North Korean purpose was to support North Vietnam, Soviet Union was insider, even chief plotter. Therefore, U.S. turned immediately to the Soviet Union to look for solutions, and request it to force DPRK to return the *Pueblo* and its crew. On the one hand Soviet Union refused to act as mediator, but on the other, it urged DPRK to solve the crisis peacefully as soon as possible. However, DPRK didn't accept the advice in the end. What do we conclude from U.S.-Soviet Union negotiations? Firstly, in spite of Sino-Soviet Union split, Washington didn't leave cold war thinking behind, and convinced that Soviet Union, DPRK, and North Vietnam were pursuing coordinating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Second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ino-Soviet Union split and DPRK-ROK competition, the Soviet Union as a Socialist superpower had no ability to impel DPRK to change its foreign policy in the late 1960s.

【Key Words】 *Pueblo* Crisis, United States, Soviet Union

【Аннотация】 До и после инцидента «Пуэбло» 1968 г., высш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уровень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Джонсона по-прежнему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степени придерживался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монолитн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все считали, что постоянная цель Северной Коре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поддержке Северного Вьетнам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также принимает в этом участие, даже является вдохновителем.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первая реакция США — обращение за помощью к Советскому Союзу заставить КНДР освободить корабль и экипаж.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отказался выступать в качестве посредника,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тайно убеждал Северную Корею разрешить кризис как можно скорее мирным путем. Однако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усил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оказались безрезультатными. Американско-советски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в дан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полностью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и: хотя в то время разры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уже был предreshен, однако Вашингтон все еще придерживался идеологии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был убежден в том, что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еверной Кореи и Вьетнама является скоординированной; в конце 1960-х годов в условиях конкрет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когда произошёл раскол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и наблюдалась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между Кореям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являясь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сверхдержавой, уже был не в состоянии реально влиять на

внешнюю политику Северной Коре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инцидент «Пуэбло», СШ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责任编辑 黄翔、封帅)

俄罗斯大事记

(2011年5-6月)

5月

- 2日 俄罗斯总统新闻局表示，本·拉登(Bin Laden)之死是美国在国际反恐战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
- 3日 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Anatoly Serdyukov)调换了负责购买法国西北风级战舰谈判的整个团队。
俄罗斯总理普京(Vladimir Putin)与现代商业舰队公司(Sovkomflot)总经理举行会谈。该公司专营石油和液化气的国际运输业务。
俄外长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就美国与罗马尼亚达成在德韦塞卢(Deveselu)部署美国反导基地的协议表示，这可能会对俄罗斯的战略导弹产生威胁。
- 4日 俄罗斯总理普京呼吁北高加索地区和地方政府对该地区项目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俄罗斯官方承认，最近在车臣被杀的土耳其国民为基地特使阿卜杜拉·库尔德(Abdulla the Kurd)。
- 6日 俄总理普京在统一俄罗斯党地区间全体会议上建议，成立一个“战略倡议署”以推动新项目。该机构将从事“新的商业活动”，并对年轻的专家和社会项目给予支持。
到访莫斯科的中国外长杨洁篪受到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的接见，并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会晤。
俄总理普京称，俄仍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完全恢复，并表示俄只有经济增速超过危机前水平才能保持恢复态势。
俄反对党亚博卢(Yabloko)集团领导人米特罗欣(Sergei Mitrokhin)拒绝响应普京总理关于建立政党大联盟的号召。
- 7日 俄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俄没有向非洲冲突地区提供武器，俄与非洲国家的军事合作完全符合国际规范。
- 8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致电独联体10国领导人，庆祝卫国战争胜利66周年，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领导人同在贺电接受方之列。
- 9日 俄罗斯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6周年。俄联邦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Gennadi Ziuganov)在单独集会中指责俄当局低估了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丰功伟绩。
- 10日 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总裁米勒(Alexei Miller)称，该公司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与去年4月同比增加了20.5%。
- 11日 俄卫生与社会社会发展部称，俄失业率已下降到危机前的7.1%的水平。
伊拉克总理马利基(Nuri al-Maliki)在访俄期间呼吁扩大两国合作，并邀请俄企业赴伊拉克投资。
俄国防出口公司(Rosoboronexport)总裁伊塞金(Anatoli Isaykin)称，该公司因停止对利比亚的军售，已损失了数十亿美元利润。
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相信美国在执行击毙本·拉登的行动中恪守了联合国宪章51条所赋

予的权利，但谴责北约在宣布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Muammar Gaddafi）为合法打击目标时超越了联合国的授权。

- 12日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Asif Ali Zardari）和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莫斯科举行会晤，并签署了关于航空交通、能源和农业合作的双边协议。
- 14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致函俄罗斯—北约理事会成员国领导人称，欧洲导弹防御体系应该包含俄罗斯的参与。
- 17日 俄能源部长什马特科（Sergei Shmatko）表示，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与英国石油公司（BP）的交易失败并不影响该公司包括北冰洋项目在内的其他工作。
- 19日 俄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Alexei Kudrin）称，俄同意向白俄罗斯提供3年期30亿美元贷款，条件是白方批准为期三年的私有化项目。
- 20日 俄军总参谋长马卡罗夫大将（Gen. Nikolai Makarov）称，俄将会部署能被整合进未来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导弹防御力量，以在遭受导弹攻击时保护俄及其邻国。
- 21日 俄外长拉夫罗夫称，建立共同的欧洲导弹防御系统，是一场“对俄罗斯和北约确保欧洲安全的不可分割的能力的绝对实质的检验”。
- 22日 受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邀请，法塔赫（Fatah）和哈马斯（Hamas）的代表在莫斯科郊区举行会晤，讨论巴勒斯坦和解协议等问题。
- 23日 利比亚反对派特使沙勒加姆（Abd-al-Rahman Shalgham）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后面称，双方在班加西（Benghazi）过渡政府问题上能够相互理解。
- 24日 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利比亚反对派并不要求被承认为该国唯一的合法权力；俄承认利比亚过渡国民议会为有关利比亚未来的合法对话伙伴。
- 26日 俄总理新闻局宣布，普京将成为新成立的全俄人民阵线（All-Russia People's Front）的“非正式领导人”。
- 利比亚总理马哈茂迪（Al-Baghdadi Ali al-Mahmudi）请求俄外长拉夫罗夫帮助促成停火。
- 八国集团领导人在法国多维尔（Deauville）会晤时，要求俄在解决利比亚冲突中承担调解者的角色。
- 31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与蒙古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Tsahiagiyn Elbegdorj）在莫斯科就加强两国贸易、能源和交通合作问题举行会谈。

6月

- 1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开始对意大利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其间将与意总理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美国副总统拜登（Joe Biden）举行三方会谈，并会见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 2日 俄总理普京在与阿布哈兹总理尚巴（Sergei Shamba）会晤后表示，俄将协助阿布哈兹发展与近邻的关系。
- 5日 俄外长拉夫罗夫称，没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疆域划界，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 俄副总理伊万诺夫称，无论是否签订正式的二战和平条约，俄日仍可以继续发展相互关系。他还警告修改克里米亚半岛地位的行为，并排除了在寻求解决德涅斯特河沿岸政权（Transdniestria）问题上的极端立场，排除了承认该地区独立及其与摩尔多瓦统一的可能。
- 7日 俄总理普京和乌克兰总理阿扎罗夫（Mykola Azarov）签订了两国2020前的经济合作项目，但拒绝了乌希望俄以优惠价格向其供应天然气的要求。
- 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利比亚局势调停的工作主要应由非盟担当，俄不承担这种任务。
- 8日 俄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与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在布鲁塞尔举行会晤，探讨两国的合作前景等问题。
- 9日 俄罗斯和美国同意对天然气需求进行联合评估，以稳定国际市场价格。

（下转第47页）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1年第3期

(总第169期)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致本刊读者与作者

《俄罗斯研究》自创刊以来,一直得到广大读者和作者的热情关心和大力支持。正是由于这种关心和支持,十几年来,《俄罗斯研究》获得了坚实的进步与发展。编辑部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近年来,在世界形势发生广泛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这对我们办好刊物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本着办刊宗旨,《俄罗斯研究》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国际形势和俄罗斯问题的各方面人士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作为核心学术期刊,《俄罗斯研究》将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体现我国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和水平的重要平台之一,为推进我国的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的研究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此外,为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相互了解和沟通,《俄罗斯研究》还将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作为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

为了与我国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相适应,《俄罗斯研究》除了继续关注重点放在俄罗斯现状以外,还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空间,栏目设置也将更加多元。

《俄罗斯研究》热忱欢迎广大俄罗斯问题研究者、各方面学者专家继续关心和支持本刊工作,不吝赐稿。

《俄罗斯研究》热忱欢迎广大读者和作者继续对本刊提供批评意见和建议,以帮助我们不断改进工作。

(赐稿者如需了解本刊的有关规范,请登录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rus.org.cn>, 查阅“最新期刊”栏目中的“《俄罗斯研究》投稿须知”。)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 021-62233816 021-62232113

排版: 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 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电子信箱: russiastudies@163.net

网络电子版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址: www.qikan.com www.qikan.com.cn

· 公开发行 ·

定价: 12.00 元